



Воскресение

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品，一方面，在对当时社会的罪恶和腐朽反动的国家、法律、教会制度的揭露上，很难找出另一部作品有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它宣扬了赎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复活

[俄] 托尔斯泰 著 胡元斌 编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经典名著

让阅读更有意义

复 活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胡元斌◎编译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 胡元斌编译.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58-3419-6

I. ①复… II. ①托…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6930 号

复活

FUHUO

作 者: (俄罗斯) 托尔斯泰

编 译: 胡元斌

责任编辑: 宋倩倩

责任技编: 黄东生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ISBN 978-7-5658-3419-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导 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托尔斯泰1851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63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1873年托尔斯泰经过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188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这是他长期思考、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复活》也因此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一个真实的案件。

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

走，另一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

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朵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撼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超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创作《复活》的时候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他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制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

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

伯利亚和戴着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复活》绝不是单单写了两个年轻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笔触所及的可以说是整个俄罗斯。更令人叫绝的是，小说开头写的是监狱，最后结局还是监狱。这就给小说定下了一个基调：全俄罗斯就是一座大监狱。

目 录

陪 审·····	001
往 事·····	009
糊涂的审判·····	027
探 监·····	038
四处奔走·····	050
乡 下·····	058
去彼得堡·····	071
失败的上诉·····	087
离开彼得堡之前·····	096
在火车上·····	106
西 行·····	124
变 故·····	153
醒 悟·····	166

陪 审

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长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

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唯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

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9时以前，务须把3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

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4月28日上午8时，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面容疲惫，鬓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

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哗啦”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

他吆喝一声：“玛丝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鬃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

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

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的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虽然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

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都一律照办。

玛丝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

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女犯走过一家

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

女犯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拉拉”飞起来，扇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又沉重地叹一口气。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未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女。这个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为一对地主老处女姐妹做工。

未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按农村的惯常做法，给婴儿行洗礼，然后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于是这个不该出生的、妨碍干活的、多余的婴孩很快也就饿死了。

这样已经死了5个孩子。5个孩子都受过洗礼，都不给喂奶，统统都是饿死。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婴儿的命运也会同前5个孩子一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偶然来到牲口棚，斥责女饲养工，说奶油有牛骚气。

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处女说完奶油的事，又责备不该让产妇进牲口棚。她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婴儿，忽发慈悲之心，自愿做这个婴儿的教母。

她为女婴行了洗礼，并起名叫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后来因为可怜自己的教女，常常送点牛奶和钱给她的母亲，女孩就这样活下来了。老处女两姐妹为此叫她“得救女”。

女孩3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老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她领去抚养。很快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非常活泼可爱，常常使两个老姑娘觉得快慰。

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正是她给小姑娘行了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较为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女孩应该干活，成为贴身使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情绪不佳就罚她，甚至还打她。

小姑娘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影响下，长大后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小名也是不俗不雅的，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

她满16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富裕的公

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尽管她既不敢向他表示，也不敢对自己承认。

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上战场前顺路拜访两个姑妈，在她们家住了4天。临走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100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5个月，卡秋莎断定自己怀孕了。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把卡秋莎赶了出去。从老姑娘家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当使女，可是只在那家待了3个月，便因粗暴无礼遭辞退。这时，她再找活儿已不合适，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她只好住到一个会接生兼贩酒的农村寡妇家。

分娩很顺利，可当时接生婆为村里一个有病的产妇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生下来的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说他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送到那里就死了。正当玛丝洛娃失去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从此过起了违背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长期的罪恶生活，千千万万妇女过的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利益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鼓励。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常常十有八九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白天沉沉昏睡。天天如此，整整持续一周。到了周末，她们就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政府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认真严格，有时候则失去了自然界为阻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动物的羞耻心，以调笑取乐的态度为她们检查身体，发给许可证。

准许她们继续犯罪，就像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上一周所干的。于是，照例又是一星期。就这样，无论春夏秋冬，不分平时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7年。在这7年中，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7年，在她初次失身后的第8年，也就是在她26岁那年，出了一件事，为此她进了监狱，在与杀人犯、盗贼同狱待了6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在两名士兵的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筋疲力尽地来到法院大楼时，当年引诱她的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

夫公爵却仍然还躺在他那高高的装有弹簧床垫的床上，上面还铺着羽毛褥垫。他穿着一件仔细熨过的质地良好、干净笔挺的亚麻布睡衣，吸着香烟，想着他今天必须要做的和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是和柯察金一家一起度过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但是，除了像一般青春已过、又非陷入热恋中的男人所通常表现出的对婚姻的犹豫外，聂赫留朵夫还有许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便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不能马上去求婚。

这倒并非因为他在10年前诱奸了玛丝洛娃又把她抛弃了，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而且即便想起来，他也不会把它看做不结婚的一个理由。绝不是因为这些！真正的原因是他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他认为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但那位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聂赫留朵夫和女人在一起时很腼腆，而正是他的这种腼腆唤醒了这位有夫之妇想要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地区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平日就不太检点。她一步步将聂赫留朵夫引入这不正当的关系中，他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同时却又一天比一天讨厌她。

在屈服于诱惑之后，聂赫留朵夫觉得很内疚，以至于没有勇气在未得到她同意情况下断绝这种关系。而这便是为什么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年轻的柯察金小姐求婚的原因。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走廊上的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地方法庭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说。

“您找哪一个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应该说明白。从这儿往右走，再往左

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按照他的指点走去。

法庭庭长今天早早来到法院。他高大而又肥胖，一大把络腮胡子已经变得花白。他虽有妻室，但是生活极其放荡，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今天早晨他接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今天15时至18时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

这个瑞士女人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现在从南方去彼得堡，途经本城。由于这个缘故，庭长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以便在18时以前能与这位火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会面，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与这个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咔嚓”一声锁上房门，从文件柜的底层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向下各做了20个动作，然后高举哑铃，轻松地做了3个下蹲动作。

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敲门走进屋，他个子不高，双肩耸起，脸上愁眉不展。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有来，”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来，”庭长边穿制服边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害臊，”法官说，气呼呼地坐下来，掏出纸烟。

这个法官办事很死板，今天早晨他跟妻子闹了一场不愉快，因为妻子把要用一个月的钱提前统统花光了。她求他预支一点钱，可是他说他不能违例，结果大闹了一场。

妻子说，既然这样，家里不做饭了，他别想回家吃饭。说到这里，她就走了。他害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瞧，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生活倒是这个下场，”他暗自思忖，眼睛望着面前这位容光焕发、身体健壮、快快活活、性情温和的庭长。此刻庭长大大地伸开两肘，用两只细嫩白净的手将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拨到绣花衣领两侧。“他永远心满意足，快快乐乐，可我总是受折磨。”

书记官走进屋，送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烟，“我们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投毒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嗯，好吧，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他认为这个案子16时之前可以审结，之后就可以走了。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让我问您，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道。

“那当然，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个案子？”

“投毒案。”

“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不认为这有什么好。他昨夜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玩纸牌一直玩到下半夜2时，然后坐马车到玛丝洛娃6个月前所待的那家妓院玩女人，因此恰恰没来得及阅读有关投毒案的卷宗，所以现在想粗粗浏览一遍。

书记官明知道他没有看过投毒案的卷宗，却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按思想方式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布列韦则是保守派，他像所有在俄国做官的德意志人一样，对东正教特别虔诚。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对他的职位又很羡慕。

陪审员们刚进来坐好，传达员就迈着他那往边上拐的步子走了进来，来到法庭前半部，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喊道：“现在开庭！”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庭长翻阅了案卷，向警官和书记官问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吩咐带被告上堂。一会儿，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名戴军帽的宪兵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接着进来的是被告，先是一名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子，然后是两名女子。进来的第三名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的男人眼睛一齐转向她，一双双眼睛很久都离不开她那白嫩的脸、那水灵灵的黑眼睛和囚袍底下那高高隆起的胸脯。

就连一名宪兵，当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目送她走过去，坐下来，等她坐下了，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失体统，赶紧转过脸来，提起精神，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

“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说道，“对你的指控是，你带

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旅行皮箱钥匙从妓院跑到摩瑞塔尼亚旅馆，窃取了箱子里的一些现金和一枚戒指。”

他说这一切时就像在背书一样，同时把身子倾向左边的法官，那个法官正凑向他的耳朵轻声告诉他物证清单中提到过的一个酒瓶不见了。

“窃取了箱子里的一些现金和一枚戒指，”庭长重复了一遍，“随后分了赃。此后你又同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瑞塔尼亚旅馆，并在他的酒里下了毒，因而导致其死亡。你服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开始说道，“就像我原先说过的，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过，我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至于那枚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偷窃2600卢布现金的罪行吗？”庭长问道。

“我已经说过，除了那40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承认犯了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酒里放毒粉的罪行吗？”

“是的，这事我承认。不过，那只是因为我相信了他们告诉我的话，说那是安眠药，吃了不会有任何事。我从来没想到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她说道。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偷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金和戒指的罪行，但是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庭长说道。

“嗯，是的，我承认是有这么做过，但是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只是想让他睡着，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想到过会更糟。”

“很好，”庭长说，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现在告诉我们整个事情的经过，”说着他往椅子里一靠，把两只十指交错的手往桌上一摊。“从头到尾说一说。坦白招供将作为从宽发落你的有利条件。”

玛丝洛娃一直盯着庭长，一言不发。

“你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吗？”

“我已经全部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道，坐下来。

随后庭长记了点什么，在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

后，宣布休庭10分钟，然后匆匆站起身，离开了法庭。他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想按摩一下，吃点药水。而这便是审讯中止的原因。

在法官们起身之后，律师、陪审员和证人们也纷纷起身，大家都高兴地感到整个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四散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往事

是的，法庭上的玛斯洛娃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上大学三年级那一年。那时候他为了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在姑妈家里过了一个夏天。往年一到夏天他总是跟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莫斯科附近他母亲的大庄园里。

但那一年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度夏。姑妈家远离城市，十分清静，受不到干扰，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古老而朴素的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精神振奋，意气昂扬。一个青年人，一旦不是按照别人的指点，而是自己领会到生活的美好和重要性，领会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担负的事业的全部意义，看到人本身和全世界都有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且不但满怀希望，并且怀着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的充分信心去实现这种完美理想的时候，都会是这样的。

那一年他在大学里就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断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父亲并不富有，母亲却有10000俄亩左右的陪嫁。

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残酷和不平，而他又是一个十分看重道德的人，认为为了合乎道德要求而作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他决定不再享受土地所有权，立即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交给农民。他正是就这个问题在写一篇论文。

那一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很早就起身，有时才3时，太阳还没有出山，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还披着蒙蒙的晨雾。等他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闪烁着露珠儿。

早晨他喝完咖啡，有时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上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之前，他在花园里找个地方睡一觉，然后在吃午饭时候凭他那股快活劲儿逗得两位姑妈也快快活活，笑声不断。

饭后他就骑马或者划船，晚上又看书，或者陪两位姑妈坐坐，摆摆纸牌算卦。夜里，特别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常常不能入睡，原因只是他感受到的生活中的喜悦太大，太激荡人心了，于是他干脆不睡觉，怀着一个个美梦、一样样打算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时一直到天亮。

他在姑妈家的第一个月就是这样幸福而宁静地度过的，根本没有留意那个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眼睛乌黑、脚步轻盈的卡秋莎。当时聂赫留朵夫才19岁。他一直在母亲的羽翼下成长，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青年。他梦想有一个女人，只是梦想有一个妻子。凡是他认为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都不是女人，只是人。

可是，事有偶然，在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有位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玩，其中有两位小姐、一名男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女邻居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就到门前已经割过草的草地上玩起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带去了。玩过几回之后，便轮到聂赫留朵夫跟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愉快，可是他从来没想到，在他与她之间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关系。

“哈，这一下子别想捉住这两个人，”轮到捉人的快活的画家说着，迈动他那庄稼汉的短而壮的罗圈腿飞跑起来，“除非他们自己绊一跤。”

“您呀，休想逮住我们！”

“一，二，三！”

他们拍手拍了3下。卡秋莎勉强憋住笑，敏捷地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了位子，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便朝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逮到，就使足了劲儿跑起来。他回头看了看，看到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飞快地迈动着年轻而矫健的两条腿，渐渐撇开他，朝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谁也没有跑到那后面去过，但卡秋莎回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点头示意，要他到花坛后面会合。

他领会她的意思，就朝花坛后面跑去。谁知丁香花丛后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踩空，跌进沟里，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夕露。但他一面自己笑着自己，一面很快地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地方。

卡秋莎闪动着带露醋栗似的亮晶晶的乌黑的眼睛，笑盈盈地迎着聂赫留朵夫飞跑过来。他们会合了，紧紧握住手，表示胜利。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她一面用空着的那只手理着松开的辫子，一面呼哧呼哧喘着气，微微笑着，从下朝上对直地看着他说。

“我不知道这儿有一道沟，”他说，也微微笑着，没有松开她的手。她向他靠了靠，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把脸朝她凑过去。她没有躲闪，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吻了吻她的嘴唇。“这算什么呀！”卡秋莎说着，急忙抽出手来，跑开了。

她跑到丁香花前，折下两枝开始凋谢的白丁香，拿丁香花枝儿拍打着自已那热辣辣的脸，不住地回头朝他望着，很带劲儿地在面前摆动着两臂，转身朝做游戏的一些人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变成了相互爱慕的纯洁少年与纯洁少女之间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里来，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到她的白围裙，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被阳光照亮了，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悦目，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快乐。

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不仅卡秋莎在跟前能对他产生这样的作用，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也会对他造成同样的影响。

在她来说，只要一想到有一个聂赫留朵夫，都会产生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有时收到不愉快的母亲来信，或者有时论文写得顺手，或者有时心头涌起少年人那种莫名的惆怅，但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而且他可以看到她，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卡秋莎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她能够把一样样事情都做好，还能抽空读书。聂赫留朵夫就把自己刚刚读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拿给她看。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

他们俩偶尔相遇就谈上几句话，例如在过道上，在露台上，在院子里，有的时候还在姑妈们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里，因为卡秋莎跟老女仆同住在一处，聂赫留朵夫偶尔到她们的小屋里去啃着糖块喝茶。

有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场，他们谈起话来最畅快。如果只有他俩在一块儿，谈话却别扭得多。他们的眼睛立刻开始讲些跟他们嘴里所讲的完全不同而且重要得多的话，他们的嘴唇绷紧，心里害怕，就连忙分手了。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和卡秋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这种关系，有点害怕，甚至往国外写信把这事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娅姑妈很怕侄儿跟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因为纯洁的人最是多情，聂赫留朵夫正是不自觉地爱上了卡秋莎，也正是这种爱情保证他和她不致沉沦。

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会和她发生这种关系就害怕。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娅姑妈的担心倒是切实得多。她担心性格倔犟而果断的侄儿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犹豫地同她结婚。

假如聂赫留朵夫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假如当时有人劝他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

他就会凭他那敢做敢当的性格做出决定，认为只要他爱上一个姑娘，就不管她是什么人，没有理由不同她结婚。可是，两位姑妈没有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他就这样走了。

他当时满心以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当时充溢于他全身的生活的欢乐感的一种表现，这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姑娘在和他同享这种生活的欢乐感。

可是，在他动身的时候，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泪汪汪的有点儿斜视的黑眼睛送着他，他才感到，他别离的是一种美好的、珍贵的、一去永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无限惆怅。

“再见，卡秋莎，各方面都得感谢你，”他一面上马车，一面隔着索菲娅姑妈的睡帽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过这话，便强忍着满眶的眼泪，朝门廊里跑去，到那儿她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从那时候起，聂赫留朵夫一连3年没有跟卡秋莎见面。一直到他刚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里去，顺路到姑妈们家里去一趟的时候，他才跟她见面。不过这时候，他跟3年前夏天在她们家里住过的那个人相比，却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了。

原先他是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原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一个秘密，他带着快活的热情极力要解开这个秘密，如今，这个世界的的生活里的一切却简单明了，已经由他所过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规定清楚。原先，同大自然的交接，同在他以前生活过、思索过、感觉过的人的交接，才是重大而必要的，如今重大而必要的却是各种人为的制度以及跟同伴们的交接。

原先女人显得神秘而迷人，是唯其神秘才迷人的生物，如今女人，除了他的家属和他朋友的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其功用是很明确的：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的工具。

原先他不需要钱用，他母亲给他的钱连1/3也用不完，他能够放弃他父亲名下的田产而把它送给农民，可是现在母亲每月给1500卢布，他还是不够用，常常为了钱跟母亲发生不愉快的交涉。原先他认为他的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

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

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所以会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下去就会过于困难。相信自己，就得亲自解决一切问题，而那种解决总是不利于他那追求轻松快乐的兽性的我，而且几乎总是同它抵触。

至于相信别人，那就任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早已解决好，而且那种解决总是同精神的我不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再者，他相信自己，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责难，而他相信别人，倒会博得他四周的人们的赞扬。

比方说，聂赫留朵夫思考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籍，议论这些问题，他四周的一切人就都认为这不合时宜，多少有点荒唐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用好意的讽刺口气称呼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可是等到他看长篇小说，讲猥亵的故事，到法国剧院里去看滑稽的轻松喜剧，快活地讲戏里的情节，大家倒都称赞他，鼓励他。

每逢他认为必须节减他的用度，穿陈旧的军大衣，不再喝酒，大家就认为这是脾气古怪，有点标新立异，可是临到他花一大笔钱置办猎具，或者布置一个与众不同的奢华书房，大家反而称赞他风雅，送给他种种贵重的物品。

他本来保持着童贞，打算照这样保持到结婚的那天，他的亲属却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母亲听说他成了真正的男人，从他的同事手里把一个法国女人夺过来，她甚至并不因此难过，反而高兴。这个身为公爵夫人的母亲每一想到他同卡秋莎的那个插曲，想到他居然有意跟她结婚，总不免心惊胆战。

同样，当初聂赫留朵夫达到成人的年龄以后，认为拥有土地是不公正的，因而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一块不大的田产送给农民，他这个举动却使得他的母亲和亲属大惊失色，从此这件事就成了他的一切亲戚不断责难和讥笑的对象。人们一再对他说，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但没有发家致富，反而开了3家酒店，索性不干农活，所以更穷了。

可是等到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他那些门第高贵的同事们一起挥霍和赌博而花掉很多的钱，害得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的时候，她倒几乎一点也不伤心，反而认为这是人之常

情，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也未尝不是好事。

起初，聂赫留朵夫极力硬顶，然而这种硬顶过于艰苦，因为凡是他在相信自己认为是好的事情，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在相信自己认为是坏的事情，他四周的一切人倒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他这样否定自己，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是不愉快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没有保持很久。这段时期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和喝酒，很快就不再体验到那种不愉快的心情，甚至感到颇为轻松了。

聂赫留朵夫凭他那热烈的性格，彻头彻尾地投身于他四周的一切人所同声赞扬的这种新生活，全然扑灭了他内心别有所求的呼声。这个变化是在他搬到彼得堡去以后开始的，到他在军队中工作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军人的职务一方面使得担任军职的人处在对其他人享有无限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迫使他们在高于他们的长官面前保持奴颜婢膝的驯顺态度。

然而，除了军人的职务以及军服和军旗的荣誉、公然得到准许的暴力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堕落以外，还另有一种堕落，那就是：在经过精选只有家财豪富、门第显贵的军官才能加入的近卫军团里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而造成的堕落，结果这两种堕落就促使身受其害的人陷入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

自从聂赫留朵夫担任军职，开始像他的同事们那样生活以后，他也就落进这种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去了。

正事是一点也没有的，他光是穿上一身并非由他自己而是由别人做得很漂亮、刷得很干净的军服，头戴一顶军盔，拿着也是由别人造出来、擦亮、交给他的武器，跨上一匹也是由别人养大、训练好、饲养着的骏马，跟着一些同样的人一起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那就是纵马奔驰，挥舞军刀，开枪射击，而且把这一套教给别人。

别的工作是没有的，可是那些品位极高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沙皇和他的亲信，不但赞成这种工作，而且为这种工作夸奖他们，感谢他们。

这种工作做完以后，他们认为正当而重要的事就是跑到军官俱

乐部里或者最昂贵的饭馆里去吃饭，特别是喝酒，挥霍许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钱，然后就是剧院、舞会、女人。这以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又是挥金如土，又是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起一种特别厉害的腐化作用，因为假如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就不会不在心灵深处为这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夸耀这样的生活，为它感到骄傲，到了战争时期这种情形尤其严重。

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以后担任军职的。“我们已经准备在战争中牺牲我们的性命，因此这种逍遥自在的欢乐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可以原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才过这样的生活。”

聂赫留朵夫在他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就是这样。在整个这段时期，他由于摆脱了以前他为自己规定的种种道德约束而欢天喜地，一刻也不停地处在持续不断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里。

3年以后他到姑妈们家里去的时候，正是处在这种状态里。

聂赫留朵夫去探望两个姑妈，是因为她们的庄园位于他赶往前方他的团队驻地必经之路上，另外，姑妈们一再热情相邀，然而，更主要的是想和卡秋莎见面。

也许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经听从他那如今肆无忌惮的兽性的人的唆使，对卡秋莎起了歹心。然而他没有感觉到这种歹心，只不过打算到他往日觉得很好的一个旧地去重游一番，见一见那两个有点可笑而又可爱的、好心肠的、老是让他不知不觉处在热爱和赞赏的气氛中的姑妈，看一看那个妩媚的、给他留下极其愉快的回忆的卡秋莎罢了。

他是在3月底基督受难日这个星期五到达的。路上泥泞不堪，下着倾盆大雨，到达姑妈家时他已全身透湿，冻得浑身发僵，但是他仍然朝气蓬勃、精神焕发，就像这段时期他一直感觉的那样。

“她还在她们家里吗？”他暗自想道，这时候他的雪橇驶进姑妈家他所熟悉的旧式地主庄园的院子里，那儿堆着从房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四周砌着一道矮砖墙。

他料着她听见他的雪橇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外面门廊上来，然而只有两个光脚的女人从边门出来，走到门廊上，裙裾掖在腰里，提

着水桶，分明在擦地板。

正门的门廊上也没有她，只有听差吉洪一个人走出来，身上系着围裙，大概也在忙于洒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到前厅，身穿一件绸料连衣裙，戴一顶包发帽。

“太好了，你到底来了！”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着，吻了吻他。“玛丽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在教堂里站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索菲娅姑妈，”聂赫留朵夫说，吻了吻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手，“请您原谅，我沾湿您的衣裳了。”

“快到你的房间里去，你浑身湿透了。你都长小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端咖啡。”

“马上就来！”走廊里传来了熟悉悦耳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兴奋得连心都揪紧了。“她在这里！”仿佛太阳从乌云里露出脸来。他随着吉洪喜盈盈地去他原先住过的房间换衣服。聂赫留朵夫有心向吉洪问一问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不好？生活怎么样？要嫁人吗？然而吉洪的态度那么恭敬，同时又那么严谨，在聂赫留朵夫洗手的时候他那么坚定地要亲自拧开悬壶洗手器给他倒水。

这就弄得聂赫留朵夫不便于问他卡秋莎的情况，光是问一问他的孙子可好，那匹名叫“老兄”的老马怎么样，那只看家狗波尔坎怎么样。他们都活着，挺好，只有波尔坎去年得了疯病。

聂赫留朵夫脱下所有的湿衣服，刚刚穿上干净的衣服，就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听得出是谁的脚步声和敲门声。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能是她。

他披上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果然是她，卡秋莎。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只是比以前更加妩媚可爱了。那双含着笑意、天真无邪、微微斜视的黑眼睛依然这样自下往上地望着他。她身上也跟从前一样，仍旧系着干净的白色围裙。她从他姑妈那儿拿来一块刚刚拆掉包皮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国式的大浴巾和一条毛茸茸的浴巾。

不论是那块没有动用过、刻着字母的香皂也罢，那两条毛巾

也罢，她本人也罢，一律都那么干净，新鲜，清白招人喜欢。她那可爱坚毅的红唇依然像以往那样，看到他时因难以克制的喜悦而紧抿着。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欢迎您！”她费劲地说道，脸上泛起了红晕。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该称“你”，还是“您”，因而也像她那样满脸通红。“您好吗？您身体好吗？”

“很好，姑妈让我给您送来您喜爱的香皂，玫瑰香的，”她说，她把香皂放在桌子上，把毛巾搭在圈椅的扶手上。

“侄少爷自己有，”吉洪说，为客人自备用具无须麻烦别人的气派辩护，得意地指一指聂赫留朵夫的很大的化妆用品箱，箱子已经打开，露出许多小小的银瓶盖，箱子里放着大量的玻璃瓶、刷子、发蜡、香水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请替我谢谢姑妈。我多么高兴，我又来到这里。”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心里又变得像以往那样开朗、温柔。

她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一笑作为回答，然后就出去了。

姑妈们素来就钟爱聂赫留朵夫，这一回见到他，比往常还要欢喜。聂赫留朵夫正要动身去打仗，说不定会负伤或者阵亡。这打动了姑妈们的心。

聂赫留朵夫原来安排的旅程只能在姑妈家待一昼夜，可是见到卡秋莎后，他就同意在姑妈家过复活节。他打电报给他原先约定在敷德萨相会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请他也到姑妈们家里来。

聂赫留朵夫从见到卡秋莎的头一天起，就对她生出了他旧日对她的那种感情。他现在也跟先前那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不能不激动，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欢笑声就不能不高兴，瞧着她那对像湿润的醋栗那么黑的眼睛，特别是在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动心，主要的是他们相遇的时候，她一脸红，他就不能不发窘。

他感觉到他在恋爱，不过跟先前不同，先前那种恋爱对他来说是一个秘密，他自己都不敢对自己承认在恋爱，而且相信人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也在恋爱，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为此高兴，尽管想瞒住自己，却隐约地知道这种恋爱是怎么回事，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就跟在一切人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已经在他的身上引起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着上风，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

可是他见到卡秋莎以后，重又产生了他以前对她生出的那种感情，精神的人就抬起头来，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于是在复活节前一连两天当中，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内心斗争。

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他应当走掉，没有必要再在姑妈们家里住下去，知道这样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他是那么高兴，那么愉快，结果他没有对自己说这些话，却住下来了。

在基督复活节的前夜，星期六傍晚，一个司祭带着一个助祭和一个诵经士坐着雪橇到这儿来做晨祷，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费尽力气经过水塘和干地才走完从教堂到姑妈家的那3俄里路程的。

聂赫留朵夫同姑妈们和仆人们站在一块儿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卡秋莎，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按照复活节的规矩同司祭、同姑妈们互相吻过3次以后，正要走去睡觉，却忽然听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老女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在外面过道里准备跟卡秋莎一起动身到教堂去给复活节的甜面包和甜奶渣糕受净化礼。

“我也去，”他暗想。

到教堂去的路，不论是坐雪橇还是坐马车，都不好走。因此，在姑妈们家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的聂赫留朵夫，就吩咐人把那匹供乘骑用的名叫“老兄”的马备好鞍子，他自己不再上床睡觉，却换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的马裤，穿上军大衣，翻身上那匹养得很肥、身体笨重、不住嘶鸣的老公马，摸着黑路穿过水塘和积雪到教堂去。

这次晨祷，在聂赫留朵夫此后的全部生活当中，成为一次最鲜明、最强烈的回忆。他骑着马，趟着水，走完漆黑的、零星点缀着

几堆白雪的道路，进了教堂的院子。他那匹马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就竖起了耳朵。这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些农民认得他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子，就把他领到一块干燥的地方下马，给他把马拴好，带他走进教堂里去。教堂里已经满是过节的人了。

右边都是农民：老年人穿着土布长衫和树皮鞋，脚上裹着干净的白色包脚布；青年人穿着粗呢的新长衫，腰上系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着高腰皮靴。左边都是农妇，头上扎着红绸巾，上身穿着棉绒的坎肩，配着大红的衣袖，下身穿着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或者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打了铁掌的半高筒靴子。

站在她们后边的，是衣服朴素的老太婆，扎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外衣和旧式的毛织裙子，脚上穿着普通鞋或者新树皮鞋。这两群人中间夹杂着一些衣服考究、头发上抹了油的孩子。

农民们在胸前画十字，鞠躬，把头发甩到后面去。女人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盯住一个有许多蜡烛照着的圣像，捏紧她们并拢的手指头，有力地点一下额头上的头巾，再点两个肩膀和肚子；她们嘴里不出声地念叨，弯腰站着，或者跪下。

孩子们学大人的样子，一见有人在瞧他们，就起劲地做祷告。那些缠着金色螺旋纹的大蜡烛，以及从四面八方把它们围住的许多小蜡烛，照得金黄的圣像壁像是起了火。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蜡烛。从唱诗班那边传来业余歌手欢畅的歌声，其中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高音。

聂赫留朵夫走到前边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村长。

读经台右边，在地主太太身后，站着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穿着亮闪闪的淡紫色连衣裙，戴着坠流苏的白色披巾。卡秋莎跟她站在一起，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胸前缝着皱褶，系一根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

复活节那天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喜庆、庄严、欢快和美好：牧师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戴着金十字架；执事、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白色法衣；业余歌手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

头发擦得油光闪亮；节日赞美诗的欢快调子听上去就像舞曲；牧师们高举着一支饰有花卉的大蜡烛，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

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还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蓝色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喜悦光芒的卡秋莎。聂赫留朵夫感到她虽然没回过头来，却看见他了。这是他在经过她的身边，往祭坛那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出来的。

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不过他想了想，在走过她身边的時候说：“姑妈说，她在做完晚午祷以后就开斋了。”

如同平时她见到他一样，她的青春的血涌上了她整个那张可爱的脸。她的黑眼睛微微抬起来，笑着，欢欢喜喜，天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我知道，”她说，微微一笑。

这时候，一个诵经士拿着铜咖啡壶，从人群里挤过来，走过卡秋莎身边，眼睛没有看着她，他的祭服的衣襟却擦着她了。这个诵经士分明出于对聂赫留朵夫的尊敬，要从他旁边绕过去，才擦到了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却暗自觉得奇怪：他，这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儿的一切东西，以至全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为了卡秋莎才存在的，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怠慢，独独不能对她这样，因为她就是万物的中心。

为了她，圣像壁的黄金才光芒四射，枝形大烛架和那些烛台上的所有蜡烛才大放光明；为了她，人们才发出欢乐的歌声：“主的复活节来了，欢乐吧，人们。”

世界上凡是好的东西，一切好东西，都是为了她才存在的。他觉得卡秋莎好像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才存在的。这样的感觉是聂赫留朵夫瞧着她那带皱褶的白色连衣裙裹着的苗条身材，瞧着她那张聚精会神、喜气洋洋的脸的时候生出来的。他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来，她的灵魂里恰好也唱着他的灵魂里所唱的那种歌。

在早午祷和晚午祷中间的那段时间里，聂赫留朵夫走出了教堂。人们都给他让路，对他鞠躬。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却问：“他是谁家的？”

他在门廊上站住。乞丐们围上来，他就把钱夹里所有的零钱

统统散给他们，从门廊的台阶上走下去。天色已经很亮了，可是太阳还没升上来。人们散布在教堂周围的坟地上。卡秋莎还待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就停下来等她。人们仍旧陆续走出来，他们的皮靴底上的钉子把石板踩得“叮叮”地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的院子里和墓园里去。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做糖果点心的厨师是一个龙钟老者，这时候摇着颤巍巍的头，拦住聂赫留朵夫，按复活节的规矩跟他互相吻了3次。

他的妻子是老太婆，戴着一块绸子的三角头巾，头巾下边露出她那皱皮的喉部，这时候从手绢里取出一个染得红里透黄的鸡蛋，送给聂赫留朵夫。这当儿有一个年轻力壮、满面笑容的农民走过来，身上穿一件崭新的外衣，拦腰系一根绿色的宽腰带。

“基督复活了。”他说，眼睛里闪着笑意，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带来一股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好闻的气味。他把鬃曲的胡子送上来，搔得聂赫留朵夫的脸上发痒，再把他那有力的嫩嘴唇对着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3次。

正当聂赫留朵夫跟这个农民亲吻，然后收下他所送的一个深棕色鸡蛋的时候，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亮闪闪的连衣裙和那个黑发上扎着红花结的、可爱的头出现了。她立刻从走过她面前的人们的头顶上望过来，瞧见了她。他看到她脸上放光了。

她跟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一块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散给乞丐们一些钱。有一个乞丐已经烂掉了鼻子，痊愈后只剩下一块红疤，这时候走到卡秋莎跟前来。她就从手绢里拿出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他，然后凑到他跟前去，吻了他3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神情，正好相反，她的眼睛仍旧快活地放光。

正当她吻那个乞丐的时候，她的眼睛遇到了聂赫留朵夫的目光。她仿佛在问：这件事她做得好吗，做得对吗？“做得对，做得对，亲爱的，样样都好，样样都美，我爱你。”

她们两个人走下门廊的台阶，他就往她那边走过去。他并没打算行复活节亲吻礼，只不过是想跟她挨得近一点罢了。

“基督复活了！”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说，低下头，微笑着，她的口气似乎在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平等了。她把手绢揉成一

小团，擦干净她的嘴，把嘴唇送到他跟前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说，吻她。

他看了卡秋莎一眼。她脸红了，同时向他这边走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相吻了两回，仿佛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再吻一次，后来又似乎决定应该再吻一回才对，他们就又吻了第三回，两个人都微微地笑了。

“你们是要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卡秋莎说，好像刚刚做完一种愉快的工作似的用她的整个胸膛沉重地呼吸着，抬起她那对温顺的、贞洁的、热爱的、略微有点斜睨的眼睛照直瞧着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一个时刻达到顶点，到了那个时刻这种爱情就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成分，也没有什么肉欲的成分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每逢他现在回忆卡秋莎，虽然他跟她在各种场合见过面，可是这时候的情景总是盖过其他的一切时候。

她那生满平滑发亮的黑发的小脑袋，她那件带着皱褶、严实地包紧她的苗条身材和不高的胸脯的白色连衣裙，她脸上泛起的红晕，她那对由于一夜没有睡觉而微微斜睨的、温柔的、亮晶晶的黑眼睛。

总之她周身上下，都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她用她那清白贞洁的爱情不但在爱他，而且在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也不但是爱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还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那样的爱情，因为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清晨他感到他的心里也有那样的爱情，而且感到他和她在那样的爱情里合二为一了。唉，要是一切都停留在那天夜里发生的那种感情上，那多么好啊！

“是的，整件骇人听闻的事是在基督复活节那个夜晚过去以后才发生的！”现在他坐在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窗子旁边，暗自想着。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就跟两姑妈一块儿开斋。为了提提神，他按照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喝了白酒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

己的房里，立刻就和他睡着了。敲门声把他惊醒。他从敲门声听出这是她，就爬起来，一面揉着眼睛，伸着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吧！”他说着，下了床。

她把门开了一道缝儿。“开饭啦！”她说。

她还是穿着那件白连衣裙，不过头发上的蝴蝶结没有了。她看了看他的眼睛，满脸就放起光来，就好像她向他报告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喜事。

“这就去。”他说着，就拿起梳子，要梳头发。

她还站在那儿没有走。他发觉这一点，就丢下梳子，朝她走去。但就在这时她转过身去，迈着惯常那种轻盈而敏捷的步子，顺着走廊里的长地毯朝前走去。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我怎么不把她留住呢？”他跑过去，在走廊里追上了她。

他要拿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似乎觉得，在她进了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应该干点儿什么，那是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干的，他却没有干。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她回头看了看。

“您有什么事？”她说，步子渐渐慢下来。

“没什么，不过……”

他鼓了鼓劲儿，并且想到一切处在他的地位的男子在此类场合会怎么办，就搂住卡秋莎的腰。她站了下来，看了看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别这样。”她满脸通红地说。便用她那强劲有力的手推开那条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她走了。一时间他不但感到不好意思和羞惭，而且憎恶起自己。他本来应该相信自己才对，可是他不明白，这种不好意思和羞惭正是他灵魂里最美好的感情在流露，反而认为这说明他很蠢，他应该像大家那样干。

他又一次追上她，又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吻完全不同于前两次的吻，也就是那次在丁香花丛后面情不自禁地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吻。这一吻火辣辣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听那声音好像他砸碎了一件无价之宝，再也无法修补似的。她快步跑开了。他走进餐厅。两

位盛装的姑妈、一位医生和一位女邻居都站在一碟碟小菜旁边。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却起了风暴。

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听清楚，别人问东他答西，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在走廊里追上她时这一吻。他再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每次她走进来，他不必看她，整个身心都会感觉到她来了，而且必须强制自己，才能不去看她。

饭后他马上回到自己房里，心猿意马地在房里踱了很久，一面倾听着家里的响声，等待着她的脚步声。不过，事有凑巧，到了傍晚，她要上他隔壁的房间里去。医生留在这儿过夜，卡秋莎要给客人铺床。聂赫留朵夫听到她的脚步声，就放轻脚步，屏住呼吸，就像要干什么犯罪的事似的，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她已经把两手伸进干净的枕套，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这时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不过这不是以前那种快活和欢喜的笑，而是一种提心吊胆、可怜巴巴的笑。聂赫留朵夫紧紧搂住她，让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做，就挨着她坐下来。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用哀求的声音说。“玛特廖娜·帕夫洛夫娜来啦！”她一面挣扎一面喊道。而且真的有人朝门口来了。

“那我夜里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你一个人在屋里，不是吗？”整个黄昏他都坐立不安，一会儿上姑妈的房里去，一会儿又走出来，回到自己房里，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才能跟她单独见面。

等到一切又沉寂下来，平稳的鼾声又响起来，他就极力把他的脚踩在不“嘎吱嘎吱”响的地板上，往前走，来到她的房门口。任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她分明没有睡着，因为她的呼吸声听不到。他刚刚压低喉咙叫一声“卡秋莎”，她就跳下床，走到房门口来，劝他走掉，她的声调依他听来仿佛在生气似的。

“得了，你开一会儿门吧！我求求你，”他说着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她不出声，然后他听见一只手摸索着找门扣的声音。门扣“咔”地一响，他就顺着推开的门缝溜进去。

这时候她穿着又粗又硬的布内衣，裸露着胳膊；他抓住她，抱起她来，把她带走。“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呀？”她小声说。

可是他不理睬她的话，把她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她说，可是她的身子更偎紧他了。

等到她周身发抖，一声不响，也不答理他说的话，从他那儿走掉了，他就走出去，来到门廊上，站住不动，极力思索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的意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所遇到的究竟是很大的幸福呢，还是很大的不幸！”他问自己。“这种事是素来就有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说，然后就回去睡觉了。

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度过的这最后一天里，头天夜里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尽管没有充分享受够他与她的爱情，现在就这样走了实在遗憾，可是客观上的非走不可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将这种难以保持的关系一刀斩断。

他也想到要给她一些钱，这不是为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这笔钱，而是因为别人通常都这样做的。如果他享用了她，却不付给她钱，别人会认为他不是个正派人。

临走这一天午饭后，他在前室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就红了，想从他身边走过去，同时给他使了个眼色，让他注意女仆住房的门开着，可是他拦住她。

“我想跟你告别，”他说，手里团着一个装了100卢布钞票的信封。“这是我给你……”

她猜到了，皱起眉头，甩了一下头，推开他的手。

“不，拿着吧，”他低声含糊地说，把信封塞到她的怀里，然后像烫了手似的皱起眉，嘴里哼哼着，跑回自己房间去。

此后，他在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走动，一想起刚才这个场面，他身子就痉挛，甚至跳起来，大声地叹气，好像有什么肉体上的疼痛。他所参与的生活，新的环境，同事和战争，在这方面帮了他忙。他在其中生活的时间越长，忘得越多，最后果然彻底地忘却了。

只有一次，战争结束后，他想见见她，顺路去了姑妈家，得知卡秋莎已不在姑妈家。他被告知，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她们去生孩子，在某地生了孩子，姑妈听说她完全变坏了。

可是现在这奇怪的意外促使他回想起以往的一切，要求他承认

自己没有心肝、残忍、无耻，背着这种良心受责备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整整10年。

不过，要他承认这一切现在还远着呢，现在他一心想的只是事情千万别让人知道，她和她的辩护人千万别将事情和盘托出，别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名誉扫地。

糊涂的审判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法庭，走进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停地吸着烟。

犯人们也已经被带出去了，现在又被带了回来。法庭里多了几张新的面孔都是证人，而聂赫留朵夫注意到，玛丝洛娃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坐在栏杆前面一排的胖女人。

这个胖女人穿着华丽的丝绸和天鹅绒面料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饰有蝴蝶结的高高的帽子，露到肘部的胳膊上挽着一个精致的小手提包。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之一，是玛丝洛娃曾经所在的那个妓院的老鸨。

卡秋莎看了看这个女人，接着突然把目光移到陪审员那边，最后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很严厉。她那双严肃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而这双异样的眼睛有一段时间一直盯住了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尽管心惊胆战，但是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眼白闪亮、清楚的斜睨的眼睛。

他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夜雾弥漫，低处的小河里冰层在破裂，尤其是那弯两角朝下的残月，在破晓前升起，照着那黑漆漆、阴森森的一片混沌。这双现在正在看着他的乌溜溜的眼睛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一片混沌。

“她认出我来了，”他想。他把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是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去看庭

长了。

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噢，但愿快点结束，”他想。

他现在的心情就像他出去打猎时不得不杀死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他感觉到同样的厌恶、怜悯和烦恼。那只受伤的小鸟在猎袋里挣扎，有一个他是在佯装没事但其实心中充满了怜悯，而另一个他只想着快点把它杀死、忘掉。此刻，聂赫留朵夫坐着听对证人的询问时，他的心中就充满了这种复杂的情绪。

可是，就像故意折腾他似的，这宗案件拖了很长时间。先是逐个儿询问证人和鉴定人，再就是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一本正经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提请陪审人员检查物证，其中有一只带梅花形钻石的戒指，戒指很大，显然原来是戴在很粗的食指上的，还有一个滤器，里面有化验出来的毒药。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贴着标签。

物证检察完毕，庭长宣布审讯工作结束。

根据刚才法庭里的所有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聂赫留朵夫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下毒两方面都是清白的，而且他深信所有其他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当他看到那个商人拙劣的辩护，陪审团主席的坚持，尤其是所有人的倦怠，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他便很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又害怕他这么做会让他和玛丝洛娃的特殊关系被大家发现。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那几个犯人。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地在栏杆后面的士兵前面坐着。玛丝洛娃正在微笑，一种邪恶的感情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蠢蠢欲动。

就在此前，知道她会无罪开释并想到她将留在城里，他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和她保持任何一种关系都会很难，但是西伯利亚和劳役拘禁立马就斩断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各种可能性。那只负伤的小鸟将停止在猎物袋里挣扎，而他也不再会想起它的存在。庭长拿起判决书，宣读起来：

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依照诸位陪审先生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

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33岁，小市民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年27岁，剥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8年，玛丝洛娃4年，二人皆承受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

小市民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年43岁，剥夺一切公权及特权，没收其财产，处以3年徒刑，并承受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负担，如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一律变卖，戒指追回，酒瓶销毁。

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对着整个法庭大叫起来。“这是冤枉人。我没有罪。我没有那种坏心，连想都没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全是实话。”她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不行，这事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掉刚才那种卑鄙的心情，自言自语道。急忙往回走，要见见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了。

“我一定要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来减轻她的厄运，而且要赶快做。马上就动手。对，我应当就在这儿，在这个法院里，打听清楚法纳林或者米基申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这两个著名的律师。聂赫留朵夫回到法院里，脱掉大衣，走上楼去。不过他在头一道走廊上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法纳林，说有事要跟他商量。法纳林认得他，也知道他的姓名，说很愿意为他出力。

他跟律师谈了一番话，再加上他已经决定采取措施为玛丝洛娃辩护，就使他越发心安了。他走到外面。天朗气清，他快活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

他想起柯察金家的宴会，就看了一下怀表。时候还不算迟，还能赶上宴会。一辆公共马车响着铃铛开过来。他就紧跑几步，跳上车去。到了广场，他下车，雇了一辆漂亮的街头马车坐上去。10分钟以后，他的马车就停在柯察金家的大厦门口了。

“请进，老爷，他们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的肥胖的看门人

亲热地说，无声地打开了安装英国造的铰链的橡木大门。“他们正在吃饭，不过吩咐请您一到就去。”

聂赫留朵夫登上楼梯，然后沿着熟悉的宽敞华丽的大厅走到餐厅。餐厅的桌边围坐着全家人，只有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不在场，她从来不出她的房间。

“嗯，请坐，我们刚在吃鱼，”老柯察金费劲地、小心翼翼地用假牙嚼着说道，并抬起布满血丝的、看不见眼睑的双眼望着聂赫留朵夫。

尽管聂赫留朵夫与老柯察金很熟悉，多次在饭桌上见过他，可是今天不知怎的，他那张红脸，他那张在坎肩上衬着的餐巾上方两片津津有味地吃着的嘴唇，尤其是养得肥肥壮壮的将军式的身躯，使人看了特别讨厌。

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以往听说的此人的残忍，他在担任某个地区的长官的时候，天知道为了什么常常鞭打甚至绞死人，其实他有钱有势，不必借此邀功请赏。

聂赫留朵夫围着餐桌绕行一周，与大家一一握手。除了老柯察金、太太和小姐，其他人在他走近时都起立。这样绕行一周，与所有的人逐一握手，尽管其中大多数人他从未与他们说过话，他今天仍觉得特别厌烦、可笑。

他为晚到道了歉，打算在桌子尽头，米西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空位子上坐下来，但是老柯察金要求他，即使不喝伏特加，也要坐到摆有龙虾、鱼子酱、干酪、鲱鱼的那张桌子旁边吃一点。聂赫留朵夫没有料到自己饿到这个地步，一开始吃夹干酪面包，竟然停不住嘴而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聂赫留朵夫到这儿来是为了散散心。他在这个宅院里总是感到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使他心情快乐的、格调优美的豪华，而且因为有一种奉承的热情气氛在无形之中攫住了他。

然而今天，事情却很奇怪，这个家庭的一切都使他讨厌，从看门人、宽阔的楼梯、花卉、仆人、桌上的摆设到米西本人，一切都使他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令人喜爱，而且显得矫揉造作。

“我看得出来，您遇到什么事情了，”她说，“您怎么啦？”他想起在法庭上遇见了卡秋莎，便皱起眉头，涨红了脸。

“是的，我是遇到一件事，”他说，很想表示诚实，“而且是奇怪的不平常的大事。”

“什么事？您不能说吗？”

“现在不能说。请原谅我不说。发生的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及仔细考虑，”他说，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那么您也不能对我说喽？”她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她推开了原先抓着的椅背。

“是的，我不能说，”他感觉到，他回答她就像回答自己一样，承认自己的确遇到一件重大的事情。

当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终于让自己确信聂赫留朵夫心绪不佳，谁也没有办法把他引入一场愉快有趣的谈话后，她便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问他对一出新戏的看法。她问话的口气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够让一切疑问终有定论，这个意见中的每一个词都将永垂不朽似的。

柯洛索夫对这出戏及其作者都批评了一通，而这又引发他发表了其对艺术的见解。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一方面试图为这出戏辩护，一方面却又似乎为他见解的正确性所折服，于是只好要么马上让步，要么至少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看着，听着，但是却根本没有看进去、听进去他眼前所正在发生的一切。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类似一匹马被人爱抚着以便让它顺从，继而在它嘴里塞进马嚼子、让它戴上马具时所必然会有感觉，而今天他比以往时候都更不愿意拉车。

他为自己道歉，说他必须回家，并开始告辞。

“又无耻又卑鄙，又卑鄙又无耻，”聂赫留朵夫步行回家，在熟悉的街道上走着，心里这样想着。

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有约束力的话，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跟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可是今天他切切实实感觉到，他不能同她结婚。

“又无耻又卑鄙，又卑鄙又无耻，”他反复地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对米西的态度，而是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卑鄙无耻，”他走进自己家的门廊，还一再地在心里这样说。

“不行，不行，”他想到，“必须脱身，斩断跟柯察金一家人、跟玛丽娅的一切虚伪关系，斩断同遗产、同其他一切一切的不应有的关系，是的，要自由地呼吸。到国外去，上罗马去，去画我的画。”

他想起他怀疑过自己的才气，“噢，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呼吸就行。先上君士坦丁堡，再上罗马，只是要快点儿辞去陪审职务。还要跟律师一起把这宗案子料理好。”

于是一下子就在他的脑际异常真切地浮现出那个乌黑的眼睛有点儿斜视的女犯的身影。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

他急忙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就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踱了起来。于是，他和她度过的时光又像一幅幅画面出现在他的脑际。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相逢，想起当时他控制不住的兽欲，想起兽欲满足后他的扫兴心情。他想起雪白的连衣裙和天蓝色腰带，想起那次晨祷。

“我确实爱过她，那天夜里我是真心爱她，那爱情是纯真而美好的，而且以前，在我第一次住在姑妈家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就爱上她了，那是多么爱呀！”怎样才能补偿自己对卡秋莎犯下的罪孽？决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能把我爱过的女子丢开不管，不能满足于花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补偿罪过，不能像当年那样，给她一些钱，就以为该做的都做到了。”

于是他十分真切地想起那时候，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给她，就跑开了。

“哼，那笔钱！”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又像当时那样感到恐慌和厌恶。“哼，哼，多么卑鄙呀！”他也像当时一样说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就是，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他出声地说起来。“不过，难道真是这样吗？”

他停住脚，不再走动，“难道我真是坏蛋，难道我确实确实是坏蛋？然而不是我又是谁呢？”他回答自己说。“再者，莫非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露他自己。

“莫非你跟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以及她的丈夫的关系就不丑恶，不下流？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认为财产不合理，可是你又借口说那些钱是你母亲的，就放手用起来。还有你那游手好闲的、肮

脏的全部生活。而这一切的顶峰，也就是你对卡秋莎的行径。”

“你这坏蛋，流氓！随别人爱怎样评断我就怎样评断我好了，我能够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于是他忽然明白了，近来他对人，尤其今天他对公爵、公爵夫人，对米西、柯尔尼感到憎恶，实际上也是憎恶他自己。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卑鄙的心情之中有难过也有喜悦与欣慰。

聂赫留朵夫这一生进行过不止一次“灵魂大清扫”。往往过了一大段时间之后，他忽然觉得内心活动不通畅，有时甚至完全停顿，他就开始清除堆积在灵魂中而成为停顿的原因的种种污垢。他把这种精神活动情形称作灵魂大扫除。

在这样的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要给他自己定出一些规则来，打算从此以后永远遵守，例如写日记，开始过新的生活，希望这种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改变，也就是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翻开新的一页”。然而每一回，人世的诱惑总是降伏了他，他不知不觉地又堕落了，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

他这样清扫和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第一次便是在那年他上姑妈家消夏的时候。那是最有生气、精神最振奋的一次醒悟，其效果也保持得相当长久。

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进了军队，甘愿为国捐躯，这时也有过这样的醒悟。可是很快地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又有一次醒悟，那是在他辞去军职，出国学习绘画的时候。

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清扫了，所以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悬殊过。他看到这样的差距，感到十分惊惧。这个差距那么大，污垢又那么多，起初他灰心了，认定不可能打扫干净。

“要知道，你已经尝试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打算变得好一点，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诱惑者的声音在他的灵魂里说，“那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嘛，”这个声音说。

然而，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的身上觉醒，只有这个人才是真实的，只有他才是强大的，只有他才是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人和他希望成为

一个什么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可是对已经觉醒的精神的人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论花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冲破束缚我的虚伪罗网，我要承认一切，对一切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出声地说，“我要老老实实对米西说，我是一个浪荡子，不能和她结婚，只是白白地搅乱了她的心。我要对首席贵族的妻子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说实话。不过，对她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要对她的丈夫说我是坏蛋，欺骗了他。对于遗产，我也要处理得合乎真理的原则。”

“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不起她，我要尽一切可能减轻她的痛苦。是的，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是的，我要请求饶恕，像小孩子一样求饶。”他站了起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就跟她结婚。”

他停住，照他小时候常做的那样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往上看，对一个什么人说：“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的心里住下，清除我心中的一切污垢吧！”

他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的心里来住下，清除他心中的一切污垢，同时他所要求的那些事就已经实现了。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这时候，凡是人能做的最好的事，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他自己都能够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那又是好的泪水，又是坏的泪水。其所以是好的泪水，那是因为精神的人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他的心里沉睡，然而现在却在他的心里醒过来了，他就流下了欢喜的泪水；其所以是坏的泪水，那是因为这是自怜自爱的泪水，为他自己的美德所感动的泪水。

他觉得浑身发热。他走到一个已经卸下冬季套窗的窗口，推开窗子。窗外是花园。那是月夜，没有风，空气清新。车轮在大街上“辘辘”地响了一阵，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在窗子的紧跟前，现出一棵高大的杨树的阴影，光秃秃的树枝影子犬牙交错，清楚地印在一块打扫干净的小空场的沙土地上。左

边是堆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发白。

正面，树木的枝丫交织在一起，后边现出一道围墙的黑影。聂赫留朵夫瞧着被月光照亮的花园和房顶，瞧着杨树的阴影，吸进清爽新鲜的空气。“多么好啊！多么好啊，我的上帝，多么好啊！”他说，指的是他灵魂里所起的变化。

玛丝洛娃一直到18时才回到她的牢房里。她已经走不惯路，如今却在石头路上步行了15俄里，筋疲力尽，脚都走痛了，而且那个严厉得出人意外地判决弄得她垂头丧气，此外她的肚子也饿了。玛丝洛娃坐在那儿，把两只手揣在长囚衣袖管里，低下头，呆望着前面两步开外一块踏脏了的地板，直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3个卢布的时候，她才略为振作起来。

“你是玛丝洛娃吧？”他问。“拿去，这是一个太太送给你的，”他说，把钱交给她。这笔钱是妓院的女掌班基塔耶娃打发他送来的。玛丝洛娃得到了钱很高兴，因为这笔钱可以使她得到她现在一心巴望得到的那种东西了。

“只求能弄到一支纸烟，抽上一口就好了，”她暗想，她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这种吸烟的欲望上。她实在想抽烟，就拼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

囚禁玛丝洛娃的这间牢房是个长方形的房间，长9俄尺，宽7俄尺，有两个窗户，一个占地很大的灰泥剥落的大火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铺占去整个房间2/3的空地。

正对牢门的那堵墙中央挂着发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圣像下边挂着一束满是灰尘的蜡菊。门后左边一块发黑的地板上放着一个臭气熏人的木桶。晚点名刚刚进行过，女人们已被锁在牢里过夜。

那天夜里玛丝洛娃很久都睡不着觉，躺在那儿，睁大眼睛瞧着房门，同时教堂诵经士的女儿不住地走来走去，每次路过都把房门挡住。她想起很多人，然而单单没有想起聂赫留朵夫。

她的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是从来也不去回想的。那样做未免太痛苦。那些往事的记忆，已经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心底里一个深深的地方。她就连做梦也从没梦见过聂赫留朵夫。

今天她在法庭上并没有认出他来，这与其说是因为她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军人，没有留胡子，只留着小小的唇髭，鬃曲的头发虽然短，可是浓密，而他现在却已经显出老态，留了一把胡子，还不如说是因为她从来也没想过他。

她已经在—个可怕的和漆黑的夜晚，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到他姑妈们家里去的那个夜晚，把她过去跟他发生过的事情的全部回忆统统埋葬了。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本来抱着希望，以为他会来—趟，然而从那天夜晚起，一切都变了。

姑妈们本来在等候聂赫留朵夫，要求他顺路来—趟，可是他打来—个电报，说是他不能来，因为他得按照限期赶到彼得堡。卡秋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决定亲自到火车站去跟他见面。那列火车深夜2时经过此地。

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小姐上床睡下以后，怂恿—个小姑娘，厨娘的女儿玛什卡跟她—块儿去。她穿上半高腰的旧皮靴，戴上头巾，提起衣裙，往火车站跑去。

那是秋季的夜晚，天色漆黑，下着雨，刮着风。天上时而“哗哗”地落下温暖的大颗雨点，时而那雨又停了。在野外是看不清脚下的道路的，树林里黑得像炉子里—样。

卡秋莎虽然对这条路很熟，却还是在树林里迷了路。那列火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只停3分钟，她本来希望在火车到达以前赶到车站，可是等她跑到那儿，第二遍铃都已经响过了。

卡秋莎跑到月台上，顿时在头等客车的窗子里看见他了。这辆客车里灯火分外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靠椅上，没有穿上衣，在打纸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流油的粗蜡烛。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白色的衬衫，坐在靠椅的扶手上，把胳膊肘支在椅背上，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笑。

她—认出他来，就举起冻僵的手敲窗子。可是，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慢慢开动，先是往后退—下，然后那些连—起的车厢磕碰着，—个个往前移动。在两个打纸牌的军官当中，有—个站起来，手里拿着纸牌，开始往窗外看。

她又敲了—下窗子，把脸贴到窗子的玻璃上去。这当儿，她面前的车厢也猛地—颤，走动了。她就跟着它往前走，眼睛瞧着窗子

里。那个军官打算把窗子放下来，可是怎么也打不开。

聂赫留朵夫就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放下窗子。火车增加了速度。她加紧步子跟上去，不肯落在后头，然而火车越开越快，一辆二等客车已经从她身旁驶过去，随后好几辆三等客车更快地驶过去，不过她还是跑个不停。

等到尾部挂着一盏提灯的最后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四外没有一点遮拦了。风朝着她刮过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她迎风那一面的衣裾裹紧了她的腿。她的头巾被风刮得从头上掉下来，可是她仍旧在跑。

“阿姨，卡秋莎阿姨！”那个小姑娘喊道，几乎追不上她，“您的头巾掉下来了！”

“他，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卡秋莎暗想，停住脚，把她的头往后一仰，伸出两只手来抱住头，放声大哭。

“他走啦！”她大叫一声。

小姑娘心里害怕，抱住了她淋湿的连衣裙。

“阿姨，我们回家去。”

“过一会儿一列火车开过来，我索性往车轮底下一跳，就此完事。”卡秋莎这当儿暗自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决定照这样办。然而这时候，如同人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所常有的情形那样，他，她肚子里的小娃娃，他的小娃娃，突然颤动一下，使劲一顶，慢慢伸开四肢，不知用一种什么很细、很软、很尖的东西又顶了一阵。

于是，忽然间，一分钟以前还使得她那么痛苦，觉得似乎没法活下去的种种事情，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报复他的愿望……

总之，那一切，忽然统统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把头巾扎好，匆匆走回家去。

探 监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就走出了家门。

昨天晚上下了头一场温暖的春雨。各处，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忽然生出了碧绿的青草，花园里的白桦树上点缀着绿油油的绒毛，稠李树和杨树抽出了清香的长叶。住宅和商店的冬季套窗已经卸掉，窗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小饭铺里已经挤满人，其中有不必要到工厂去上班的男人，穿着干净的长上衣和发亮的皮靴；也有女人，头上戴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镶小玻璃珠的外衣。

警察们挎着用黄带子系着的手枪，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留心察看有没有发生什么纠纷，以便借此排遣他们难忍难熬的烦闷。在林荫道的小径上，刚刚变绿的草地上，有些孩子和狗跑来跑去玩耍。快活的保姆们坐在长凳上聊天。

聂赫留朵夫所坐的那辆街头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的门前，走到通往监狱去的路口就停下来了。

这儿，在这个通到监狱去的路口上，离监狱大约有100步远，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大都带着小小的包袱。

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房，左边有一幢两层的楼房，挂着一个什么招牌。监狱本身那座砖砌的大厦就在前边，然而探监的人是不准走过去的。有一个站岗的兵荷着枪走来走去，谁要从他身旁绕过去，他就严厉地叫住谁。

右边，在岗哨的对面，木房的小门旁边，有一个看守在长凳上坐着，穿一身镶着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簿子。探监的人走到他跟前，说出他们希望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在簿子上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说出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这个姓名。制服上镶着丝绦的看守就记下来。

“为什么现在还不让人进去呢？”聂赫留朵夫问。

“那边正在做礼拜。过一会儿礼拜做完了，就放人进去。”

聂赫留朵夫走开，回到等候探监的人群那边去。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寒酸，甚至破烂，不过也有些男人和女人从外表看来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正在跟一个探监者讲话，正中开着一个小窗口的监狱大铁门打开了，从门里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外一个看守。那个手拿簿子的看守就宣布说，现在开始放探监的人进去。

岗哨退到一旁，所有探监的人仿佛生怕迟了就进不去似的，一齐加快脚步，有些人甚至是一路小跑，往监狱的门口涌去。

聂赫留朵夫放慢了脚步往前走，让性急的探监人走到他前面去。他百感丛生，想到关在这儿的恶人就害怕，随后想到那些没有犯罪而囚在此地的人。

例如昨天的男人和卡秋莎，又感到怜悯，再想到他马上就要同卡秋莎见面，却不由得胆怯和动情。他发现一个身材不高、身子瘦弱、留着唇髭、佩戴着军官肩章的人正在人们背后走动，于是就去找他。这人是副典狱长，他听了聂赫留朵夫的话后说：

“要是想去女探监室，请朝这边走。”他显然根据聂赫留朵夫的外表断定，这是值得他关照的人。“西多罗夫，”他对一个留着浓密的唇髭，佩着几枚奖章的军士说，“带这位先生去女探监室。”

“是。”看守领着聂赫留朵夫出了男探监室，来到走廊上，随即又打开对面一扇门，将他带进女探监室。

这个房间与男探监室一样，也用两道铁丝网隔为3个部分。不过这个房间要小得多，两道铁丝网之间也有监狱官员走动。这里的监狱官员是一个女看守，她也穿着袖子上镶有金银饰带和滚着蓝边的制服，腰里扎着和男看守一样的宽腰带。

“您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之间走动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道。

“找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勉强说出口。

“玛丝洛娃，找你的！”女看守喊道。

玛丝洛娃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抬起头，挺直她的胸脯，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那种神情，走到铁丝网跟前，夹在两个女犯人中间，惊讶而探问地定睛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凭他的装束看出他是有钱人，就微微一笑。

“您是找我的吗？”她说，把她那张生着斜睨的眼睛的笑脸凑

到铁丝网上来。

“我想要跟……”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说“您”好，还是说“你”好。随后他决定应该说“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要跟您见一面，我……”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话，不过他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忽然间使她想起了他。可是她不相信。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开始痛苦地皱起额头。“我听不见您说的话，”她喊道，眯细她的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

“我来……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暗想。他刚想到这儿，眼泪就涌上他的眼眶，使得他的喉咙发堵。他就伸出手指头抓住铁丝网，说不出话，极力按捺自己，免得哭出声来。玛丝洛娃看见他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您像是……可是我认不清了，”她叫道，眼睛没有看着他。她那忽然涨红的脸变得越来越阴沉。“我来是要求你宽恕我，”他大声喊道，声调呆板，像是在背书似的。

他喊完这句话，觉得羞愧，往四下里看一眼。不过他立刻暗想，如果他羞愧，那倒更好，因为他理应承担这种耻辱。他就继续大声说道：“请你宽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他又喊道。

她站在那儿不动，她那斜睨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他。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就从铁丝网那儿走开。他胸膛里不住翻腾，差点放声大哭，可是极力忍住了。

副狱长指点聂赫留朵夫到女犯人的房间去以后，分明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自己也到这个房间来了。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丝网那儿，就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要会晤的女犯人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子，打起精神，极力做出镇静的样子，回答说：“我隔着铁丝网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狱长沉思不语：“哦，好吧，暂时把她带到这儿来也行。玛丽娅·卡尔洛夫娜！”他转过身去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边门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近前，站住，从眉毛底下看了他一眼。

她乌黑的头发还像两天前那样卷成卷，一圈圈飘在额头上，她

的脸虽然有点病态和浮肿，却仍然很吸引人，而且十分镇静，只有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在臃肿的眼皮底下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在扫视着。

“你们可以在这里谈话，”副典狱长说道，然后就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朝靠墙的一条长凳走去。玛丝洛娃满脸疑问地瞧了瞧副典狱长，然后充满惊讶地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一下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他刚开口，却又停住。他的泪水又将他哽住了，“不过，虽然我无法抹去过去，但我现在愿意尽我所能地去做。告诉我……”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既没有从他身上挪开，也不像在看他。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他说，“我在做陪审员。您没有认出我吗？”

“是的，我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功夫认人。我甚至连看也没看，”她说。

“您不是有一个孩子吗？”他问道，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

“感谢上帝他很快就死了，”她简短而愤恨地答道，眼光从他身上挪开。

“怎么会死的？是什么原因？”

“我当时自己都病得快死了，”玛丝洛娃说道，没有抬起她的眼睛。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呢？”

“谁还会要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仆呢？她们刚一发觉就把我赶出来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件事全都了结了。”

“不，没有了结；我想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已经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而且都过去了。”玛丝洛娃说道。然后，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又妖媚又可怜的方式微微一笑，看了他一眼。玛丝洛娃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又见到他，而且肯定不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当她刚开始认出他来时，她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她从不愿回想的

往事。

在最初的那一刻，她模模糊糊地回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美妙新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个爱她也为她所爱的迷人男青年为她打开的。接着她想起了他那令人无法理解的残忍，想起了那一整串的屈辱和痛苦，这些都是紧跟着那醉人的欢愉之后，并从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

她觉得心里很难受。但是，她无法理解这种感受，便按现在她所一直习惯去做的那样去做：她用一种堕落生活的迷雾将这些记忆全部罩住，以此来使自己摆脱它们。在最初的那一刻，她把现在坐在她旁边的这个男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是这令她感到痛苦，她便又将他们分开。

现在这个衣冠楚楚、精心装扮、胡子上洒过香水的绅士不再是她曾经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只是那些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玩弄像她自己这样的玩物的人当中的一个，而像她自己这样的玩物也必须尽她们所能利用他们来多捞些回报，而这也就是她现在带着一种媚笑看着他的原因。她一声不吭，盘算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他。

“那事全都结束了，”她说道，“如今我被判要去西伯利亚。”当她说出这个可怕的词时，她的嘴唇都颤抖了。

“我知道，我确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当然没有罪；难道我会是个小偷或者强盗吗？这儿的人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应该上诉，只是据说这很贵。”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道，“我已经和一名律师谈过了。”

“别舍不得花钱，必须得是个好律师，”她说。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去做的。”

他们都沉默了，接着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我点钱，如果您可以的话，不多就10个卢布。”她突然说道。

“好的，好的。”聂赫留朵夫说道，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伸手去摸他的皮夹子。

她迅速地瞅了一眼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副典狱长。

“别当着他的面给，他会拿走的。”

等到副典狱长刚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他的皮夹子，但是却没来得及在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面对他们之前把那张10卢布钞票递给她，于是只好把钞票捏成团握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暗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却不再纯洁的浮肿的脸，以及从那双乌黑的斜睨眼睛里射出来的妖媚的光芒，这双眼睛刚刚正紧盯着他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现在又追随着副典狱长的一举一动。一时间他的内心犹豫了。

“卡秋莎，我是来请求你饶恕我的，而你还没有给我答案。你饶恕我了吗？或者你以后会饶恕我吗？”他问道。

她没有听他在说什么，却只是一会儿瞧瞧他的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后者刚一转身，她赶紧伸出她的手，抓住那张钞票，把它藏到她的腰带里面。

“这话真怪，您在说什么，”她带着一种在他看来似乎充满鄙夷味道的微笑说道。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要知道，我了解你，我记得以前在帕诺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何必提那些老事，”她干巴巴地说。

“我回想起这些是为了改正我的过错，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口了，本来打算说明他要跟她结婚，可是碰到她的目光，看出这目光里有一种那么可怕的、粗鲁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东西，他就说不出口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们开始走出去。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会晤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就站起来，温顺地等着人家把她押回监狱去。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跟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法再说了。”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伸出一只手去。“我以后还会来的。”

“好吧，那您就来吧；为什么不呢？”她说着，微笑起来，那是一种她给她想要取悦的男人的微笑。

“对我来说，您比妹妹还要亲，”聂赫留朵夫说道。

“这话真怪，”她再次说道，摇了摇头，向铁丝网后面走去。

在第一次相见时，聂赫留朵夫原以为，卡秋莎见到他，听到他有意为她尽心尽力和表示悔恨，一定会高兴和感动，于是卡秋莎又成为卡秋莎，然而，使他心寒的是，他看出来，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现在的玛丝洛娃。这使他又吃惊又害怕。

聂赫留朵夫有心要改变他的外部生活：退掉大住宅，辞掉他的仆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可是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再三对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天以前改变生活状况，因为夏天是没有人承租住宅的，而且也总得有个地方住人和存放家具什物才行。所以聂赫留朵夫固然想改变他的外部生活，可是他的全部努力都落空了。

“现在既然玛丝洛娃的案子还没解决，那就犯不上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况且这样做也太困难。反正等到她释放出来，或者流放出去，而我也跟着她走的时候，一切都会自动改变的。”

在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坐上马车去找他。聂赫留朵夫走进这个住宅，在接待室里遇到许多要求律师接见的人。如同在医师的候诊室里一样，他们排了轮次等着接见，垂头丧气地在几张桌子旁边坐着，桌上放着画报，供他们翻阅消遣。

律师的助手也在这儿挨着一张很高的斜面办公桌坐着。他认出了聂赫留朵夫，就走到他跟前同他打招呼，说他马上去报告主人。可是律师的助手还没来得及走到办公室门口，房门正巧开了，传出响亮而活泼的谈话声，那是一个年纪不轻、身材矮胖、脸色通红、唇髭浓密、穿着全新的衣服的男人和法纳林本人在谈话。两个人脸上都现出凡是刚办完有利可图而又不大正当的事情的人所常有的那种表情。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聂赫留朵夫，说道。

“谢谢，我是为玛丝洛娃的案子来的。”

“对，对，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个案子。我已经把案卷仔细看了一遍，可是就像屠格涅夫说的一样，‘不赞成它的内容’，也就是说那个糟糕的辩护人不中用，没有给一切上诉理由留下余地。”

“那么您决定怎么办呢？”

“情形很糟糕，好的上诉理由已经没有了，不过呢，讲到上诉，总还是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我写的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起来，把某些没有趣味的公文套头很快地跳过去，特别着重地念其余的部分。他停住嘴。显然，尽管他办这种事已经十分习惯，可是仍旧津津有味地听他自己的文章。最后他说：“这事得快点办，要不然他们都会走掉，那就得再等3个月。哦，还有，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向皇上递状子。那也要靠幕后的活动。在这方面我也愿意效劳，那就是说不是在幕后活动方面，而是在写状子方面。”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费。”

“我的助手会把一份誊清的状态子交给您，他会对您说明的。”

“我还有件事要问您。检察官给了我一张许可证，批准我到监狱里去探望那个人。可是监狱里的人对我说，如果要在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以外探监，那就还得经省长批准。是要这样吗？”

“对，我想是要这样。然而目前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不过这个人十足的蠢货，恐怕您找着他也是什么事都办不通的。这个人是马斯连尼科夫。”

“我认得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一份已经抄好的状子交给聂赫留朵夫，后来听到他问起酬劳费，就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指定1000卢布，同时又解释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本来不办这样的案子，这一回是看在聂赫留朵夫的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名？要由谁签名？”聂赫留朵夫问。

“这可以由被告自己签名。如果这样做不方便，那么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受到她的委托，也可以签名。”

“不，我去一趟，由她自己签名好了，”聂赫留朵夫说，暗自庆幸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规定的日子之前同她见面了。

到了规定时间，监狱的走廊里响起了看守们吹的哨音，铁锁“哗哗”响着，走廊的门和牢房的门都打开了，光脚和穿棉鞋走路的声音“噼里啪啦”地响起，倒粪桶的囚犯沿着走廊走过，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臭气，男囚犯和女囚犯们洗完脸，穿上衣服，来到走廊上接受点名，早点名之后就取开水冲茶。

聂赫留朵夫在门厅里等了很长时间。到达监狱后，他按响了入口的门铃，把检察官的许可证递给了接待他的值班看守。

就在这时，司务长从侧门出来，脸上又光又滑，八字胡上香烟缭绕，制服上的金色绒条闪闪发亮，对看守说话时语气严厉。

“你怎么让人进到这里来？带到办公室去。”

“我听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道，对司务长脸上焦虑不安的神情感到奇怪。司务长再次对聂赫留朵夫说：“您不能在这里探视；请到办公室去吧！”

聂赫留朵夫正打算离去，典狱长又从后门进来，看上去比他的下属还要慌张，不停地叹着气。看到聂赫留朵夫时，他对看守说：“费多托夫，去把女监5号牢房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

“您请这边走。”他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进到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小房间里。典狱长坐了下来。“我的差事难做啊，很难。”他掏出一支烟，再次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您显然很累了。”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对整个工作都厌烦了，这活儿太费劲了。我试着减轻他们的苦难，却只会变得更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抽身。这活儿难啊，太难！”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典狱长的具体难处在哪儿，是什么，不过他看出典狱长今天格外沮丧，显得无助，令人同情。

“是啊，我想这工作的确太重了，”他说，“您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我有一家人要养活，却没什么财产。”

“但是，既然这么艰难……”

“不过你要知道，还是有可能做点有用的事；我尽可能地让事情有所缓和。换个人肯定跟我的做法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这儿有2000多号人。而且都是什么样的人！必须有人知道如何管理他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要知道，毕竟他们也是人，令人不禁想要怜悯她们。”

看守带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故事就此被打断。

在玛丝洛娃注意到典狱长之前，聂赫留朵夫就已经看见她了。她的脸红彤彤的，轻快地跟在看守后面，边微笑边轻轻摇着头。一见到典狱长，她立刻变了，用惊恐的神色盯着他看；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大胆而欢快地和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了音说道，微笑着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这和第一次可不一样。

“这个，我带了诉状来，请您签字。”聂赫留朵夫说道，对于今天她向他致意时的大胆颇感到惊奇。“律师写了一张诉状，您得签个字，然后我们会送到彼得堡去。”

“好啊！那没问题。只要您需要。”她边说，边微笑着眨了眨眼。聂赫留朵夫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走到桌前。

“她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转身问典狱长。

“可以。你坐下，这有支笔，你会写字吗？”典狱长问道。

“我以前写过，”她说，整理了一下裙子和短上衣的袖子。她在桌旁坐下，微笑着用她小而有力的手笨拙地握住笔，笑着扫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聂赫留朵夫告诉她该签什么，并指给她看该在哪儿签。

她深深叹了口气，把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小心地抖掉几滴墨水，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这些？”她问，目光从聂赫留朵夫转到典狱长，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然后又放在纸上。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她手里接过笔。

“好吧，您说吧，”她说道，忽然间像是记起了什么或是感到困倦，脸色变得沉重起来。

典狱长站起身离开，房间里只剩下聂赫留朵夫和她两个人。

带玛丝洛娃到这儿来的那个看守，在离桌子远些的窗台上坐下来。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关键性的时刻到了。他一直在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对她说出主要的话，也就是没有说他要和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告诉她。

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的另一边。这间屋里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内看清了她的脸，看到了她眼角和嘴边的皱纹和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更怜惜起她来。

他用臂肘支着身子，紧紧靠在桌子上，这样说话就只有她能听见，那个坐在窗台上、花白络腮胡子、犹太脸型的看守就听不见了。他开口说：“要是这状子不顶事，那咱们就告御状。凡是能做的，咱们都要做到。”

“是啊，要是以前有个好律师就行了……”她打断他的话说。

“我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子，说真的，大家简直都感到吃惊。这样好的老婆子，可是平白无故坐起牢来，她坐牢，儿子也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所以就坐了牢。她听说我认识您，”玛丝洛娃转动着脑袋，看着聂赫留朵夫说，“她就说：‘你对他说说，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她儿子姓梅尼绍夫。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真的，她可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老婆子呀，很明显是冤枉的。您就行行好，帮她操操心吧，”她说，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去办，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聂赫留朵夫说着，看着她那种大大咧咧的样子，心中觉得诧异。

“不过我想和您谈谈自己的事。您记得上次我对您说的话吧？”他说。

“您说了很多呀。上次您说什么来着？”她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笑，转悠着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请求您饶恕我。”他说。

“哎，怎么啦，老是饶恕呀，饶恕，一点儿也用不着，您最好是……”

“我说过我要弥补我的过错，”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行动来弥补。我决定和您结婚。”

她脸上流露出惊骇的神气。她那斜视的眼睛呆住了，像是在看他，又像不是在看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她恶狠狠地皱着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上帝。”

“怎么又把什么上帝搬出来啦？您说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上帝？什么上帝？当初您要是记着上帝就好啦，”她说过这话，就张大了嘴，不说了。

聂赫留朵夫这时才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气，于是明白了她兴奋的原因。“您安静一点儿，”他说。

“我没有什么安静不安静的。你以为我醉了吗？我就是醉了，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说起来，并且满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原来是……您是老爷，是公爵，用不着来沾

我，弄一身脏。你去找你们那些公爵小姐好啦，我的身价是一张10卢布的红票子。”

“不论你说得多么难听，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着，小声说，“你想象不出，我觉得对不起你，心里有多么难受。”

“我觉得对不起你……”她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那时候你倒不觉得，却塞给我100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知道，可是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到做到。”

“可是我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卡秋莎！”他说着，就去摸她的手。

“你走开，别碰我。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在这儿，”她气得一张脸变了颜色，叫了起来，一面把手从他手里往外抽。

“你是想拿我来拯救你自己，”她继续说着，急不可待地要把心中一股怨气全吐出来，“你今生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拿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一副又肥又丑的嘴脸。你走开，走开！”她“腾”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你吵什么！怎么能这样……”

“请您自便，别管她，”聂赫留朵夫说。

“让她不要太放肆。”看守说。

“不必，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玛丝洛娃又坐了下来，垂下眼睛，两只小手交叉着手指头紧紧攥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旁边，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要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就这样。”

“反正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就是您的事了。不过我一点也用不着您。我这是对您说老实话，”她说。“可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死掉呀？”她又说了一句，并且像诉苦似的哭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的泪水挑动了他的泪水。

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就好像感到吃惊似的，并且用头巾擦起脸上流着的泪水。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说，分手的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身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能行的话，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他，就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哈，好闺女，你现在时来运转了，”等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科拉布列娃对她说。“看样子，他可是真迷上你了，趁他常常来找你，你可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这是实在话，”看道口女人用唱歌般的声音说，“穷人干什么事都很难，有钱人想什么就有什么，想怎样就怎样。好闺女，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体面人，他就是……”

“怎么样，我的事你说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道。

可是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牢房女犯们的话，却躺到床上，一双斜视的眼睛凝望着角落里，就这样躺到天黑。她心里激烈地翻腾着。聂赫留朵夫对她说的一番话，又使她回到她又恨又不理解、受尽折磨之后离开的那个世界。

现在她已经脱离以往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状态，而要带着清醒的记忆生活下去又太苦恼。晚上，她又买了酒，和同牢房的女犯痛饮一场。

四处奔走

“是的，这就是那件事的影响。这就是那件事的影响啊，”聂赫留朵夫走出监狱的时候暗想，直到现在才充分了解他的全部罪恶。要不是他起意赎罪，补救他的行为，就绝不会体会到他罪恶的严重。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看守走到他跟前来，胸前挂满了奖章，脸上做出一副不顺眼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写给您老人家的一封信。”他说，交给聂赫留朵夫一封信。

“是哪个女人？”

“您看过信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女犯人，是政治犯。我在她们那儿管事。所以她才托付我。虽然这种事是犯禁的，不过我出于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守不自然地说。

聂赫留朵夫暗暗吃惊，不明白一个奉派管理政治犯的看守怎么能够就在监狱里，几乎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既是看守，又是暗探。他接过那封信，一边走出监狱，一边把信看了一遍。信上写道：

我听说您关心一个犯刑事罪的人而常到监狱里来，因此我想跟您见一见面。请您要求监狱当局准许您同我见面。

他们会准许您，那我就可以把许多关于那个受您保护的人和我们小组的重要事情告诉您。感谢您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原先在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的地方当女教员。有一回聂赫留朵夫同他的朋友们到那儿去猎熊。这个女教员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笔钱，好让她进高等女校去读书。

聂赫留朵夫就给她一笔钱，后来却把她忘掉了。显然，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做了革命者，如今因为干革命工作而关在监狱里。应当跟她见一见面才对，特别是因为她答应提供一些意见来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醒来后便想起头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不禁觉得恐惧。然而，他尽管感到恐惧，却要用比以前更大的决心将业已开始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他怀着这种责任感走出家门，去找马斯连尼科夫，请求允许他

在监狱里除探望玛丝洛娃之外，再见到那个老太婆母子，因为玛丝洛娃为老太婆梅尼绍夫的事求过他。

此外，他还想请求马斯连尼科夫准许他见见对玛丝洛娃有利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马斯连尼科夫见到聂赫留朵夫便满脸堆笑。他的脸仍然那样肥胖而红润，身躯仍然那样魁梧而壮实，衣着仍然像在军队里那样考究。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用惊惧而严肃的口吻说，似乎还带着戒备。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关心，我想去看望，不是在探监室里，而是在办公室见面，不光是在规定的探监日子，而且要在规定以外的日子。我听说，这件事你可以作主。”

“不用说，我亲爱的，我随时准备为你做任何事情，”马斯连尼科夫说，两手摸摸他的膝盖，似乎想显得亲近些，“这件事可以作主，不过，你知道，我是临时君王。”

“那么你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让我与她见面吗？”

“是个女人？”

“不错。”

“那么她犯了什么罪？”

“投毒。不过对她的判决不恰当。”

“那么你请了哪位律师？”

“我请了法纳林。”

“唉，法纳林！”马斯连尼科夫皱起眉说，他想起去年就是这个法纳林，在法庭上盘问他这个证人，并以特别恭敬的口气捉弄了他半个钟头，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倒劝你别跟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个名声不好的人。”

“我还求你一件事，”聂赫留朵夫并不回答他。“我很久以前认识一个姑娘，是个教师。她是个很可怜的人，现在也关在监狱里，可她想和我见次面。你能不能给我开一张去看她的许可证？”

马斯连尼科夫微微侧着头沉思。“这是个政治犯？”

“是的，听说是。”

马斯连尼科夫不赞成地摇摇头，走到桌子旁边，在一张印着头衔的纸上麻利地写道：“兹准许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内会晤在押小市民玛丝洛娃及医士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他写完，签上豪放的花字。聂赫留朵夫从马斯连尼科夫家出来后直接乘车去监狱，来到已经认识的典狱长的住处。

眼镜上缠着绷带的仆人说典狱长在家，并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一间小客厅，里面有一张沙发，前面桌子上的一块编织物上放着一盏大台灯，粉色灯罩的一边已经被烧过了。典狱长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惯常的忧郁和厌倦的神情。

“请坐。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他说，同时扣上制服中间的一粒纽扣。

“我刚刚去了副省长那里，从他那儿拿到这张许可证。我想探视犯人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典狱长问道，由于音乐声没能听清。

“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太方便见她。”典狱长说。“这是为什么？”

“噢，您要知道，这都是您自己的错。”典狱长微笑着说，“公爵，您不要把钱交到她手上。如果您愿意，把钱交给我，我会替她保管。您瞧，您昨天肯定给了她一些钱；她买了酒，今天她喝得很醉，甚至还发起酒疯来。”

“那么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一个政治犯，我能见见她吗？”“是的，如果您想见的話。”典狱长说，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来到监狱。他们一出现，大门就立即打开了。看守们都把手举到帽子上，目送着典狱长走过去。典狱长拖着疲倦的步子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门厅。

“您要见的人是谁？”

“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噢，她在塔楼。您得等一会儿。”他说道。

“那我能不能同时看看犯人梅尼绍夫母子，他们被控纵火。”

“噢，是的，21号牢房。可以把他们叫来。”

“我不可以去梅尼绍夫的牢房见他吗？”

这时，穿着漂亮的副典狱长从边门走了进来。

“来，把公爵带到梅尼绍夫的牢房，21号。”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再把他领到办公室，我会去把她叫来，她叫什么名字？”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牢房的门都开着，一些犯人在走廊里。副典狱长向看守们微微点头示意，目光斜瞟过贴墙而站的犯人，他们则蹑手蹑脚溜回自己的牢房，或者像士兵一样站着，手放在两边，目送着长官。走过一个走廊之后，副典狱长把聂赫留朵夫引向左边的另一个走廊，走廊里只有一个老看守，忧愁的脸上满是皱纹。

“梅尼绍夫在哪儿？”副典狱长问道。

“左边第八间牢房。”

“这些呢？都住满了吗？”

“是的，全部，除了一个。”

看守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强壮的长脖子、留小胡子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站在床前，急急忙忙地在穿囚服，带着一副惊恐的神色看着进来的人。

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带着疑问和惊恐的神情看了看他，又看看看守，又看副典狱长，又回过来看他，那眼神特别使他震惊。

“这位先生想问问你的案子。”

“多谢。”

“是的，有人对我说过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往牢房里面走，在肮脏的铁栏杆窗前站住，“我还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梅尼绍夫也走到窗前，立刻就讲了起来，开头还很胆怯地看着副典狱长，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发什么指示，他的胆子就完全放开了。

他讲的是一个酒店老板在他婚后不久夺走了他的老婆。他到处告状。酒店老板却到处都买通了当官的，当官的就庇护他。有一次梅尼绍夫硬把老婆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要自己的老婆。

酒店老板说没看见他老婆，其实他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她了，叫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和一个伙计打得他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里就起了火。梅尼绍夫和他的母亲就被指控纵火，其实他没有放火，当时他在教父家里。

“你真的没有放火吗？”

“老爷，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定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听说，他刚刚办过保险。起火的时候，我也不在那里。那是他故意说成那一天我和我娘到那里去过。他为了要保险金，自己放火，倒说是我们放的。”

“真是这样吗？”

“一点不假，我这是对着上帝说的，老爷。您就做我的亲爹吧！”

他就想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把他拉住了。

“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我就白白地完蛋了，”他又说。

“谈完了。您别这样灰心丧气，我们能做的一定做到，”聂赫留朵夫说完这话，便走了出来。

聂赫留朵夫顺着宽阔的长廊走回去。长廊里满是人，穿着浅黄色长囚衣和短而肥的裤子，脚上穿着棉鞋，贪婪地瞅着聂赫留朵夫。

他不再往四下里看，急忙走出长廊，往办公室走去。狱长本来在长廊上忙别的事，忘了派人去把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找来。一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他答应过把她找来。

“我马上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坐，”他说。

又瘦又黄、有着一双和善大眼睛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蹒跚着步子从房间的后门走了进来。

聂赫留朵夫问她是如何被关进监狱的。借回答这个问题她开始兴奋地讲起她做的事情。她语言中混合着许多特别的词语，像宣传、解体、社会团体、小组和分组，她似乎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但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听过。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知道监狱里的每个人都会知道玛丝洛娃的生平故事以及聂赫留朵夫和她的关系，建议他设法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里来，或者是去医院，帮助护士照顾病人，目前那里的

病人非常多，需要更多的护士。聂赫留朵夫感谢她的建议，并说他会尽力照着去做。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坐上马车去找律师，把梅尼绍夫母子的案情讲给他听，请求他担任辩护工作。律师听完他的话，就说他要查一查案卷，又说如果事情真像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而那是非常可能的，他就会承担辩护工作而不取分文的报酬。

聂赫留朵夫想起马斯连尼科夫讲过的有关这个律师的话，就什么话也没有回答，起身告辞，坐上马车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家去。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拜托马斯连尼科夫：一件事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一件事是那130个没有身份证的人无辜关在监狱里的问题。尽管向他不尊敬的人去求情，在他是难堪的，不过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他只得照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坐着马车来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家门前，看见门廊附近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有双座的四轮马车等，他这才想起今天恰好是马斯连尼科夫的妻子的会客日，而且马斯连尼科夫约过他来参加这个盛会。

马斯连尼科夫处在一种特别快活兴奋的状态里，原因就是那个显要的人物赏识他。

照理马斯连尼科夫以前在近卫军中工作，本来就接近皇室，似乎应该已经习惯于皇室交往，可是，看样子，不断的交往反而加强了她的卑贱心里。

每一次这类赏识都会引得马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快活。它就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把耳朵贴在头皮上，发疯般地团团转。

马斯连尼科夫正好也准备这样做。他没理会聂赫留朵夫的严肃脸色，也没听他讲话，只顾死命地把他拉到客厅里去，弄得聂赫留朵夫没法拒绝，只好跟着他走。他们走进一个小小的日式书房，在窗子旁边坐下来。

“我又是来说那个女人的事，”聂赫留朵夫说。

“噢，是那个无故问罪的女人。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请求把她转到医院里做女仆。有人对我说，这是办得

到的。”

马斯连尼科夫抿起嘴唇沉思起来。

“未必办得到吧，”他说，“不过，我会跟他们商量，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女帮手。”

“好吧，好吧！我无论如何会给你回音。”

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每一个人类品质的萌芽，有时候显现出一种品质，有时候是另一种，而他则常常变得不像自己，但同时却仍然始终是同一个人。

有些人的这种变化非常迅速，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的人。这些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既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这样的变化现在就在他身上发生。

在参加完审判和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对于新生的狂喜与愉悦之情如今彻底消失了，在上一次探视之后，那种愉悦被恐惧和嫌恶所代替。

他决定不离开她，也不会改变和她结婚的决定，只要她愿意，但现在这件事却令他非常痛苦，饱受折磨。

在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再次到监狱去看她。

玛丝洛娃一个人在等他。她从铁丝网后面走出来，显得安静和羞怯，走到他跟前，没有抬眼看他，说道：“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前天我说了很多错话。”

“不应该由我来原谅你。”聂赫留朵夫开口说道。

“但是都一样，您一定要离开我。”她打断他，用斜视得厉害的眼睛看着他，聂赫留朵夫看到了先前那种不友好和生气的表情。

“为什么我应该离开你？”

“你必须。”

“但是为什么？”

她又抬眼看着他，用那种他认为是生气的眼神。

“嗯，是这样的，”她说道，“您必须离开我。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做不到。您一定得完全放弃。”她的嘴唇颤抖着，沉默了片刻，“是真的。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在这个拒绝里有憎恨和不依不饶的愤怒，但除

此之外还有别的某种美好的东西。对于她之前拒绝的再次肯定，她拒绝得十分镇静，立刻平息了聂赫留朵夫胸中所有的怀疑，恢复了他所感到的与卡秋莎关系里的那种严肃而欢欣的情感。

“卡秋莎，我原来说的话，我还会再说一遍。”他非常郑重地表明，“我请求你嫁给我。如果你不愿意，我会一直跟着你，你被送到哪里，我就会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不会再说什么了。”她回答道，嘴唇再次颤抖起来。他同样沉默，感到无法再说下去。

“目前我会去趟乡下，然后去彼得堡。”他再次镇静下来，说道，“我会尽全力为你的，我是说我们的事，再作考虑，上帝保佑，也许会撤销判决。”

“如果没有撤销也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即使不是这件案子，也会是别的。”她说道，他看到她是多么艰难才忍住眼泪。

“那么，您见过梅尼绍夫了吗？”

接着他告诉她所有他打听到的关于梅尼绍夫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有什么想要的。她回答说不需要。

他们再次沉默。

“噢，至于去医院的事，”她突然说道，用斜视的眼睛看着他，“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会去的，我也不会再喝酒了。”

聂赫留朵夫看着她的眼睛。它们在微笑。

“那非常好。”他只能这么说，然后向她告别。

“是的，是的，她完全换了一个人。”聂赫留朵夫想。所有之前的怀疑都没了，他现在感受到了某种从没经历过的感觉：爱是不可战胜的。

乡 下

两个星期以后，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在枢密院里审理。聂赫留朵夫打算在那以前赶到彼得堡，准备在枢密院里遭到失败以后，就

按写状子的律师所出的主意，向皇帝告御状。

依照律师的看法，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这一点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是很薄弱的。

假定事情真是这样，那么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一起在6月初动身。聂赫留朵夫已经下定决心跟玛丝洛娃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因此，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现在就得先到乡下去一趟，把他在那边的事情料理妥当才行。

聂赫留朵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拥有大片黑土的田产，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住在这个庄园里，后来长大成人，还到那儿去过两次。

有一次他是遵照母亲的要求把一个日耳曼籍的总管送到那儿去，跟他一块儿检查田产的经营情形。所以他早就知道田产的情况，知道农民跟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

如果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改变现行的制度，而且管理田产的又不是他，于是他就会多多少少心安理得，仍旧住在离田产很远的地方，收下从那儿汇来的钱。

然而现在他却做出决定：虽然他就要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同监狱世界发生种种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而这些都是非用钱不可的，可是他仍旧不能容忍事情停留在原先的局面里，一定要改变它，即使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为此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要按照不贵的价钱把土地租给农民，使得农民大体上可以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不止一次把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两相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奴隶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这不能算是问题解决了，不过总算是朝着问题的解决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是暴力由较为粗暴的形式过渡到较不粗暴的形式。这就是他打算做的。

将近中午，聂赫留朵夫坐火车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想使他的生活在各方面都简朴些，事先就没打电报来，却在火车站上雇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小四轮马车。赶车的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总管，不知道他的马车上坐着的就是这儿的主人。聂赫留朵夫故意没有告

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日耳曼人，”赶车的说，他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他坐在那儿，半侧着身子对着乘客，手里一会儿握着他的长马鞭的柄，一会儿又握着长马鞭的梢，分明借此炫耀他的本领，“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3匹草黄色大马，带着他的太太坐着出来兜风，嘿，那派头！”

他接着说，“冬天，到了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圣诞节树。我送客人上那儿去过。那儿点上电灯了，全省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他捞的钱可不少呀！他有什么办不到的：他掌着大权嘛！听说他已经买下一份好田产了。”

聂赫留朵夫认为，不论那个日耳曼人怎样管理他的田产，怎样捞油水，他自己是完全不在乎的。然而腰身瘦长的马车夫所讲的话，他听着却不愉快。

他欣赏美丽的白昼，看到天空中浓密的乌云不时遮住太阳，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推犁，重耕燕麦地，看到茂密而碧绿的草场上空有些百灵鸟在飞翔，看到树林里除了发芽晚的橡树以外所有的树木都已经覆盖着一层嫩绿色，看到草地上点缀着杂色的牛群和马群，看到田垄上有些庄稼人在耕地，可是他看啊看的，有时候又想起有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呢？于是他想起马车夫所讲的那个日耳曼人在库兹明斯科耶怎样作威作福的话。一直等到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着手办事以后，他才忘记那种感觉。

聂赫留朵夫把账目检查一遍，跟总管谈了一次话。总管天真地谈到多亏农民缺少土地，多亏他们的土地被地主的土地围在当中，地主才沾光不少。这却使得聂赫留朵夫越发确定了他的打算：他不再想经营他的田产，而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租给农民。

从账簿上，从他同总管的谈话中，他知道如今跟先前一样，最好的耕地有 $\frac{2}{3}$ 是由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的工具耕种的，其余的 $\frac{1}{3}$ 都雇农民来耕种，每俄亩工钱5个卢布。

也就是说农民为了挣到这5个卢布，就得把一俄亩地犁三回，耙三回，播下种子，然后收割，打捆，或者收割以后送到打谷场，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些工作如果雇自由的和廉价的工人来做，每一俄亩

地至少就要出10个卢布工钱。

凡是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的必需品，农民都得按最贵的价钱折合成工役来支付。他们要使用草场，在树林里打柴，取得番薯的茎叶，就都得做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

这样，田野外围的那些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每俄亩所得到的收入，就比每俄亩地的地价按5分利息计算所能带来的收入多4倍。

所有这些，聂赫留朵夫以前就知道，然而现在他听到这些却像听到新鲜事一样，不住地暗自惊讶，不明白他自己以及一切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怎么会没有看出这种关系多么不正常。

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把土地交给农民后，原有的全部农具就会白白地损失，连原价的1/4也收不回，又说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还说总的来讲，把土地租出去后聂赫留朵夫会吃亏太大，可是这些理由反而使得聂赫留朵夫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自己失去大部分的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决定趁他这次来到此地，马上办妥这件事。收割和出售那些已经播种的粮食，卖掉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那得等到他走后由总管去办。

至于现在，他要求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3个村子里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为的是对农民宣布他的意图，跟农民商定他交给他们的土地的租价。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自己坚定地抵制了总管的种种理由，乐于为农民作出牺牲，不由得满心愉快，就走出账房，一面考虑眼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荒芜了的花圃，走过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

顺着椴树林里的林荫路走去，往常他总是到这儿来散步，吸一吸雪茄烟，而且3年前俊俏的基里莫娃到他的母亲家里来做客，就是在这儿跟他调情的。

聂赫留朵夫把明天他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大致想好以后，就到总管那儿去，在喝茶的时候又商量一下如何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直到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所大房子里一个平素用来招待客人，如今为他收拾好的房间走去。

这个不大的、干净的房间里挂着些威尼斯的风景画片，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摆着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桌子上放着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一盒火柴、一个灭烛器。

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他那开了盖子的皮箱，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他带来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俄文的关于刑法研究的著作，还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同类内容的著作。

他打算在这次下乡期间空闲的时候读这些书，不过今天他打算上床睡觉了，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准备去跟农民们谈判。

这个房间的墙角上，放着一把老式的红木雕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它原是放在他母亲的寝室里的。如今他一看到这把圈椅，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感情。

他忽然舍不得这所就要拆毁的房子，舍不得那个就要荒芜的园子，舍不得那一片就要砍倒的树林，舍不得所有那些畜厩、马房、库房、机器、牛马。那些东西虽然并不是由他购置的，然而，他知道，却都是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维持下来的。

以前他觉得放弃这些东西轻而易举，可是现在他不但舍不得这些东西，甚至也舍不得土地，舍不得他目前很可能急需的那一半收入。

而且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帮他的忙，根据这种理论，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他自己经营的产业，是不合理、不应该做的。

“我不应当占有土地。我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再者，我现在就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不论是这所房子还是这个庄园，我都不需要了，”一个声音说。

“这话固然不错，”另一个声音说，“不过，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要是你结了婚，你就可能有子女。你整整齐齐地得到这份田产，以后你就得把它照原样传给你的子孙。人对土地要负责任。把它交出去，毁掉一切，这都很容易，可是要置办起来，那就很难了。”

“要紧的是你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你以后怎样过活，再根据这一点来处理你自己的财产。莫非你目前做出来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吗？再者，你真是本着你的良心在做你所做的事呢，还是为了做给人家看，在人家面前卖弄自己？”

聂赫留朵夫问他自己。他不能不承认：别人对他所做的事会说些什么话，这对他做出决定是有影响的。他越是考虑，问题就越多，而且越发不容易解决。

他为摆脱这些想法，就在那张干净的床上躺下，打算睡觉，想等到明天头脑清醒以后，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乱如麻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9时，聂赫留朵夫醒来。一个专门来侍候主人的年轻办事员，听见房里有动静，就给他送去一双从未擦得如此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纯净的矿泉水，并且禀告说，农民们已快到齐了。

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也清醒了。昨天那种为自己把土地交给农民和因毁掉自己的家业而惋惜的感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他想起这种感觉反而觉得奇怪。现在他为自己将要做的事感到高兴，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豪。从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

按照总管的吩咐，农民都聚集在那里。今天天色阴晦，从清晨开始就下起了润物无声的蒙蒙细雨，暖洋洋的，没有一点风，树叶上、树枝上、青草上挂满了一颗颗小水珠。

站在窗口，不仅闻到一股股青草的芳香，而且还有渴望甘霖的泥土气息。聂赫留朵夫一边穿衣服，一边好几次望望窗外，看着农民纷纷来到场地上。

他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见了面，都脱帽致意，拄着手杖，围成一个圈子。

总管是一个身强体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身穿一件绿色立领、钉着大纽扣的短夹克。他进来向聂赫留朵夫报告说，农民们都到齐了，不过叫他们等着吧，聂赫留朵夫可以先喝完咖啡或者茶再去，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见他们，”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走到聚集在一起的农民跟前，他们纷纷摘下帽子，露出长着浅黄色的、鬃曲的、花白头发的或者秃顶的脑袋，向他行礼，使他窘得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蒙蒙细雨一直下着，雨点落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长袍的

绒毛上。

农民们望着地主老爷，等他讲话，可是他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这个难堪的沉默被镇定自若又妄自尊大的德国佬打破了。他自以为很了解俄罗斯农民，能说一口流利而地道的俄语。

这个身强力壮、营养过分丰富的人和聂赫留朵夫一样，跟农民们爬满皱纹的老脸和从长袍里隆起的瘦削的肩胛骨形成惊人的对照。

“现在公爵大人想为大家做件好事，把土地交给你们去种，可是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瓦西利·卡尔雷奇？敢情我们没给你干过活？我们对过世的太太感恩不尽，但愿她的灵魂早日升天，我们也要谢谢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咱们。”一个喜欢饶舌的、长着浅棕红色头发的农民说。

“我就是为这事找大家来的，要是你们希望这么做，我愿意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开口说。

农民们一声不吭，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他的话。

“把土地交给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穿长外衣的中年农民说。

“这就是说，把土地租给你们，让你们出不高的价钱就能使用土地。”

“这倒是件好事。”一个老头儿说。

“不过，要让我们出得起租金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干吗不要！”

“我们种惯了地，是靠地吃饭的！”

“您也可以省事多了，只管收钱就行，要不，麻烦可多着呢！”人群中传来几个声音。

“麻烦都是你们惹出来的，”德国佬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守规矩……”

“我们这帮兄弟可不行，瓦西利·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儿说，“你说，干吗把马放到麦地里去？是谁放的？我整天干活，过一天好比过一年，从早到晚抡镰刀，晚上才轮到打个盹，可是那马不知怎么就钻到燕麦地里去了。可你剥削得我也

太狠了。”

“你们要守规矩。”

“你说得倒好：守规矩，可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反驳说，他长着一头黑发，满脸都是络腮胡子。

“他说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每年都到树林里去偷树。你要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敢情是我们不尊重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能把我们搓成绳子。”

“得啦，老弟，没人欺负你们，你们也别欺负别人。”

“还说不欺负我们！去年夏天你就打过我一个嘴巴，也就这么算了。看来，跟有钱人没法说理。”

聂赫留朵夫在一旁听着，心里很沉重。他竭力想把话题引到正事上来：商定租金和交款期限。“有关土地的事情你们看怎么办？你们愿意吗？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出什么价钱？”

“土地是您的，您给开个价吧！”

于是，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比周围一带的租金低得多，农民们却照例讨价还价，认为开价太高。聂赫留朵夫本来以为他的开价农民会乐意接受，可是他从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满意的表情。聂赫留朵夫只能根据下面一件事断定，他提出的价格是对农民有利的。

当大家讨论到由谁来承租土地，是由整个村子承租，还是由三三两两合伙承租的时候，农民中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想把年老体衰的和没有支付能力的农民排除出去，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农民当然不会答应。

最后，多亏了总管，才把租金和交款期限确定下来。农民们一边闹哄哄地说着话，一边走下山坡回村去了，聂赫留朵夫则回到账房间去，跟总管一起拟订契约。

一切事情都按照聂赫留朵夫所期盼的那样安排停当了。农民们交付的土地租金比本区土地的租金低30%，而他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不过，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这笔收入仍然是很丰裕的。特别

是他卖掉树林和农具以后，还有一些额外的进账。

事情办得似乎很圆满，可是聂赫留朵夫的内心总感到某种歉疚。他看到，尽管有些农民对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可是他们并不满足，还想得到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虽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却未能满足农民们的期望。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在家庭契约上签了字，然后在由众人推举出来的几位长者陪同下，怀着几分未能将事情办妥的惆怅心情，并且向那些困惑地、不满地摇着头的农民告别以后，坐上火车站上那个马车夫讲到过的那辆豪华的三驾四轮马车向车站驶去。

离开库兹明斯科耶，聂赫留朵夫来到他从他姑妈们那里继承的庄园，在其中一个庄园他初次邂逅了卡秋莎。他打算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安排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关于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他是怎么死的？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巴诺伏。

他的马车一驶进庄园，令他触目惊心的头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破败荒凉的景象，唯独花园，不仅没有衰败，而且更加葱茏茂盛，开满了各种鲜花，篱笆外面都可以看见樱花树、苹果树和李子树正在开花，一簇簇花就像天上的朵朵白云。

用来编筑篱笆的丁香花丛也开了花，就像12年前一样，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16岁的卡秋莎一块儿玩捉人游戏。他在这里跌了一跤，手被其中一个丁香花丛后面的荨麻刺伤了。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宗教学校学生，他在院子里笑眯眯地迎接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请他到账房里去，并走到隔板后面，似乎这样的笑容预示了有什么特别好的事在等着他。

“主人，请问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笑眯眯地问道。

“随便，我不饿。我想先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不想先到房子里去看看吗？房子里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面……”

“现在不了，谢谢，以后再看。请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就住在村子里，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

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妇道人家，年纪大了，又有孙儿孙女。”

管家说道，脸上仍然像刚才那样挂着笑容，显示出想讨好主人的意思，又深信主人对事情的看法与他一致。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看看她。”

“她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就是。左边是一座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不过最好还是让我带您去。”管家优雅地笑着说道。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应该能找得到的。倒是要您费心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道。

他打算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与农民们达成同样的租约，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今天傍晚办好。聂赫留朵夫出了大门。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了。这是一个晴热的日子，上午10时就热得闷人了，渐渐聚拢的云片偶尔把太阳遮住。整条街上弥漫着浓烈刺鼻而又不太难闻的牲口粪气味，这气味一部分是几辆顺着光溜溜的道路上坡的大车送来的，但主要的还是来自各家翻晒的牲口粪。

聂赫留朵夫就是从各家敞开的大门前经过。几个赶着大车上坡的汉子，光着脚，穿着溅满粪汁的裤子和小褂，回头看着这个头戴灰色礼帽、缎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又高又胖的老爷，看着他在村子里往坡上走，每隔一步就用锃亮的银头曲节手杖在地上点一点。

有些从田野上回来的庄稼人，颠颠晃晃地坐在空车的驭座上，摘下帽子，惊愕地注视着这个走在他们街上的很不平常的人。妇女们纷纷走到大门外或者台阶上，朝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经过第四家大门口的时候，有一辆大车“吱嘎吱嘎”地从大门里出来，把他挡住。大车上装着干粪块，堆得高高的，上面铺一张供人坐的芦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跟在大车后面，高高兴兴地等着坐车。一个穿树皮鞋的年轻汉子跨着大步赶大车出门。

一匹长腿的青马驹很快地出了大门，可是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到大车上，用腿蹬着车轮，一下子蹦到已经拉着沉甸甸的大车出了门的母马前面，那母马也受了惊，轻轻嘶叫着。

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瘦瘦的、精神矍铄的老汉牵着，老汉也光着脚，穿着条纹布裤和肮脏的长褂子，脊梁上鼓着尖尖的骺骨。等到几匹马上了撒满灰灰的、就像烧过的粪块的平坦大路，那老汉又回到大门口，并且向聂赫留朵夫鞠了一个躬。

“你是我们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您来。怎么，是来看看我们吧？”老汉很有兴致地说起话来。

“是的，是的。怎么样，你们过得好吗？”聂赫留朵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这样问道。

于是他来到街上，顺着大街往上走去。两个光脚男孩子跟着他从过道里走出来：一个大些，穿一件又脏又旧的白褂子，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了色的粉红褂子。聂赫留朵夫回头朝他们看了看。

“你现在上哪儿去？”穿白褂子的男孩问。

“去看看玛特廖娜·哈林娜，”他说，“你们知道吗？”

穿粉红小褂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大些的男孩却一本正经地反问道：“哪一个玛特廖娜？是那个老的吗？”

“是的，是老的。”

“噢——噢，”他拉长声音说，“那就是谢苗尼哈，她在村边上。我们领你去。走，菲吉卡，咱们领他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跟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倒比跟大人在一起自在得多，一路上他跟他们攀谈起来。穿粉红色小衬衫的小男孩不再发笑，讲起话来跟那个大孩子一样又有条理又仔细。

聂赫留朵夫走到马特廖娜的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留在外边，他自己走进门道，然后又走进房间。他的头撞在低矮的门楣上的时候，老太婆刚在同她的大孙女一起修理那架织布机。

另外两个孙子紧跟在主人身后，飞也似的跑进小屋，在他身后的房门口站住，伸出手来抓住门框。

“你找谁？”老太婆生气地问道。她心绪恶劣，因为她的织布

机出了毛病。再者她偷卖私酒，见了任何不相识的人都害怕。

“我是这儿的地主。我想跟您谈一谈。”

老太婆沉默下来，凝神瞧着他，然后她的整个脸忽然变了样子。

“哎呀，原来是你，我的亲人！我这个傻瓜却没有认出来，还应当是一个过路人呢，”她用假装亲热的口吻说，“哎呀，我的漂亮的雄鹰啊……”

“我想单独跟您谈一谈，不要有外人在场才好。”聂赫留朵夫瞧着敞开的门口说，门口站着些孩子，他们身后站着—个瘦女人，抱着非常虚弱却又不住微笑的娃娃，那个娃娃因为有病而脸色惨白，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可瞧的？我要揍你们一顿。把我的拐杖拿给我！”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关上门，听见没有？”

孩子们走了，抱娃娃的女人关上房门。

“我心里正在寻思：这是谁来了？原来是东家，我的金子，我的看不够的美男子！”老太婆说。

“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也不嫌这儿脏。哎哟，你呀，我的金刚钻！在这儿坐下吧，老爷，喏，就坐在这个矮柜子上。”

她说，用围裙擦了擦柜子，“我心里正在寻思，不知是什么魔鬼跑到我这儿来了，想不到来的就是老爷，我的好东家，我的恩人，我的衣食父母。你要原谅我这个老傻瓜，我的眼睛快瞎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太婆在他的面前站着，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胳膊肘，像唱歌般地讲起来：“你也见老了，老爷。想当初，你好比漂亮的龙芽草，可是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看起来，怕也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打听一件事：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就是卡捷琳娜吧？那怎么会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嘛，那怎么会不记得，我为她流过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眼泪哟！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爷，谁没在上帝面前犯过罪，谁没在沙皇面前犯过法？干出那种事都是因为年轻，再加上喝茶啦，喝咖啡啦，临了可就让魔鬼迷住了心窍。”

“要知道，魔鬼的力量可大了。这有什么办法！要是你丢开她

不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话说回来，你赏了她多少钱：你大大方方送了她100卢布呐！可是她怎么样呢？她就是太糊涂。”

“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孩子。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个孩子在哪儿？”

“为了那个娃娃，我的爷，那时候我费了不少的心思。当时她病得很重，我料着她起不来床了。我就照规矩给那个男孩受了洗礼，把他送到育婴堂去。换了别人，那就会撂下这个娃娃不管，也不给他吃的，由他死去。可是我心想，怎么能这么办呢，宁可费点事，也要把他送到育婴堂去。反正有钱，所以就找人把他送走了。”

“他有登记的号码吗？”

“有倒是有的，不过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她刚把他送到那儿，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娘儿们呗！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马拉尼娅，现在她已经死了。”

“哦，那么后来呢？”

“喏，卡捷琳娜的孩子也是这么送去的。是啊，她好像是把他收养了两个星期以后才送去的。娃娃还在她家里的时候就生病了。”

“那个孩子生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比他再好看的都没处找了。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哟！”老太婆补了一句，挤了挤她的老眼。

“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弱呢？大概喂得很差吧？”

“哪儿会好好喂！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罢了。当然，反正又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只要凑合着把孩子活着送到那儿就成了。她说她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马上就咽了气。她还带回来一个证件，事情办得挺有条理。她是个聪明的娘儿们。”

关于孩子，聂赫留朵夫所能打听到的就只有这些。

聂赫留朵夫住在帕诺沃的最后一天，到正房去，着手把遗留在那儿的东西清理一下。他翻看那些东西，在他姑妈的一个安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橱底下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其中夹着一张许多

人合照的相片，上面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有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有他自己，当时还是个大学生的，还有卡秋莎，纯洁、娇嫩、美丽，充满生活的乐趣。

在正房里保存着的全部东西当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那些信件和这张照片。

他把其余的一切东西统统让给一个磨坊主人，这个人听从笑吟吟的管家的怂恿，按照原价的1 / 10买下那些东西，准备把帕诺沃的正房拆掉，连同全部家具一齐运走。

现在，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历过的那种舍不得失去财产的心情，不由得暗自惊讶：他怎么会生出那样的心情来呢。现在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摆脱羁绊的欢乐，是旅行家发现新大陆而必然会体验到的那种新奇之感。

去彼得堡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到城里，觉得这座城市特别新奇。他决定第二天搬到旅馆去住，等到他姐姐回来，由她对这所房子作最后处理。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就出门了，在监狱附近随意找了一家肮脏简陋的、带家具的公寓，选了有两个房间的套房，然后吩咐把他在家里整理出来的东西搬过来，接着，就找律师去了。

外边天气很冷，雷雨过后，春寒仍浓，北风刺骨，聂赫留朵夫只穿一件薄大衣，冻得有点受不住，他加快脚步，竭力使身上暖和一些。

在一条街上，一队装着铁器的运货马车从后面赶了上来。铁器被高低不平的道路震得“隆隆”作响。他感到耳朵生疼，脑袋发胀。他加快步伐，想赶到车队前面去，这时，在铁器的轰鸣声中，他忽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他停住脚步，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在一辆四轮敞篷轻便马

车上坐着一个留着油光光的八字胡子的军人，他容光焕发，满面笑容，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正在向聂赫留朵夫招手致意。“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高兴。“啊！申博克，”他高兴地说，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完全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这个申博克曾经到过他姑妈的家。聂赫留朵夫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曾经听到过他的消息，说他虽然背了一身债，而且从军团里调到了骑兵队，但仍然凭着某种手段在有钱人的圈子里应酬自如。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证实了这一点。

“能遇上你真是太好了！要不然，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也见老啦，”他说着，从马车上下来，舒展了一下肩膀，“我从你走路的样子就知道是你。怎么样，一块儿去吃饭吧？这儿哪一家饭店比较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聂赫留朵夫说，一心想着怎样避开这位朋友，却又不至于使他难堪。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问。

“有事啊，老兄，有关监护方面的事，你知道，我现在当了监护人了。我在管理萨马诺夫的产业。你知道，这是个富翁。他得了痴呆症。他拥有54000俄亩的土地，”他用得意非凡的口气说，好像这些土地都是他自己置下的。

“这些田产都荒废了，都分给了农民，而农民们却一个钱都不付，欠款就超过80000卢布。我用一年时间就扭转了局面，使东家的收入增加了70%。怎么样？”他得意地问。

“想什么办法躲开他而又能不得罪他呢？”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看着他那胖乎乎的脸和抹过发蜡的胡子，听着他用亲昵的口气唠叨哪一家饭馆酒菜烧得好，又夸他如何监护东家的财产的。

“喂，我们上哪儿去吃饭？”

“现在我没有空。”聂赫留朵夫看了看怀表说。

“那么这样吧，今天傍晚有赛马。你去吗？”

“不，我不去。”

“哦，对了，你是不是在忙监狱里的事？想当囚犯的辩护人？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的。”申博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

是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对，对，这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答道，“在街上怎么能说呢？”

“好，那么再见，能遇到你，我感到非常高兴。”申博克说，他紧紧地握了一下聂赫留朵夫的手，就跳上了马车，他把戴着白鹿皮手套的大手举到光净的面孔前面，向他挥了挥，习惯地咧开嘴笑着，露出一排异常洁白的牙齿。

“难道我以前也像他一样吗？”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继续向律师家走去，“是的，虽然我不完全是这样，但曾经很希望做这样的人，也想这样过上一辈子。”

律师没有按照先后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立刻谈到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看过案卷，并对毫无根据地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厌恶，”他说道，“火多半是房东自己放的，存心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梅尼绍夫母子的罪行，一点证据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热心、助理检察官粗心大意的结果。只要这个案子不是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就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收取分文报酬。”

“那么现在谈下面一个案件，费多西娅·比留科娃。呈给沙皇的上诉状已经写好了。您要是到彼得堡去，就随身带着，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要不然他们会在司法部随便敷衍了事，如果他们驳回上诉，那么，这个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地位最高的人那里去才行。”

“是沙皇吗？”聂赫留朵夫问道。律师笑起来。“那当然是最高级了。但我说的‘最高’是指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现在，一切都算是办好了吧？”

“不，我这儿还有一封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道，“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令人吃惊的消息了。我争取今天与他们见个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导管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全部冤案都要通过您这里流出来了，”律师笑着说道，“这可实在太多了，您会

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是件让人震惊的案件。”聂赫留朵夫说道，接着就把案情大致讲了一遍。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和他的朋友聚在一起阅读和讲解福音书。牧师认为这是犯罪并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长官审问了那个农民，助理检察官起草了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逮捕了，并准备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他们的罪状，桌子放着物证《福音书》，结果他们被判了流放。

“这真是太可怕了，”聂赫留朵夫说道，“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奇怪。警察奉命逮捕人，这我倒是能理解的，但是助理检察官怎么能起草这样的起诉书呢？他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吧？”

“是的，只要你能证明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没有按教会规定而自作主张地进行解释，他们就该被流放。当众诋毁东正教，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好吧，但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检察官和那些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的意愿，那么审判还有什么用？”

律师哈哈大笑起来。“您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哎，老兄，这可是哲学。”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如果法官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引用或不引用法律，那么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听了他的话后却对此报之以哈哈大笑，而在说到“哲学”和“抽象问题”这些字眼时又带着那样一种特殊的口吻，这一切都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和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事情的看法大相径庭。

他还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博克之流的旧友们已经有了距离，但他和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的距离却还要大得多。

这儿离监狱很远，时间又不早了，所以聂赫留朵夫就叫了一辆马车，朝监狱奔去。一个看守从里边走出来见他，他就问起玛丝洛娃。看守走回去问了一声，出来说，她在医院里。

聂赫留朵夫就到医院里去。自从上一次他们谈话，她因为自己发脾气而道过歉以后，聂赫留朵夫一直没有见过她，现在料想她的

心情会跟上次一样。可是今天她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有那么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似乎对他抱着反感。他把刚才对医师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讲到他就要到彼得堡去，然后交给她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他从帕诺沃带回来的照片。

“这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是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它。您就收下吧！”

她微微扬起黑眉毛，用她那斜睨的眼睛惊讶地瞅着他，仿佛在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默默地接过那个信封，把它放在她的围裙里边。

“我在那儿见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是吗？”她冷淡地说。

“您在这儿过得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吗？”

“不，不算苦。不过我还没过惯。”

“我为您很高兴。这儿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边？”她说，她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聂赫留朵夫赶紧说。

“这儿好在哪儿呢？”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好一点。他们跟那边的人不一样。”

“那边有许多好人。”她说。

“我已经为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张罗过。我希望他们会放出去。”聂赫留朵夫说。

“求上帝保佑，能这样才好。她真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婆，”她说，又讲起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微微一笑。

“今天我就要到彼得堡去。您的案子会很快受理。我希望原判会撤销。”

“撤销也罢，不撤销也罢，如今在我都是一样。”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确实是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准备按照我说过的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对斜睨的黑眼睛又像是瞅着他的脸，又像是瞅着他的身后，她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神情。不过她嘴里所说的话却跟她眼睛所说的迥然不同。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关于这件事，话已经说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说，费力地忍住笑容。

病室里不知为什么乱哄哄的。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好像他们在叫我，”她说，心神不宁地回过头去看一下。

“好，那么再见。”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她没有握他的手就扭转身，极力遮盖住她的欢乐心情，顺着过道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这一天，每逢玛丝洛娃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有好几次她从那个信封里把照片拉出一点，欣赏一下。

可是一直到傍晚下了班，回到她跟一个助理护士同住的房间，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她才从信封里把那张照片完全抽出来，用爱抚的目光一动也不动地看了很久，仔细地瞧着那几张脸、他们穿的衣服、露台的台阶和灌木丛，而他的脸、她的脸、两个姑妈的脸都是以那个灌木丛为背景的。

她看着这张褪色和发黄的照片，总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和她那张年轻、美丽、额头上飘着鬃发的脸庞看得入神了。她看得那么专心，竟然没有留意到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房来。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壮实、脾气温和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着照片说，“莫非这个人就是你？”

“不是我又是谁呢？”玛丝洛娃瞧着她的同屋伙伴的脸，笑吟吟地说。

“那么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还有，这个人是他的母亲吧？”

“这是他的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我了？”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呢？我说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整个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话说回来，我看，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只怕有10年了吧！”

“不是多少年，而是一辈子。”玛丝洛娃说，突然她原来的

活泼心情完全消散了。她的脸色变得凄凉，两道眉毛中间嵌进一条皱纹。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要办三件事情：为玛丝洛娃向枢密院提出上诉，把费多西娅·比留科娃的案子递交上诉委员会，受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到第三厅去请求释放舒斯托娃。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还写过信给他，请他设法让一个母亲与她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一次面。他把这两件事合起来做，算是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背井离乡，流放到了高加索。他与其说对他们，还不如说对自己已经许下诺言，无论如何要澄清这个案子。

到了彼得堡，聂赫留朵夫住在他姨妈查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家里。他的姨夫当过大臣。于是他立刻落到了已经与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中去了。

他不愿意这样做，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他不住在姨妈家里，而住到旅馆里去，那就要得罪姨妈，况且姨妈交际甚广，说不定对他要为之奔波的各种事情大有帮助。

“关于你，你知道吗，我听到了些什么？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有。”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等他进门，就端上咖啡请他喝，并且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帮助犯人，视察监狱，平反冤案。”

“不，我不这样认为。”

“那就很好。不过这里头似乎有一段风流韵事吧！说来听听。”

聂赫留朵夫对她如实地讲述了他和玛丝洛娃之间的一段旧情。

“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的时候，你可怜的妈妈艾伦对我说起过一件事，她们好像要你跟她们的养女成亲你说的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不，姨妈，这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只是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是无辜的，却被判了刑，而在这件事上我是有罪的，她现在落到如此地步，我是有责任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尽力为她做一点事。”

“可是，你知道吗，别人怎么告诉我说你想跟她结婚？”

“是的，我曾经想过，可是她不愿意。”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皱起眉头，低下眼睛，露出惊讶的神情，默默地看着她的外甥。

突然，她脸色一变，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瞧，她比你聪明。唉，你可是个傻瓜！你真的想跟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了那种事以后，你还想跟她结婚吗？”

“那就更想和她结婚了，我对她是有罪的。”

“不，你是个十足的傻瓜。”姨妈忍住笑说。

“她已经判服苦役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希望通过奔走能撤销这个判决，这就是我求您的头一件事。”

“原来如此！现在她的案子到了哪里？”

“到了枢密院。”

“枢密院？是啊，我的那位亲爱的表弟列武什卡就在枢密院里工作。不过，他是在傻瓜局，也就是在贵族宣令局里当差。真正负责审理案子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反正我对你姨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这些人。他什么人都认识。”

这时一个穿长筒袜的听差用银托盘送来一封信。“正巧是阿林写来的信。你可以听听基泽维捷尔的高论了。”

“基泽维捷尔？他是谁？”

“基泽维捷尔吗？你今天晚上来，就会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说起话来那么感人，就连怙恶不悛的罪犯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灵魂。”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可是我告诉你，这事很有趣，你一定要来。好吧，你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全说出来吧！”

“还有一件是要塞里的事。”

“要塞？好吧，我写一封信给你，你拿着信去见克里格斯穆特男爵。他是个德高望重的人，你自己也认识他。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热衷于招魂术，不过，这没关系，他人很好。你在那儿要办什么事？”

“我想请求他们准许让一位母亲跟关在那里的儿子见见面。不过，我听说，这件事不归克里格斯穆特管，而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我不喜欢切尔维扬斯基这个人，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求她帮忙，她肯为我出力的。她很可爱。”

“我还要求您帮帮另外一个女人，她已经坐了好几个月的牢，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行，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什么坐牢的。她们自己心里明白。这些剪短头发的女人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我们不知道是否罪有应得。她们正在受苦，您是基督教徒，相信福音书，可是没有一点恻隐之心。”

这时一个身高肩宽的将军走了进来。他就是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的丈夫，退休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着，把刮得光光的面颊凑过去，让聂赫留朵夫吻一下，“你什么时候到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像以前听他部门的常务秘书作报告一样。他听完以后，就说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给聂赫留朵夫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聂赫留朵夫说的费多西娅·比留科娃的案子让他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把这个案子写成呈文奏明皇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说，这个案子确实很动人，有机会他要在那边说说。

然而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会将这个案子告诉皇后。聂赫留朵夫一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就立刻出发前往那几个地方。

他先去玛丽爱特家。她以前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的女儿，当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他就认识她了，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不过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感到十分沉重，因为他得去向一个他不尊敬的人求情。

总的说来，他很久没有来过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那种刺激肉体 and 麻痹精神的作用。

一切都是那么干净，那么舒适，安排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无所追求，因此生活显得特别轻松。

一个漂亮、干净、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漂亮、干净、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漂亮、干净、洒过水的街道，经过漂亮、干净的房子，来到玛丽爱特所住的那所房子。

看门人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往前厅的大门。前厅里站着个跟班的听差，制服更加干净，而且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非常整齐好看。另外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制服。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正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的信，然后走到一张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开始写道：“来访未晤，甚为怅怅。”他刚写到这里，听差走到楼梯口，看门人便走到大门外，对马车夫喝道：“把车赶过来！”

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两手贴住裤缝，两眼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的女人。这个女人快步下楼，完全不注意保持她端庄的姿态。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大帽子，上面插有羽毛，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黑手套，脸上蒙着面纱。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俊俏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用探问的神情看着他。

“啊，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她用温柔、悦耳的声音叫道，“我早该认出来……”

“怎么，您甚至记得我的名字？”

“可不是吗，我跟我妹妹当年甚至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道，“不过，您的模样可是变多了。哦，太遗憾了，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一块儿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犹豫不决地站住。接着她瞧了瞧挂钟，“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弥撒。这位母亲伤心透了。”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有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是跟潦森决斗的。他是独生子。太可怕了。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一点。”

“不，我还是去一趟的好，那么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来吧！”她说着，迈着轻快的步子急忙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他说着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要知道，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说道，眼睛瞧着两匹棕黄马向大门口这边靠近。

“什么事啊？”

“这儿有我姨妈写给您的一封信，”聂赫留朵夫说着，把那封信封狭长、上面印有很大的花体姓氏字母的信递给她，“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在我丈夫的事情上可以左右他。她弄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愿意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件什么事呢？”她说着，用那只戴着黑手套的小手去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要找的东西。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她病了，而且是无辜的。”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莉迪雅·舒斯托娃。信里写了。”

“好吧，我会尽力去试试的，”她说着，轻巧地跳上那辆轻便敞篷马车，马车上蒙着柔软的皮子，漆色明亮的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撑开阳伞。听差在驭座上坐下来，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车夫赶车。

“您一定要来，不过，请不要只是为了办您那些事才来，”她说着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而这一笑的力量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接着，仿佛演完戏放下幕布一般，她把面纱放下来。“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了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轻轻地喷着鼻子，走动起来，蹄子在马路上敲出一片响声。马车平稳地飞奔而去，只是在马路上一些偶尔不平的地方，新的橡胶轮胎才轻轻跳动一下。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和玛丽爱特相对的笑，摇了摇头，表示对自己不满。

“一转眼就要掉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到。这时他感到内心矛盾和困惑，在他不得不去巴结他不尊敬的人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感觉的。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走回头路，考虑好先到哪里，后到哪里，于是就先去参议院。他由人领着走进办公室。他在这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看到许多特别彬彬有礼、穿戴分外整洁的官员。

那些官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经收到，并已交给参政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也正是写给沃尔夫的。

“参议院本星期有一次会，玛丝洛娃的案子未必能在这次会上审理。不过如果请求一下，可能有希望也安排在本星期三。”一位官员说。

聂赫留朵夫出了参议院办公室，就前往上诉委员会去找该委员会中有权有势的官员沃罗比约夫男爵。沃罗比约夫男爵住的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官邸。

门房和仆役都板着面孔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要见男爵是不可能的，今天他在皇上那儿，明天还要去汇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就去找参政官沃尔夫。

沃尔夫刚刚吃过早饭，于是他一面照常吸着烟和在房里来回踱着以帮助消化，一面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确实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他认为正派是最高标准，他就根据这一标准看待其他一切人，而且他也不能不看重这一品德，因为多亏了这一品德，他才飞黄腾达，获得了朝思暮想的官位，也就是说，通过婚姻他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18000卢布的收入，又靠自己的努力谋得参政官的职位。

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而且是一个侠士般正直的人。他所谓的正直，就是不在暗地里接受私人的贿赂。至于他向国库要各种各样的出差费、车马费、房租，不论政府要求他怎样，他都奴隶般地照办，这一切他都不认为是不正直。

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担任一个省的省长的时候，成百上千无辜的人因为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祖辈辈的宗教而遭受迫害、倾家荡产、流放、坐牢，那都是他干的事，他却不仅不认为是不正直，而且认为那是高尚、英勇、爱国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和姨妹的财产，同样不认为是不正直。相反，他认为这是对家庭生活的合理安排。

他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和姨妹。他把姨妹的地产卖了，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因而把她的财产也抓在手里。还有一个温顺、胆怯、相貌平平的女儿。

女儿过着孤独、沉闷的生活，近来为了消愁解闷，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家和查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原本是个善良的孩子，15岁就长了胡子，而且从那时起就喝酒，放荡，一直到20岁被撵出家门，因为他没有读完任何一个学校，经常在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当中鬼混，欠了债，败坏了父亲的名声。

父亲有一次替儿子还了230卢布的债，另一次又还了600卢布的债，但是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不改邪归正，就要把他撵出家门，并且断绝父子关系。

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1000卢布的债，还十分放肆地对父亲说，他在家本来过得很不痛快。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他不是他的儿子了。

从那时起，沃尔夫就做出没有儿子的样子，家里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起儿子，沃尔夫也深信他已经妥善地安排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沃尔夫脸上带着亲切和几分讪笑的神气：这是他的风度，是自以为比大多数人有教养的不自觉地流露。他停止在书房里踱步，站了下来，和聂赫留朵夫寒暄几句，便把信看了一遍。

“请坐吧，不过对不起，如果您不介意，我要走一走，”他说着，把双手插到上衣口袋里，迈着又轻又从容的步子，在格调古雅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踱起来。

“很高兴同您认识，当然，我也很高兴为查尔斯基伯爵效劳，”他一面说，一面吐着芳香的青烟，小心翼翼地从小嘴里取下雪

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尽快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的话，那还是早点儿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我知道，那就可以搭下诺夫哥罗德的头几班轮船，”沃尔夫带着体恤下情的笑容说。只要别人一开口，他总是事先就知道别人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前，看了看放在公文夹上的一份公文。

“是的，是的，玛丝洛娃。好的，我去向同事们要求一下。我们就在星期三审理这个案子。”

“我就这样打电报通知律师，行吗？”

“您还请了律师？这又何必？不过，要是您愿意，那也没什么。”

“上诉的理由也许不够充分，”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判决是出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很可能，不过参议院不能根据实质来审查案子，”沃尔夫看着烟灰，板着脸说。“参议院只能审查运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得当。”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

“我知道，知道。所有的事都是特殊的。我们一定会照章办事的。就这样吧！”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来吃饭吧，”沃尔夫说着，伸过手来，“就星期三吧！那时候我就可以给您明确地答复了。”

天色已晚，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回家去，也就是回姨妈家去。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听差给他送来了一张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到彼得堡来的，如果枢密院能在近期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那么他可以顺便出庭辩护。由于他当时已经动身，所以聂赫留朵夫打给他的电报没有收到。

聂赫留朵夫告诉律师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审理，负责审理的枢密官是谁。律师听后，笑了起来。

“这3个枢密官恰好是3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彼得堡的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而且是个讲究实际的法学家，所以他最富有生气，”律师说，“只有指望他了。上诉委员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就去拜访沃罗比约夫男爵，昨天我没能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怎么会当上男爵的吗？”

律师听到聂赫留朵夫在说与俄罗斯姓氏连在一起的外国爵位时，语调有几分滑稽，就说。“这是保罗皇帝。在位时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当时好像是宫廷总管，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就说，让他当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阻拦。如此这般，就出了个沃罗比约夫男爵。他为此洋洋得意，其实是个诡计多端的人。”

“我现在就去找他，”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我用车送您。”

他们刚要出门，一个听差在前厅迎上前来，把一封玛丽爱特写来的信交给聂赫留朵夫。信是用法文写的：

为了满足您的要求，我破例在丈夫面前为您所庇护的人求情。

此人不久便可获释，我丈夫为此已写信给要塞司令，这样，您就一心一意来看我吧，我等着您。

“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这太可怕了！一个女人什么罪名也没有，在单身牢房里关了整整7个月，最后，只需凭一句话，就放人了。”

“这种事历来如此。至少，您如愿以偿了。”

“是的，然而这种成功却使我伤心。那么，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最好别追根究底。我现在用马车送您去，”律师说。

这时他们两人已经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一辆由律师雇的外表漂亮的四轮轿式马车驶了过来。“您不是要去找沃罗比约夫男

爵吗？”

律师告诉车夫要去什么地方。于是几匹骏马很快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沃罗比约夫的寓所。男爵正好在家。进门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官员，他脖子细长，喉结凸出，步伐轻快，另外还有两位女士。

“请问贵姓？”喉结凸出的年轻官员从两位女士身边潇洒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自报了姓名。

“男爵说起过您。”

“请进，”年轻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迈开轻盈的脚步走到书房门口，推开房门，自己留在门外。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一个身穿礼服、头发理得很短的人坐在一张大写字桌旁的圈椅上。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一双眼睛骨碌碌地看着前面。他那红润的面颊在雪白胡子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他一见聂赫留朵夫走进来，慈祥的脸上顿时露出亲热的笑容。

“见到您很高兴。我和令堂早就认识，是老朋友了。我当初见到您的时候，您还是个小孩子，后来当了军官。请坐，您请说吧，要我帮您做什么事？”

他一边听聂赫留朵夫讲费多西娅的案情，一边摇晃着白头发理得很短的脑袋说，“说吧，说吧，我全听明白了。对，对，这件案子的确叫人感动。怎么样，您把诉状呈上去了吗？”

“我已经把诉状写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把诉状从口袋里拿出来，“不过，我想求您帮个忙，希望您能对此案件加以特别关照。”

“您做得很对。我一定亲自向上报告，”男爵说，他想要在眉开眼笑的脸上添上一点怜悯的表情，却反而有点不伦不类。“这案子非常感人。看样子，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待她很粗暴，她讨厌他。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重归于好了……就这样吧，我会向上面报告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说，他想去求皇后。”

还没等到聂赫留朵夫把话说完，男爵的脸色就变了。

“不过，您把状子交到办公室去吧，我会尽力去办的，”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失败的上诉

掌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位祖籍德国的男爵老将军。据说现在他已经头脑糊涂了。他立过赫赫战功，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上衣的纽扣眼里挂一个白色的十字章。

或许，他的巡查不过是装样子罢了。老将军按照他职责的要求，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一下犯人们有什么要求。犯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他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说完了，一声不吭，但对那些要求向来是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所有这些要求都不符合法规。

聂赫留朵夫坐着马车来到老将军府上，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钟声奏出《上帝多么荣耀》的乐曲，然后敲了两下。

“很高兴见到您，”将军用粗哑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指指写字台旁那张扶手椅请他坐下，“您来彼得堡好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回答说刚刚来。

“令堂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我母亲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我听了很难过。我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

将军的儿子正从事着一种和他父亲同种类型的职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就到侦察局里工作，并为在那里工作而洋洋得意。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政府间谍。

“是啊，我跟令尊共过事。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怎么样，您也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吗？”

“不，我没有。”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

“太好了。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

“要是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我。但我不得不为这件事来麻烦您。”

“什么事呢？”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母亲请求能来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侧着头，闭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什么也没考虑，甚至对聂赫留朵夫的请求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答复他。他只不过是闭目养神罢了，根本没有想什么。

“您要知道，”他最后终于说道，“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关于探监的问题，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有明确的规定。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他们可以看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所需要的是学术性的书籍，他想研究学问。”

“您不要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咆哮道，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心神不宁罢了。”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处境这么痛苦，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时间啊。”聂赫留朵夫说道。

“他们老是抱怨，”将军说道，“我们可了解他们这种人了。”他概括地讲到他们，就像讲到一种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

“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适，这在监禁点是不多见的，”将军继续说道。

仿佛为了要证实自己的话，他开始详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舒适条件，仿佛这个监狱机构的宗旨就是为囚犯提供舒适的家。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却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每顿吃三道菜，而且其中一道是肉食：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星期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食。上帝保佑，但愿每个俄国人都能和他们活得一样好！”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着他那僵硬的四肢

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的硬领撑住、皮肉松弛、刮得光光的苍老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因其极端残酷和滥杀无辜而获得的白色十字章。

心里明白，反驳他的话或者揭穿他这些话的含义，都是徒劳无益的。但他还是打起精神，又问起犯人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经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我没法记住所有犯人的名字。他们人数太多了，”他说道，仿佛是在责怪犯罪的人太多。

他拉了拉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将军趁着等办事员来的时机，就劝聂赫留朵夫到政府机关里来工作，说凡是高尚的人都是沙皇和国家所特别需要的。

他加上“和国家”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把话说得更动听些罢了。“现在我老了，但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仍要当好差。”

办事员是个身体瘦小、肌肉结实的人，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他走进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他还没有接到有关她的任何命令。

“只要我们一接到命令，我们当天就会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我们并不特别看重他们的光临，”将军说着，又试着做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那张老脸显得更加扭曲。

当然，他对聂赫留朵夫也没当回事。聂赫留朵夫站起身来，竭力克制住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怕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深深地鞠了一躬，握了握那只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第二天，玛丝洛娃的案子要开庭审理，于是聂赫留朵夫就上了马车直奔参议院。他的马车来到参议院那很有气派的大门口，恰好遇到法纳林律师的马车。这时大门口已经停着好几辆马车了。他们顺着华丽而宽敞的楼梯上了二楼。

这时候有一个身穿文官制服的很文雅的官员正从楼梯上往下走，腋下夹着一个皮包。房间里有一个族长模样的小老头很引人注目。小老头身穿短上衣和灰色长裤，一头长长的白发，有两名听差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身旁。

白发小老头进入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法纳林看到一

个同行，一个和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立刻就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就打量起这个房间里的人。

旁听的人有十五六个，其中有两位太太，一个年轻的，戴着夹鼻眼镜，另一个已经白了头发。今天要审理一件报纸诽谤案，因此列席的旁听者比平时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身穿漂亮制服的法警警官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是承办哪一宗案子的，听说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后，就在纸上记了记，便走开了。

这时候大槲的门开了，族长模样的小老头儿从里面走了出来，但穿的已经不是短上衣，而是镶丝绦的制服，胸前挂满亮闪闪的勋章，模样儿活像一只大鸟了。

小老头穿起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他迈着比平时要快的步子急急忙忙走进了入口处对面的一个门里。

“这就是贝，一个非常可敬的人，”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完这话，又介绍他和自己的同行认识，然后说了说即将审理的这件案子，他认为这案子是很有趣的。

这案子很快就开审了。于是聂赫留朵夫和旁听者一起从左边走进法庭。他们这些人，还有法纳林，都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的律师走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参政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些，陈设也简单些，唯一不同的是，参政官面前的桌子上铺的不是绿呢子，而是镶金绦的大红丝绒。不过那些行使审判职能之地常有的象征物，如镜子、圣像、皇帝肖像，这里也样样具备。

警官也是那样隆重地宣布：“开庭了。”大家也都是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参政官们也都是那样走进来，也都是那样坐到高背椅上，也都是那样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竭力摆出泰然自若的姿态。

参政官一共是四位。首席参政官尼基丁是一个脸型狭长、不留胡子、银灰色眼睛的人；沃尔夫意味深长地闭紧嘴唇，正在用白白的小手翻阅案卷；再就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一个肥胖、粗大、满脸麻子的人，是个学究式的法学家；第四位是贝，也就是那个族长模样的小老头，是最后一个走进来的。

和参政官们一起出场的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一个中等身材、没留胡子的干瘦的年轻人，脸色黑黑的，一双黑眼睛带着忧郁的神情。

尽管他穿着一身不同往常的制服，尽管已经阔别了六七年，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是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向律师问道。

“是的，怎么啦？”

“我和他很熟识，这是一个极好的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哦，您倒是应该托托他呀，”法纳林说。

“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本着良心办事的，”聂赫留朵夫说，一面回想着他与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情，回想着谢列宁那种可爱的品质，他的纯洁、诚实和真正的正派。

“不过现在也来不及了，”法纳林小声说过这话，就全神贯注地倾听已经开始的案情报告。

现在开审的案子是根据对高等法院审判的上诉进行的，上诉原因是高等法院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

聂赫留朵夫倾听起来，并且竭力想弄清眼前审理的这件案子的实质，可是，就像在地方法庭上那样，难以理解的原因主要在于讲的不是本来应该成为要点的事情，而是一些纯属次要的情节。这件案子是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中揭露了一家股份公司董事长的欺诈行为

问题的关键似乎应该是，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否真的盗窃股东们的资金，怎样才能制止他盗窃。可是这一点却根本没有谈到。谈的只是报纸发行人有没有权利刊登小品文，刊登小品文是犯了什么罪，是诬蔑还是诽谤，是诬蔑中有诽谤，还是诽谤中有诬蔑。还谈到某个总署的一些条款和决定，那是普通人很难听懂的。

聂赫留朵夫所理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尽管昨天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参议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实质，然而在报告本案案情时却显然有意偏袒一方，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判决。谢列宁则一反他素有的稳重作风，用出人意料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的意见。

一向稳重的谢列宁一下子激烈得使聂赫留朵夫吃惊，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知道那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本来就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而且又在无意中听说，沃尔夫几乎就在开庭的前夕还参加过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

现在沃尔夫报告案情，虽然十分谨慎，但却明显地偏袒一方，于是谢列宁火了，就用对于一件普通案子来说过于冲动的腔调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的话显然使沃尔夫感到受了侮辱：沃尔夫红了脸，身子不住地哆嗦着，一声不响地做了个惊愕的姿态，便带着威严而又受到冒犯的神气同其他几位参政官一起朝议事室走去。

“您这位先生是承办哪一件案子的？”参政官们一走开，警官又向法纳林问道。“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嘛，我是来办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您是说过。这案子今天要审理。不过……”

“究竟怎么样？”

“请您注意，这案子不进行公开辩论了，所以在宣布过判决之后，参政官先生们未必会再出来了。不过我可以去通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去通报，去通报。”警官又在纸上记了记。

参政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过诽谤案的判决之后，就不再出议事室，一面喝茶吸烟，一面把其他几件案子审完，其中也包括玛丝洛娃一案。

枢密官们刚刚在议事室里围着桌子坐下，沃尔夫就很活跃地提出必须撤销这个案子的原判的种种理由。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走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的时候能够出席。

“说起这个案子，”沃尔夫说，“这倒是一宗地地道道的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谈了一阵这件事，吸完烟，喝完茶，然后走到法庭去，宣布他们对前一个案子的裁决，随后开始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沃尔夫用尖细的嗓音把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很详细地

报告一遍，措辞又不大公正，分明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过身去问法纳林说。

法纳林就站起来，挺起宽阔的白胸衬，用非常动听而准确的措辞，逐项证明以前的法庭在六个方面背离了法律的精确含意，此外他还不揣冒昧，略为提一下案情的是非曲直，提一下本案原判不公平得令人发指。

从法纳林简短而又有力的发言口气听来，他是在道歉，因为他所提出的主张，枢密官先生们凭敏锐的眼光和渊博的法律学识比他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所以这样做也无非是因为他所承担的责任要求他这样做罢了。

法纳林发言以后，似乎不可能再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枢密院准定会撤销法庭的判决了。法纳林结束了他的发言，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

聂赫留朵夫瞧着他的律师，见到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打赢了。然而他瞧一下枢密官们，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个人在微笑、得意。

枢密官们和副检察长既没微笑，也没得意，却现出烦闷无聊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这班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

显然，他们大家一直等着律师结束发言，不再使他们无益地久坐，才感到满意。律师刚结束发言，首席枢密官就立刻转过身去要副检察长发言。

谢列宁讲的话简短，然而明白、准确，认为申请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不予更改。这以后，枢密官们就站起来走出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大家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

贝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也很激烈地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按他完全正确理解的当时情况，对他的同事们生动地描摹法庭的情形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情形。

尼基京跟往常一样，总是主张严格办事，赞成严格的形式主义，反对撤销原判。于是整个问题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也站在驳回上诉的那一边，主要是因为聂赫留朵夫决定为了

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同那个姑娘结婚，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抽象道德的一切表现，或者说得更坏一点，宗教信仰的一切表现，不但是可鄙的疯狂，而且简直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为这个妓女惹出这样一场麻烦，再加上为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本人都到枢密院来出庭，在他看来是可恶之至的。

他就不住地把胡子塞进嘴里，做出一脸的苦相，极其天真地装做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案子，只知道申请撤销原判的理由不充分，因而同意首席枢密官的意见，主张本案的上诉不予批准。

上诉就此驳回了。

“真可怕！”聂赫留朵夫一边说着，一边同整理好公文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这样清楚的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处处挑剔，把它驳回了。真可怕。”

“这个案子是坏在法院，”律师说。

“连谢列宁也主张驳回。可怕，可怕！”聂赫留朵夫反复地说，“现在该怎么办？”

“去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呈上去。我替您写状子。”

这时身穿制服、胸佩星章、个子矮小的沃尔夫走进接待室，朝聂赫留朵夫走来。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你们提出的理由都不充分。”他说着，闭起眼睛，耸耸窄小的肩膀，就走开了。

沃尔夫之后，谢列宁也进来了。他从枢密官那儿获悉，他的故交聂赫留朵夫在这里。

“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他一边说，一边朝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淡淡地笑着，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是副的，”谢列宁纠正说，“你怎么会到枢密院来的？”他问，忧郁和沮丧地看着他的朋友。“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讨回公道，是为了拯救一个无辜的

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你们刚才裁定的案子。”

“哦，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说道，他记起来了。“那个诉状完全没有根据。”

“问题不在于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是无罪的，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口气。“很可能，不过……”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如此。”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此案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谢列宁陷入沉思。“当时你就应该提出来。”他说。

“我提过。”

“你应该把这一情况写成审判笔录，同上诉状一起呈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缠身，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一点不知道聂赫留朵夫那一段风流韵事。聂赫留朵夫觉察到了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谢列宁说。

“我就去，”他回转身去对恭恭敬敬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他叹着气说。“能找到你吗？我每天19时吃饭时，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金斯卡亚大街，”

他说了门牌号码。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又添了一句，嘴角上挂着一丝笑容，走了。

“我有空一定来。”聂赫留朵夫说。他觉得这个曾经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谢列宁，经过这短短的谈话后，突然变得生疏、格格不入而又难以理解，差一点成了仇敌。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谢列宁了。当时他是个优秀的子弟，真诚的朋友，上流社会里具有良好教养的青年，待人接物极有分寸，而且潇洒英俊，又异常正直诚实。他成绩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但并非学得特别用功，也没有丝

毫以才子自居的书生气。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类服务作为他青春生活的目标。

他认为要为人类服务除了进政府机关工作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因此，他刚一毕业，就对凡是他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负责制订法律的国务院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他就进了那个机关。

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既没能满足他要做一个有益的人的愿望，也没能在他的内心引发他正在做“正确的事”的意识。

由于他同心胸狭窄、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了冲突，这种不满意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在枢密院里他觉得好一点，但那种不满意的感觉仍然如影随形纠缠着他。

离开彼得堡之前

聂赫留朵夫非常忧愁。他所以忧愁，主要是因为参议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就肯定要遭受不应有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实现与她同命运的决心就更困难了。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带着一点儿不屑的神气交给他一张纸条，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的是，她是来向营救女儿的恩人道谢的，此外，还恳请他光临瓦西里岛五马路某号。

她还写道，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特别希望他去。还请他不要担心，她们不会说许多感激的话让他听了心烦，她们是不会说感激之类的话的，只不过很想见见他。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明天早晨就来。

另外还有一封信，是聂赫留朵夫的老同事、宫廷侍从武官包

加狄廖夫写来的。聂赫留朵夫准备把自己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交给他，请他亲手递给皇上。

包加狄廖夫用刚劲有力的大字写道，他一定照他许诺的，把状子亲自交到皇上手里，不过他想起一个主意：聂赫留朵夫先去拜访一下那个可以左右这件案子的人，托他一下，是否更好。

聂赫留朵夫几天来在彼得堡见闻了许多之后，灰心绝望，觉得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他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他觉得有点儿像是少年人的梦想，人要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进入社会，必然会失望。

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来到彼得堡，他还是认为应该按原来的打算来办，于是决定明天先去找找包加狄廖夫之后，就按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这时候，他把为教派信徒写的状子从皮包里取出来，想重看一遍，不料伯爵夫人的一名仆人敲了敲门，走了进来，请他上楼去喝茶。聂赫留朵夫说，马上就来，于是把状子放进皮包里，就上姨妈那儿去。

玛丽爱特头戴女帽，身上穿的已经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很花哨的浅色连衣裙，手里拿着茶杯坐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娇声细气地说着话儿，一面忽闪着她那一双笑盈盈的美丽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进门的时候，玛丽爱特刚刚说过一句很可笑的话，一句很不雅的笑话，这是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出来的，所以和善的伯爵夫人笑得“呵呵”直叫，那肥胖的身子直打哆嗦，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就挨着她们坐下来。

他刚刚想指责玛丽爱特轻浮，她就察觉了他脸上的严肃和有点儿不满的神情，她马上就改变了整个脸上的表情，甚至也改变了情绪，为的是讨他喜欢。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样了。他说了说上诉在参议院被驳回的情形和他遇见谢列宁的情形。

“啊！多么纯洁的一个人呀！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无畏骑士。”

“一个纯洁的人，”两位太太一齐用起了上流社会形容谢列宁的这个常用的形容语。

“他的妻子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道。

“她吗？哼，不过我不想说她。反正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道。“这太可怕了，我多么为她难过呀！”她又叹着气说。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为了改变话题，就谈起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被放出来的舒斯托娃。

他谢过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您不必对我说，”她说道，“我丈夫一对我说，她是放了的，我听到这种说法就吃了一惊。既然她没有罪，凭什么要关她呢？”

她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可恶，可恶！”

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向外甥卖弄风情，觉得非常开心。“你听我说，”等他们两个都不说了，她就说，“明天晚上你上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都对他说说了，他说，这都是好苗头，你一定会来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对他说说，让他去。你自己也去。”

“我吗，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替公爵拿主意，”玛丽爱特一面说，一面看着聂赫留朵夫，并且用这种目光沟通心意，好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和对待福音派的根本态度上取得完全的一致，“第二，您也知道，我不太喜欢……”

“你总是喜欢唱反调，自有一套。”

“怎么是自有一套？我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着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哎呀！你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说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真演得好极了。”

“那我究竟先去看谁好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聂赫留朵夫笑着说。

“请你别抓我的话把儿。”

“我想，最好还是先看传教士，然后再看法国女演员，要不然就毫无兴致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您听我说，”玛丽爱特沉思了一下，就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不能去……”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很赞赏您的做法，也很钦佩您。”

“说实在的，这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太少。”

“反正是这样。我理解您的感情，也理解她的……哦，好，好，我不谈这事吧，”她察觉他脸上有不愉快的神气，就把话收住。

“不过我还理解，您看到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景象之后，”玛丽爱特因为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着女性的敏感猜出他看重和珍视的是什么，就这样说，“您就想援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人在受人折腾，因为无人过问，因为有人非常残忍，那些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死去活来……我理解，可以为救人献出生命，换成我，我也愿意。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呀……”

他们谈的是当权者的无道、囚犯们的苦难、老百姓的贫困，然而实际上，他们那互相望着的眼睛却在谈话声中不停地传送着情意：“你爱我吗？……”

“我爱你。”性爱采取最意想不到的、最光彩的形式使他们互相吸引住了。

她临走时对他说明，她永远愿意尽她的力量为他效劳，并且请他明天晚上一定要上戏院去，哪怕待一会儿也好，她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他谈谈。

“唉，要不然我什么时候又能再见到您呀？”她叹了一口气，又说。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往戴满戒指的手上套。“您就说您来吧！”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这天晚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待在他的房间里，上了床，熄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参政院的裁决，想起他还是下决心跟她走，想起他放弃土地所有权。

想着想着，突然间，就好像出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似的，他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以及她在说“我什么时候又能再见到您

呀？”时的目光和叹息声，还有她的笑容，是那样真切，他好像真的看到了，于是他也笑了笑。

“我上西伯利亚去，这种做法好不好呢？我放弃自己的财产，这种做法又好不好呢？”他问起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里，皎洁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泻进来，可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模糊不清的。他的头脑里乱成了一团。他唤醒以前的心境，想起以前的那些想法，可是这些想法已经没有了以前那样的说服力了。

这天早晨，聂赫留朵夫暗自重温着昨天的那些想法，不由得感到惊讶：他怎么能够相信那些想法呢，哪怕是只相信一分钟？不论他打算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然而他知道目前他所能过的只有这样的生活。

这天是他在彼得堡停留的最后一天，他早晨到瓦西里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的住处在二层楼上。聂赫留朵夫依照扫院子仆人的指点，从后门走进去，顺着又直又陡的楼梯往上走，在楼顶上一脚踏进一个闷热的厨房里，闻到一股很浓的食物味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冒着热气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什么人？”她从眼镜架上边瞧着走进来的人，厉声问道。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通报姓名，那个女人的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情。

“啊，公爵！”那个女人叫起来，用围裙擦干净手。“不过您为什么从后门的楼梯走上来的呢？我们的恩人啊！我就是她的母亲。他们本来要把这个姑娘完全毁掉了。我们的救星啊，”

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极力要吻它。

“昨天我到您那儿去过一趟。我妹妹特意要求我去的。她就住在这儿。这边走，这边走，请您跟着我，”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窄门和一条幽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时而把她掖在腰里的连衣裙底襟放下来，时而理理她的头发。

“我的妹妹姓科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讲起过她，”她在房门前站住，小声补充一句。“她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个非常聪明的

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推开过道里的门，把聂赫留朵夫带进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一只小小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量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穿着条子花的布上衣。她的淡黄色头发是鬈曲的，披在她那很白的圆脸的四周，她的相貌像母亲。

她对面的圈椅里坐着一个青年男子，深深地弯下腰，他生着黑唇髭和稀疏的胡子，衬衫的领子上绣着花。他们两个人显然谈得很入神，一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门，才回过头来看。

“利季娅，这位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就是那个……”

面色苍白的姑娘慌忙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散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灰色的大眼睛，惊恐地瞅着走进来的人。

“原来您就是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的女人？”聂赫留朵夫含笑说道，伸出手去要同她握手。

“对了，就是我，”利季娅说着，微微一笑，张大了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她的笑容是善良而孩子气的。“我姨妈很想跟您见见面。姨妈！”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对着一扇房门叫了一声。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为您被捕而感到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在这儿坐，或者在这儿坐舒服一点，”利季娅指着一把软和而破旧的圈椅说，那个青年男子刚从那儿站起来。“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现聂赫留朵夫转过眼睛去看青年男子。

青年男子像利季娅那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打招呼，等到聂赫留朵夫在他的位子上坐下，就从窗口那边搬过一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从另一扇房门又走进一个16岁的中学生，生着淡黄色的头发，在窗台上坐下，一句话也没说。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是我跟她几乎可以说认识，”利季娅说。

这时候从隔壁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女人，生着很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穿着白色短上衣，腰上系着皮带。

“您好，谢谢您到这儿来，”她刚在长沙发上挨着利季娅坐下，就开口说。“哦，薇罗琪卡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怎么应付她的处境？”

“她没有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心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啊，薇罗琪卡，我了解她，”姨母含笑说道，摇着头。“应当了解她。她是个出色的人。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丝毫不为自己打算。”

“是的，她没有为她自己要求任何事情，光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难过，主要是因为据她说，您的外甥女是无缘无故被捕的。”

“就是这样，”姨母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啊！认真说来，她是在替我受苦。”

“完全不对，姨妈！”利季娅说，“即使您没托我，我也该保管那些文件。”

“你得承认我总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姨母接着说。“您要知道，”她转过脸去对聂赫留朵夫接着说，“这都是因为有一个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住处，就把那些文件带到她这儿来了。不料当天晚上，这儿遭到搜查，把文件和她本人一齐带走了。她一直监禁到现在，人家逼着她讲出她是从谁手里拿到这些文件的。”

“我始终也没有说，”利季娅很快地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她的头发，其实那绺头发没有碍她的事。

“我并没有讲你说出来了，”姨母反驳说。

“要是他们逮捕了米京，那也绝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利季娅说着，涨红脸，心神不宁地往四下里看。

“不过你别提这件事了，丽朵琪卡，”母亲说。

“为什么不能提？我偏要讲嘛，”利季娅说，她已经收敛笑容，光是涨红了脸。她不再撩她的头发，却把她的一绺头发缠在手指头上，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要知道，你昨天一谈起这件事就出了什么样的岔子。”

“根本就出什么岔子，您别管我，妈。我没有说出来，一直不吭声。他两次审我，问起我的姨妈，问起米京，我什么也没说。我对他声明说我什么话也不会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暗探，是宪兵，是大坏蛋，”姨母插嘴说，向聂赫留朵夫解释她的外甥女的话。

“于是他，”利季娅接着说，神情激动，话讲得很快，“就开始劝我。‘凡是您对我讲出来的话，’”

“他说，‘都不会对谁有害处，而且正好相反……要是您说了，您倒会使得那些无辜的、也许我们不该折磨的人自由了。’”

“哼，我仍旧说我不讲。于是他说：‘嗯，好吧，那您就什么也别讲。不过我说的话您也别否认。’他就列举出人名来，提到米京。”

“可是你别说了。”姨母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的一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看。

“忽然，您猜怎么着，第二天我听说，人家敲着墙通知我说，米京被捕了。得，我心想，我把他出卖了。这件事把我折磨得好苦，把我折磨得差点发了疯。”

“后来，事实证明，他被捕跟你完全不相干，”姨母说。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是我把他出卖的。我从这面墙跟前走到那面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心里止不住地想。我总当是我把他出卖了。”

“我一躺下来，盖上被子，就听见不知什么人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你把米京出卖了，米京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我又不能不听。我想睡觉，却睡不着。我要不想，却不能不想。那才可怕呀！”

利季娅说，越来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她的手指上，再把它松开，她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丽朵琪卡，你冷静一下吧，”母亲又说，碰一下她的肩膀。

可是丽朵琪卡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

“这种事所以可怕，是因为……”她又开口讲话，可是没有讲完就“哇”地一声哭了，从长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挂了一下，跑出房外去了。她母亲跟上去。

“恨不得把那些坏蛋统统绞死才好，”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随便说说的，”中学生回答说，拿起桌子

上放着的一支纸烟，点上，吸起来。

“是的，单身牢房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姨妈说着，摇摇头，也抽起烟来。

“我想，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聂赫留朵夫说。

“不，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如此，”姨妈答道，“有人告诉我，对于真正的革命者，这是休息，是静养。秘密工作者永远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也为事业担忧。最后被捕了，一切都了结了，如释重负，只管坐下来休息吧！他们对我说，一旦被捕，心里反而觉得高兴。”

“可是对于无辜的年轻人来说，像丽朵琪卡这样无辜的人总是首先被捕的。第一次的打击是很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失去了自由，受到粗暴的虐待，也不是因为牢房里伙食恶劣，空气浑浊，总之，这种种苦难都算不上什么。即使这种苦难再增加两倍，也是能够忍受下来的，而初次被捕时所遭到的精神打击却是无法忍受的。”

“难道您亲身经历过这种打击？”

“我吗？我坐过两次牢，”姨妈动人而又凄然地笑着说，她的笑容忧郁而可笑。

利季娅的母亲从刚才女儿出去的那扇门进来，她说利季娅心情很坏，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姨妈说，“我尤为痛心的是，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愿上帝保佑她，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好起来的，”母亲说，“我们要把她送到父亲身边去。”

“是啊，要不是您帮忙，她就全完了，”姨妈说，“多谢您了。不过我请您来，是想托您将一封信转交给薇拉·叶夫列莫夫娜。”

她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信来。

“信没有封口，您可以过过目，看过以后，或者撕掉，或者代为转交，总之，您看着办吧，决不能使您为难，”她说，“信里没有损害他人名声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转交，就起身告辞，走到街上。他没有把信拿出来看，封好信口，决定把它转交给薇拉·叶夫列莫

夫娜。

聂赫留朵夫这天晚上本来是要走的，但他已经答应过玛丽爱特到戏院去找她，虽然他知道不应该去，可还是认为应该履行诺言，就昧着良知去了。

“我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吗？”他犹豫地想。

“那就最后一次看看吧！”

他换好礼服，来到戏院，多年不下舞台的《茶花女》正演到第二幕，那个外来的女演员正在用新的方式表现害痲病女人的垂死状态。

戏院里满座。聂赫留朵夫问玛丽爱特的包厢在哪里，马上就有人给他指了指，并且对他这个打听那个包厢的人也流露出敬意。

过道里站着一个人穿号衣的仆役，就像见到熟人一样鞠了个躬，给他开了包厢的门。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披着红披肩、梳着粗大发髻的陌生女人，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是一位英俊而魁伟的将军，鹰钩鼻子，板着脸，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气，那垫了棉花和土布胸衬的军人胸脯挺得高高的；另一个是谢了顶的浅黄头发的男子，两边很神气的络腮胡子中间露出剃得光光的一小块下巴。

玛丽爱特妩媚，苗条，文雅，穿着袒胸露背的夜礼服，露出丰满、圆润、从脖子那儿斜溜下来的双肩，在脖子与肩膀相连处有一个黑痣。

她立即回过头来看看，用扇子给聂赫留朵夫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把椅子，并且朝他笑了笑，表示欢迎和感谢，而且他觉得这笑里还另有一番情意。

她的丈夫就像平时做一切事情那样，很平静地朝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从他的姿态，从他和妻子交换的目光中，都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这个美人的主宰和所有人。

等独白一念完，戏院里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着窸窣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半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一直用眼睛笑着，说过幸会之后，就带着平静和莫测高深的神气沉默了。

“我今天本来应该走的，可是我答应过您了呀，”聂赫留朵夫

对玛丽爱特说。

她的丈夫留神听着，用眼睛讥笑，而且笑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要去吸烟了。”他说。

聂赫留朵夫坐着，等着玛丽爱特和他谈原来她说要谈的一件什么事，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谈，甚至没有想谈的意思，而是在开玩笑，谈这一出戏，她认为这出戏想必特别能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

聂赫留朵夫看出来，她根本没有什么事要和他谈，只不过是让他看看她穿上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娇艳迷人。他觉得很愉快，同时又觉得厌恶。

她那艳丽的外表，以前遮盖了一切，现在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揭开，不过毕竟可以看到那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了。

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她的艳丽，然而他知道她是个弄虚作假的人，知道她同她那丈夫生活在一起，眼看他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却完全无动于衷，知道她昨天所说的都是假话，知道她一心要使他爱上她，至于这是为什么，他就不得而知了，再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情形又吸引他，又惹他讨厌。

他有几次要走，拿起帽子，可是又留了下来。最后，等她的丈夫在他那浓密的小胡子上带着香烟气息回到包厢里，盛气凌人地看了他一眼，仿佛不认得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的门关上，就走到过道里，找到自己的大衣，走出了戏院。他顺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

这天夜里大地上没有那种使人安静、催人入睡的黑暗，却有一种不清楚、不明朗、不自然、不知来自何处的亮光，在聂赫留朵夫心里也是这样，使他安然沉睡的那种愚昧的黑暗已经没有了。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了。

在火车上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里去，

把枢密院核准法庭的原判这个可悲的消息通知玛丝洛娃，告诉她现在要准备动身到西伯利亚去了。

玛丝洛娃又是从前那样的装束，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扎着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那冷冰冰的、气愤的脸色，就涨得满脸通红，不住用手指摸索上衣的底边，低下眼睛。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稳的声调说，眼睛没有看她，也没有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声调奇怪，仿佛她在喘气似的。

换了从前，聂赫留朵夫就会问一声，她为什么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现在他却光是看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

他不记得首先产生的是哪一种心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了自己、他自己的罪恶、他自己的卑鄙行径，如今他竟然责备她做了同样的事。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也就怜悯她了。

她愿意为他改变一切，而不愿意让他想当然地认为她还同原来的坏女人一样，由这一点足见聂赫留朵夫在她心目中的位置。玛丝洛娃仍然认为，而且继续使自己相信，她就像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他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原谅他，痛恨他。

其实她早已又在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到医院里去做杂工。

她所以做这些事，就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如果每次他提起他要同她结婚，她总是那么断然拒绝接受他的牺牲，那也只是因为她先前已经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以后就不愿意再改口罢了，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不幸。

她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她想到他藐视她，认为她在继续做她从前那样的人，而没有看见她内心所起的变化，她却感到很难过。

她暗想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坏事，而这件事比起她已经最后判决服苦役刑的消息来，更加使她痛苦。

玛丝洛娃可能随同第一批犯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所以聂赫留

朵夫正在为动身作各种准备。

聂赫留朵夫眼下要做的事情有三类。他按平时的习惯，一丝不苟地把各种事情分了类，并且将各种文件按照分类放到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情是有关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主要是为告御状而奔走，并且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情是处理好田产。在帕诺沃土地已经交给农民，条件是他们缴纳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是为了使这件事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在上面签字。

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还像他原来安排的那样，也就是说，他收地租，但必须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中拿出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当公益金。他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要花多少钱，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放弃全部收入，而只是将它减去一半。

第三类事情是帮助关押的犯人，现在求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在7月5日动身，而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

在动身的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一起进城来，要同他再见一面。

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去她母亲的老房子，但在那里只从阿格拉芬娜·佩特罗芙娜口里听说，她弟弟已经搬到一个带家具的公寓里去了，于是便又坐上马车到那里去。

在一条光线昏暗、令人窒息、白天也点着灯的过道里，一个脏兮兮的服务生告诉她，公爵不在。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的房间去，给他留个字条。服务生就领她去了。

她在桌子旁坐下，给他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趟，而且今天就去。然后她对她所见到的一切惊讶地摇摇头，就回旅馆去了。

聂赫留朵夫一回来，发现桌上有姐姐写的字条，就立即坐车去看她。已经是黄昏时候。姐夫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只有娜塔丽雅一个人接待弟弟。她穿着黑色紧腰绸连衣裙，胸前扎着红色花结，

黑黑的头发蓬松着，梳成时髦发式。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你胖了，更见年轻了，”他说。

她高兴得嘴唇都起了皱褶。

“你可是瘦啦！”

“哦，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呢。夜里他没有睡好。”

他们有许多要说的，可是又什么也说不出，倒是目光说出了该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像往常一样高高地昂着头，挺着宽宽的胸脯，迈着又轻又软的步骤走进房里来，那眼镜、秃顶和黑胡子都闪着亮光。

“您好，您好，”他用矫揉造作的腔调说。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就轻轻地坐到圈椅上。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口气，他的亲热的心情顿时消失了。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上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不起她，”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不光是陪她去，还有别的打算吧！”

“是的，还打算结婚，只要她愿意的话。”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觉得心烦的话，您给我解释一下您的理由。我不了解您的理由。”

“理由就是，这个女人……她在堕落道路上走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很生自己的气。“理由就是，我犯了罪，受惩罚的却是她。”

“她既然受到惩罚，那她恐怕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于是聂赫留朵夫带着不必要的激动心情把整个案子说了一遍。

“哦，这是审判长的疏忽，因此陪审人员的答复很不周到。不过，这种情形，还有参议院复审。”

“参议院已经驳回了上诉。”

“要是驳回了，那大概是没有充分的上诉理由，”拉戈任斯基

说。显然他完全赞同通行的见解，认为法庭辩论的产物就是真理。

“参议院不可能深入审查案情的实质。如果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应该请皇上圣裁。”

“状子递上去了，可是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皇家要问司法部，司法部要问参议院，参议院就把原来的裁定重述一遍，这么一来，无罪的人还是照样受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去问参议院，”拉戈任斯基带着自视甚高的笑容说，“而是向法院调阅原来的案卷，如果发现有错误，就会作出相应的结论；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受惩罚的都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带着十分自负的笑容不慌不忙地说。

“我的看法却与此相反，”聂赫留朵夫怀着很厌恶姐夫的心情说，“我认为，法庭判了刑的人，一多半是无罪的。”

“我想，您不理解的事情还多着呢，”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说，嗓音发颤。

聂赫留朵夫看见他姐夫的眼镜里边闪着一种蹊跷的亮光。“莫非那是眼泪？”聂赫留朵夫暗想。果然，那正是受了侮辱而流出来的眼泪。

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走到窗子跟前，拿出手绢来，清一清喉咙，开始擦眼镜，他取下眼镜以后还擦了擦眼睛。伊格纳季·尼基佛罗维奇回到长沙发上坐下，点起一支雪茄烟，不再开口说话。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把他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般地步，不由得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再也不会同他们见面了。他带着困窘的心情向他们告别，坐车回家去了。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一批犯人定于15时从火车站起程。为了亲眼看到他们从监狱出来，并且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去，聂赫留朵夫打算12时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装，吩咐看门人和随他同行的费多西娅的丈夫带着行李直接去火车站，自己立刻雇了辆马车直奔监狱。押送犯人的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个小时，因此，他把房钱全部结清，不打算再回来了。

现在正值闷热的7月天气。街上的石子、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

热的一夜之后，还没有冷却下来，又把余热送到凝固的热烘烘的空气中。

没有一丝风，即使偶尔吹来一阵，带来的却是尘土飞扬和满是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浊气。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他们都紧贴着房屋，在阴影下行走。

只有被太阳晒得黑黢黢的、穿着树皮鞋的修路民工蹲在街道中央，用铁锤把石子砸到滚烫的沙地里。脸色阴沉的警察，穿着白色的制服，挂着橘黄色的武装带，没精打采地倒换着两脚站在街心。

还有一些公共马车“叮叮当当”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套着白布罩，只露出两只竖起的耳朵。

聂赫留朵夫抵达火车站的时候，犯人们已经坐在带有铁栅窗的车厢里了。月台上站着一些送行的人，他们没有被准许靠近车厢。

聂赫留朵夫偷偷塞了些钱给一个军士，总算被放了过去。不过，军士要他快点说完话马上离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这列火车一共有18节车厢，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按照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的窗口。

聂赫留朵夫刚把头凑到窗口，一股充满浓重的汗臭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同时女人们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一排排长凳上都坐满了女犯，她们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衫，热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在高声地说话。

聂赫留朵夫凑近铁栅窗的脸引起了她们的注意。离窗较近的几个女犯立刻住了口，向他走过去。玛丝洛娃穿了一件短衫，没有扎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面带笑容的费多西娅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些。

她认出窗外站着的是聂赫留朵夫，就推了推玛丝洛娃，向她指了指窗口。玛丝洛娃赶紧站起来，用头巾把黑头发包好，汗水涔涔、红彤彤的脸蛋上绽开了爽朗的笑容，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真热啊，”她快活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些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他觉得闷热的车厢里就像蒸汽澡堂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能有水喝就好了，”费多西娅说。

“对，能有水喝就好了，”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不给你们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向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才能再见面。”

而随后的“沉默”和“叹气”又显示出她对聂赫留朵夫所作决定的复杂情感。“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假装不知，高兴地瞧了他一眼说。

“我坐下一趟火车走。”

玛丝洛娃沉默不语，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听说上车前监狱里有12个犯人给折磨死了，犯人在监狱管理者的眼中连一只蚂蚁都不如。这是真的吗？”一个面孔铁板的上了年纪的女犯用男人一样的粗嗓音问。

这个女犯就是科拉布廖娃。

“死掉12个，我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死了两个，”聂赫留朵夫答道。

“我听说死了12个。他们造了这样的孽，难道没有报应？这些该死的恶魔！”

“你们女人中间有没有害病的？”聂赫留朵夫问。

“女人的身子骨要硬些，”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快要生孩子了。听，她在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从那节车厢里不住地传来呻吟。

“您刚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说，她竭力抿住嘴唇，不露笑意。“能不能让这个女人留下来，要不然，她太受罪了。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我去说。”

“还有，能不能让她跟丈夫塔拉斯见上一面，”她用目光示意面带微笑的费多西娅，添了一句说。“她丈夫也跟您一起走。”

“老爷，不准交谈，”传来一个押解军士的声音。他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从车厢旁走开，去找长官，为临产的女犯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久没有找到，问押解兵，他们也不知道长官去了哪里。

直到第二遍铃声响过，聂赫留朵夫才找到押解官。那军官用一只短手抹了抹盖住嘴巴的唇髭，耸起肩膀，不知为一件什么事在训斥司务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他问聂赫留朵夫。

“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所以我想应该……”

“随她去生好了。等生下来再说，”押解官说，使劲地摆动两只短短的胳膊，朝自己乘坐的车厢走去。

这时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来。紧接着响起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声，从月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来一片哭泣声。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并排站在月台上，望着一节节带有铁栅窗的车厢和车厢里一个个男人剃光的脑袋在眼前闪过。

随后是女犯的第一节车厢，从车窗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戴着头巾，有的没戴头巾，接着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来一阵阵临产女人的呻吟。

再后面是玛丝洛娃坐的那节车厢。她和几个女犯站在窗口，望着聂赫留朵夫，神色凄然地对他笑着。

聂赫留朵夫所搭乘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起先聂赫留朵夫本想利用这段间隙到姐姐那里去一趟，但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情绪激动，精疲力竭，他一坐到头等候车室的沙发上，就出乎意料地觉得很困。他侧过身子，将脑袋搁在一只手上，便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手里拿着餐巾的服务员叫醒了他。

“请问，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正在找您。”

聂赫留朵夫突然站起来，揉了揉眼睛，这才想起他在什么地方，想起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聂赫留朵夫刚从沙发上坐起身，逐渐清醒过来，就发现房间里

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看着门口发生的一件什么事。他也向那边张望，这才看见一帮人抬进一把椅子来，椅子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一块薄薄的纱巾的太太。

前面抬圈椅的那个听差，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人帽子上镶着金丝绦，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椅子后面跟着一个装束优雅的女仆，头发卷曲，身上系着一条围裙，手里拿着一个包袱、一把阳伞和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圆滚滚的皮盒子。

再后面是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的柯察金公爵，他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的外交官奥斯登，他的情绪和表情还是一如以往地那么快活。

他边走边郑重其事地同笑吟吟的米西说话，不过显然带点调侃的味道。最后是个医生，生气地吸着烟。柯察金一家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位于去尼兹尼的铁路线上。

由抬椅子的人、女仆和医生组成的队伍鱼贯进入妇女候车室，引起了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

老公爵“一坐下”就“立刻”点酒菜，这也与候车室其他群众不一样，显示了公爵家的不同一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就把服务员叫过来，向他点了酒菜。

米西和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却忽然看见门口走进一个她认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过去。原来那个女人是娜塔丽雅·拉戈任斯卡娅。

娜塔丽雅在阿格拉芬娜·佩特罗芙娜的陪同下走进餐厅，不停地朝四下张望。她几乎在同一时间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只是对聂赫留朵夫点了点头，先走到米西那边去。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之后，就立刻转过身来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她说道。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招呼，并同他们聊了几句。米西告诉他他们乡下的房子着了火，逼得他们不得不搬到姨妈家去。奥斯登趁机开始讲一个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讲笑话，转过身去同姐姐说话。

“你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早就来了，”她说道，“阿格拉芬娜·佩特罗芙娜和我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芬娜·佩特罗芙娜，

那个女管家身穿防雨布大衣，头戴帽子，站在远处，现出和蔼而稳重的神态，扭捏地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们。

“我们到处找你。”

“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本来已经动笔给你写信了。”

“真的吗？”她说道，看上去很担心的样子，“关于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注意到姐弟两人开始谈私事，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一块垫子、一个盒子和一些别的东西。

“昨天我从你们那儿出来以后，本想回去赔罪，但我不知道你丈夫会怎样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道，“我对他说的话太草率了，我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我相信，你不是有意那样的。”姐姐说道，“噢，你也知道……”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她碰了碰他的手。

她这句话的意思不太清楚，可是他却完全理解这句话，被这句话所表达的情意所感动。

她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热爱，也是她所珍视和认为很重要的，他们之间的任何误会都会给她带来深深的痛苦。

“可你究竟准备怎么办呢？”娜塔丽雅继续问道。

“做我能做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做。”

他是铁了心要陪玛丝洛娃西行。“是的，我能理解。那么，你和他们怎么办呢？”她继续说道，微笑着朝柯察金看了看，“难道这一切就真的这样结束了？”

“完全结束了，而且我觉得两边都没有感到任何遗憾。”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不过，就算事情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她怯生生地加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跟着去呢？”

“你是说我打算和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好吧，你看，我是决心这样做了，可是她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他说着，声音颤抖了起来。每次他说到这件事，总是会这样。

“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但是她却在牺牲她自己，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这牺牲意味着太多。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她只是一时冲动的話。所以我现在要跟她一起去，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而且我还要尽我的力量来减轻她的厄运。”

娜塔丽雅沉默不语。阿格拉芬娜·佩特罗芙娜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她，摇了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个队伍又从妇女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听差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

她吩咐抬她的人停下来，招手要聂赫留朵夫过去，露出一副疲惫不堪的可怜表情，对他伸出一只戴着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着他有力的握手。

“太可怕了！”她说道，指的是炎热的天气，“我可受不了了！这种天气简直要我的命！”

接着她谈了一阵俄国气候的可怕之处，又约请聂赫留朵夫到她家里去玩，然后对抬椅子的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继续上路。

“您务必要来看望我们，”她被抬走的时候又转过她的长脸，对聂赫留朵夫补充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出去，来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队伍已经向右拐了个弯，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拿着他的行李的搬运工以及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了指塔拉斯，对姐姐说道，关于他的遭遇他先前已经告诉过她了。

“难道你真的就坐三等车厢吗？”当聂赫留朵夫在一节三等车厢前站住、搬运工和塔拉斯拿着行李一起走上那节车厢时，娜塔丽雅问道。

“是的，我觉得这样更方便些，我可以和塔拉斯一起，”他说道。

钱财，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是跳不过去的一种人性障碍，姐弟之情，亦不过如此。“哦，还有一件事，”他又说，“到目前为

止，我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交给农民，万一我死了，那就由你的孩子们继承吧！”

“德米特里，别这样，”娜塔丽雅说。

“不过就算我把土地都交出去，还有一点可以说说，那就是，我所有其他东西都归你的孩子们，因为我未必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来，她听到这话很高兴。

公爵夫人已经被抬进头等车厢。前面，头等车厢旁边只剩下一小堆人，依然站在那里望着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经就座。有些迟到的乘客咚咚地踩着月台的木板急急忙忙跑着，列车员砰砰地关着一个个车门，请乘客就座，请送行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滚热的臭烘烘的车厢，随即又走到车尾的平台上。

娜塔丽雅戴着她那时髦女帽，披着披肩，跟阿格拉芬娜一起站在车厢旁边，显然想说点儿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甚至连“写信来呀”都不能说，因为她和弟弟早就嘲笑过离别的人这种老一套的话。

刚才那短短的几句有关财产和继承的话，一下子破坏了他们之间原本建立起来的手足之情。他们现在觉得彼此疏远了。

所以，等到火车开动，这时也只能点点头，带着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再见了，啊，再见，德米特里！”

她倒是高兴起来。可是等到这节车厢一过去，她想了想怎样把她和弟弟的谈话告诉丈夫，脸色就阴沉下来，显出心事重重的神气。

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乘客。这儿有仆役、作坊工人、工厂工人、屠宰工人、犹太人、店员、女人、工人的妻子。此外还有一个士兵、两个太太，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却上了岁数，裸露的胳膊上戴着好几只手镯。

车厢里还有一个脸色严厉的老爷，戴着黑制帽，佩着帽徽。所有这些人已经分别找到座位，安下心来，温顺地坐着，有的人嗑葵花子，有的人吸纸烟，有的人同邻座乘客热闹地谈天。

塔拉斯带着快乐的神情坐在过道右边的一条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跟对面座位上的乘客正谈得热闹，那个人肌肉发达，穿着呢料的农民外衣，敞着怀，后来聂赫留朵夫听说他是个花匠，到一个地方去上工的。

聂赫留朵夫从过道里走过来，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半路上就在一位仪表体面的白胡子老人身旁站住，老人身穿土布农民外衣，在同一个农村装束的青年女人攀谈。

一个7岁的小姑娘坐在那个女人身边，两只脚离地很远，身上穿着新做的无袖长衫，淡得几乎发白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

老人回过头来看聂赫留朵夫一眼，就敛起自己长外衣的衣裾，在他一个人坐着的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块地方来，亲热地说：“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让给他的位子上坐下。

老人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他是砌炉匠，干了53年，这一辈子砌出来的炉子简直不计其数，如今打算歇一歇，可总是歇不下来。最近他到城里去过一趟，给他的孩子找了工作，现在回到农村去看望家里的人。

聂赫留朵夫听完老人讲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着的座位走去。

“好，老爷，您坐吧！我们把背包挪到这儿来就成了，”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眼睛看一下聂赫留朵夫的脸，亲热地说。

“固然人多太拥挤，可是相处挺和气，”笑吟吟的塔拉斯用唱歌般的声调说，然后伸出两只有力的手把他那两普特重的背包像一片小羽毛似地举起来，搬到窗口。

“地方宽绰得很呢，要不然就是站一会儿也不碍，钻到凳子底下去也成。这儿真是再舒服也没有了。怎么也吵不起架来！”他说着，脸上洋溢着和蔼亲切的神情。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总是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可说，一喝酒就有许多好话要说了，而且能说个不停。确实，在清醒的时候，塔拉斯大半总是不言不语，喝了酒才谈笑风生，不过他是难得喝酒的，只是偶尔在特殊情况下才喝一点。

在那种时候他常常讲得又多又好，十分朴实真诚，尤其是十分亲切，这种亲切也不断地在他那对善良的天蓝色眼睛里，在不离他唇边的殷勤笑意里闪耀着。

今天他就是处在这种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一时间住了嘴。不过他把背包放好以后，就照先前那样坐下，把两只干惯活的、有力的手放在膝头上，直率地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话。

他在对他的新相识详细地讲他妻子的事，讲她因为什么缘故判处流刑，讲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

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聂赫留朵夫从来也没有听过，因此现在他关心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正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干出来，他家里的人已经弄明白这件事是费多西娅干的。

“我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转过脸来对聂赫留朵夫恳切、和善地说。“我凑巧碰上这么个热心肠的人，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起我的事来了。”

“对，对，”聂赫留朵夫说。

“喏，这件事就照这个样子弄得水落石出了。我妈手里拿着那块饼。”

“她说：‘我要去找乡村警察。’”

“我爹是个讲理的老汉。他说：‘慢着，老婆子，这个小娘儿们还根本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咱们得怜惜她才是。也许她会明白过来。’”

“这有什么用？我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留下她，她就会把咱们当做蟑螂似的统统害死了。’”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立时来到我们家里……紧跟着他就传齐了证人。”

“那么，当时你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肚子痛得直打滚儿，不住地呕吐。我的五脏六腑全翻了个过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顿时套上一辆大车，叫费多西娅坐上去，赶着车子到警察局，又从那儿再到法院的侦讯官那边去。”

“她呢，如同从一开头起就全盘认了罪一样，见着法官也一五一十照实招供了。她从哪儿拿来的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面饼

里，她全说了。”

“法官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她说：‘就因为我讨厌他。我宁可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意跟他一块儿过。’”

“她说的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含笑说道。

“反正她全盘认了罪。当然，她给关进监牢去了。我爹就一个人回到家。这当儿，干农活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家里却只有一个娘儿们，就是我妈，而且就连她也气力不济。我们寻思：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把她取保放出来呢。”

“我爹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就又一个。他一连气找了这么5个。我们正打算撂手不干了，偏巧又碰上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儿。他可是个机灵鬼，简直天下少有。”

“他说：‘你给我5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

“后来讲了讲价，讲妥3个卢布。好，我就把她织的粗麻布抵押出去，给了他钱。他写起公事来真快啊，”

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的是开枪似的，“一转眼的工夫就写成了。这当儿我赶紧站起来，亲自赶车到城里去接她。我就到了城里。我在客栈里拴好我那匹母马，拿着那个公事直奔监狱。”

“‘你有什么事？’”

“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一遍，我的老婆就关在你们这儿。”

“他说：‘有公事吗？’”

“我马上把手里的公事拿给他。他看一遍。他说：‘你等一会儿。’”

“我就在那儿一条长凳上坐下。太阳已经过了中午。有一个当官的走出来，他说：‘你就是瓦尔古绍夫吗？’”

“我说：‘就是我。’”

“他说：‘好，你把她接出去吧！’”

“大门立刻开了。她给押出来，穿着她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

“‘行了，咱们走吧！’我说。”

“她就问：‘莫非你是走着来的？’”

“我说：‘不，我是赶着车子来的。’我们走到客栈，付清了

钱，把那匹母马套上车子，拿剩下的干草铺在大车上，上边盖一块麻布。她上车坐好，扎上她的头巾。我们就坐着车子走了。她不言不语，我也没开口。”

“一直到我们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好吗？’”

“我说：‘好。’”

“她又说：‘那么爹好吗？’”

“我说：‘好。’”

“她就说：‘你要原谅我干的糊涂事，塔拉斯。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就说：‘多说话，没用处。反正我早就原谅你了。’”

“别的话我也没再说。我们到了家里，她立时在我妈跟前跪下。”

“我妈说：‘求上帝宽恕你吧！’”

“我爹跟她打招呼，说：‘干什么再提旧事呢。你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也没工夫讲这些，’他说，‘现在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边，’他说，‘那块黑麦地上过肥，靠上帝保佑，长势可真好，连镰刀也下不去，穗子跟穗子缠在一块儿，一大片一大片地倒在那儿。如今该去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去收割吧！’”

“从那时候起，她就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带劲了，招得大家瞧着都发愣。那时候我们家里租来3俄亩地，靠上帝保佑，不管是黑麦还是燕麦，都是难得的大丰收。”

“我割麦，她打捆，再不然就我们俩一块儿割。我干活麻利，从不偷懒，她呢，不管动手干什么活，比我还要麻利。她是个伶俐的娘们儿，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她干起活来简直没命，弄得后来我只好拦住她了。”

“我们回到家里，总是手指头肿着，胳膊酸痛，应该歇一歇才是，可是她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又跑到粮仓里，编第二天早晨要用的草绳。她全变了！”

“那么，她跟你也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吗！她跟我寸步不离，倒好像我们俩合成了一个人似的。我心里盘算什么，她都摸得准。我妈动不动就发脾气，可是

就连她也说：‘咱们的费多西娅简直像暗中让人调了包，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娘儿们了。’”

“有一回我们赶着两辆大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块儿坐在车头的那辆大车上。我就说：‘当初你怎么会起意干那种事的，费多西娅？’”

“她说：‘我怎么起意的？我不愿意跟你一块儿过嘛！我心想，我宁可死也不跟他一块儿过。’”

“我就说：‘哦，那现在呢？’”

“她就说：‘现在啊，你成了我心上人了。’”

塔拉斯停住嘴，快活地微笑着，惊讶得直摇头。“我们刚从地里收完庄稼回来，把大麻拿去浸在水里，一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冷不防，传票来了，要开审了。可是我们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想不起她是为什么要受审了。”

“这不是别的，准是魔鬼干出来的把戏，”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异想天开，要去害死另外一个人吗？是啊，我们那儿就有这么一个人……”

花匠本来要开始讲一个故事，可是火车渐渐停下来了。

“好像到车站了，”他说，“到外头去喝点什么才好。”

谈话就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月台上铺着的湿木板上。

从车站拐角处走出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走到月台上。工人们跨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到离得最近的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马上被列车员赶走了。

工人们没有停下脚步，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继续向前跑，到了第二节车厢旁边，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肩上背的行囊不时地被车角、车门钩住。

这时另一个站在车站大门口的列车员看见他们要上车，就厉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赶紧退下来，又迈开大步向下一节车厢走去，也就是向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那节车厢走去。列车员又上前拦住他们。

他们停下来，准备再往前走，可是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们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工人们听了他的话，上了车。

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车。工人们正要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戴着缀有帽徽的帽子的老爷和两个太太，看到他们肆无忌惮地坐下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并且动手赶他们下去。

这20来个工人，有年岁大的，有年纪很轻的，个个又黑又瘦，疲惫不堪，他们分明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背上的行囊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显然，他们打算走到天边，只要别人允许他们坐下，哪怕坐到一枚钉子上也行。

“你们往哪儿跑，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从对面走过来喝住他们。

工人们仿佛躲过一场灾难，如释重负，心里很高兴。他们停下脚步，纷纷找位子坐下，肩膀一甩，卸下背上的行囊，把它们塞到长椅底下。

跟塔拉斯聊天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了3个座位。3个工人坐了下来。他们看到聂赫留朵夫走过来，再加上他一身老爷的打扮，不由得心里发慌，赶紧站起来想走。

聂赫留朵夫请他们坐着好了，自己在靠近过道的一条长椅的扶手上坐下来。

一个50岁上下的工人跟另一个年轻工人互使了一下眼色，流露出困惑甚至惶恐的神情。他们看到聂赫留朵夫不像别的老爷那样骂他们，赶他们走，反而把位子让给他们坐，感到又吃惊，又困惑。

他们甚至担心会不会因此惹出什么祸来。不过，当他们看到这里并没有圈套，看到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在随便聊天，这才放心来，他们叫年纪轻的一个坐到行李上，把位子让出来给聂赫留朵夫坐。

起初，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总是佝偻着身子，尽力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生怕碰到老爷身上。后来他跟聂赫留朵夫、塔拉斯谈得很亲热，当他讲到得意时，为了引起聂赫留朵夫的关注，还用手背拍拍他的膝盖。

他讲述了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他在泥炭沼泽田里干活，已经干了两个半月，每个人大约挣了10卢布，有一部分工钱已经在受雇时预支了，现在他们就是把工资拿回家去的。

他说，他们都是在齐膝深的水里干活，从日出干到日落，只有吃午饭的时候才休息两个钟头。

接着他又讲，他出外做工28年，挣来的钱全交给家里，起先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交给当家的侄儿。他一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拿两三卢布零用钱，买点烟叶，买点火柴。

“我到过不知多少地方，这样好心的老爷从没见过。他不光不打你，而且还让出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有好有坏的，”末了，他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看着这些筋骨强健、却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黝黑、疲惫、亲切的面孔，并感到他的周围都是全新的人，他们有高尚的兴趣，有真正劳动者的快乐和痛苦。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也想起柯察金之流那个醉生梦死、挥金如土的世界以及他们俗不可耐的兴趣。

他就像一个发现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的旅行家，内心充满着无比的喜悦。

西 行

那批犯人，包括玛丝洛娃在内，已经走了将近5000俄里。

玛丝洛娃跟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只有到了这个城市，聂赫留朵夫才算疏通成功，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他是听从跟那批犯人一同登程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出的主意才这样做的。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这在各方面改善了她的处境。

姑且不谈政治犯的住处比较好，伙食比较好，所受到的粗暴的待遇也比较少，首先，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当中以后，她的处境得到改善，这表现在她不再受到男人的搅扰，可以安心生活，不至于

每一分钟都得想起她目前十分希望忘掉的那些往事了。

不过这次调动的主要好处，却在于她认识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对她起了决定性的、极为良好的影响。

另外还有两名政治犯也与她同行，一个是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谢季宁娜，另一个是叫做西蒙松的人，正流放到雅库茨克区去，聂赫留朵夫在那次探监的时候也见过他，生得肤色发黑，头发蓬松，一对眼睛在额头下面深深地凹进去。

那是9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天色还早。天空中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不时刮来一阵阵寒风。那批犯人一共大约有男子400名妇女50名。

他们已经出来，待在旅站的院子里，有一部分人聚在押解官周围，押解官正在把两天的伙食费发给犯人们的班长，有一部分人向得到许可走进旅站院子来的女贩们购买吃食。

犯人纷纷数钱购买食物，人声嘈杂，女贩们也“嘁嘁喳喳”地讲个不停。

卡秋莎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一块儿，两个人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短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的住房来到院子里，朝女贩走去。

女贩都坐在北面墙根底下一块背风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叫卖她们的货物：新鲜的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有个女贩甚至卖一头烤熟的乳猪。

卡秋莎已经买下一些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白面包，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袋子，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在同女贩算账和付钱。这时候犯人们活动起来。大家不再谈话，纷纷站好队。

军官走出来，作出发以前的最后指示。

一切事情都照往常那样进行着：清点犯人的人数，检查犯人的镣铐是否牢固，把排成双行走路的犯人们用手铐锁在一起。

可是，突然间，大家听见军官的威严而震怒的喊叫声、殴打人的身体的响声和小孩的啼哭声。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静下来，随后人群里低声埋怨起来。

卡秋莎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朝传来吵闹声的地方走去。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和玛丝洛娃走到人声喧闹的地方，只见一个留着很

长的淡黄唇髭的、身体结实的军官，皱紧眉头，正用左手揉着右手的手心，原来他刚刚打了一个犯人的耳光，把手打疼了。

他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面前站着一个人剃光半边头发、身穿短衣短裤的瘦长个儿的男犯，他的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尖声哭叫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看你还敢不敢顶嘴，把孩子交给娘儿们，”军官嚷着，“快戴上手铐。”

原来，这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患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那军官一定要他戴上手铐，犯人就顶了他一句，说戴了手铐就不能再抱孩子。那军官本来心里就有气，一听这话，更加火冒三丈，就动手打了这个胆敢违抗命令的犯人。

在遭受毒打的犯人的对面，站着一个人押解兵和一个人留着黑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愁眉不展，一会儿看看军官，一会儿看看抱着小女孩的挨打的犯人。

军官再一次命令押解兵将小女孩带走。这时越来越多的犯人嘀咕起来，表示不满。

“从托木斯克一直走到这里，从没叫他戴过手铐，”从队伍后排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

“又不是小狗，是个孩子。”

“叫他把这小姑娘放哪儿去？”

“这是违法行为，”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军官仿佛被蛇突然咬了一口，喊道，一面向人群冲过去，“我叫你领教领教什么是法律。是谁说的？是你？还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大脸盘的矮个子犯人说。他还没有把话说完，军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打过去。

“你们想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像狗一样统统毙掉。上司只会对我说声‘谢谢’。把小女孩带走！”

人群平静下来。一个押解兵从犯人手里夺过不停哭叫的小女孩。另一个押解兵给无可奈何伸出手来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带到娘儿们那儿去。”军官整整挂军刀的皮带，大声命

令押解兵。

小女孩挣扎着从头巾里伸出小手，涨红着脸哭个不停。这时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从人群里站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把这小女孩交给我吧！”

抱着小女孩的押解兵停住了脚步。

“你是什么人？”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漂亮的脸蛋和她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对军官起了作用。他默默地对她看看，好像在反复考虑什么。

“我无所谓。你愿意，就带走。你可怜他们，这很好，不过，他跑了，谁来负责。”

“他抱着小孩，怎么能跑得掉，”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说。

“我没有工夫跟你们闲扯。你要，就抱走。”

“我能交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吧！”

“到我这儿来，”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说。她竭力哄小女孩走到她身边。

可是小女孩从押解兵手里挣脱以后，就尖叫着朝父亲那儿跑去，不肯走到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跟前。

“您不用着急，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说着，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面包圈。

小女孩认得卡秋莎，现在看到她的脸和面包圈，就向她走过去。

事情总算解决了。这时大门已经打开，犯人们走到外面排好队。押解兵又将人数清点了一遍。大家把行囊放到车上，捆好，又让体弱的犯人坐上车。卡秋莎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的队伍里，和费多西娅站在一起。

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才发生的事，现在他昂首阔步向押解官走去。押解官刚把事情安排停当，准备坐上四轮马车出发。

“您的做法很不对头，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滚回去，这不关您的事。”

“我就是管，我要对您说，您的做法很不对头，”西蒙松从

两道浓眉下面射出犀利的目光，盯住军官的脸说。

“准备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军官对西蒙松不理不睬，大声喊道，然后搭着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了四轮马车。

队伍向前蠕动，拉得很长，穿过浓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渠、中间碾满车辙的泥泞道路前进。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在城里过了6年奢侈堕落生活的玛丝洛娃来说，这几个月同政治犯在一起的监狱生活反而很好。

每天走上15俄里至20俄里，很好的伙食，每走两天还可以休息一天，这些都令她的身体强壮起来，而和新同伴的关系为她展现了一个从没想到过的充满乐趣的生活。

和她在一起的人都是这么的好，她不仅从没遇到过，甚至都无从想象。

她无疑是毫不费力就理解了指导这些人行动的动机，同时作为平民，她给予他们充分的同情。她明白他们是为了人民反对上层阶级，尽管他们自己属于上层阶级，却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一点令她尤为尊重和敬佩。

所有的新伙伴都令她愉快，尤其是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不仅令她感到欣喜，更怀着一种特有的敬佩和挚爱之情。

令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会说3种语言的美丽姑娘是一个富有的将军的女儿，她把富有的哥哥送给她的所有东西都分给别人，自己过得却像个最朴素的工人家的姑娘，穿戴不仅简单，甚至寒酸，对自己的外表一点都不在意。

在玛丝洛娃刚开始加入他们的时候，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对她感到抵制和厌恶。玛丝洛娃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她同样注意到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在努力克制住这种感情，对她尤为温柔和善良。

这种来自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的温柔和善良令玛丝洛娃深受感动，于是把自己整颗心都交给了她，并且不自觉地接受了她的观点，忍不住处处模仿她。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也同样被卡秋莎诚挚的爱所打动，对她回报以同样诚挚的爱。

帕夫洛夫娜的影响只是卡秋莎受到的一种影响。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她爱帕夫洛夫娜。另外一种影响是西蒙松的影响。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西蒙松爱上了她。

有些人像做智力游戏一样随意运用自己的思想，把智力当做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其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却顺从别人的思想，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

另一些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动的主要动力，几乎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智力的要求，听从这样的要求，只是偶尔顺从别人的决定，而且就连这样，也还是经过批判性的估计之后。

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一切事情他都用智力来检验和决定，一旦决定，就要去做。

他爱玛丝洛娃，并不违反这种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样的爱情不仅不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的活动，而且更能鼓舞他从事这种活动。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人爱上了玛丝洛娃，才对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玛丝洛娃凭着女性的敏感很快就猜出他爱上了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引起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人的爱慕，就提高了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作为“人”的卡秋莎，爱首先就是平等与尊重，她能从西蒙松的爱里得到这些，她很愉快。聂赫留朵夫要和她结婚，是出于舍己为人精神，还因为过去的事，然而西蒙松爱的却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她，而且爱她就是因为爱她。

此外她觉得，西蒙松认为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女人，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她不太清楚他究竟认为她具有哪些高尚品质，但不管怎样，为了不让他失望，她总是想方设法身体力行地表现她能够想象到的最好品德。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人。

这事儿开头还是在监狱里，那是在探望政治犯的日子，她发现他那纯真、善良的深蓝色眼睛在隆起的额头和眉毛底下盯着她，那目光特别深沉。

那时候她就发现，这人与众不同，看她的目光也与众不同，并且发现那竖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所表现的严肃神情和目光中的孩子般善良与纯真在一张脸上的惊人结合。

后来到了托木斯克，她调到政治犯这边来，她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彼此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是从他们对视的目光中却可以看

出来，他们都还记得，而且彼此都很看重。

后来他们彼此也没有说过什么重要的话，可是卡秋莎感觉出来，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给她听的，他是为她说的，所以尽可能说得明白易懂。尤其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那时候起，他们就接近起来了。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的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只有机会同卡秋莎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城，犯人们坐上一条四周圈着铁丝网的驳船以前；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办公室里。这两次会面，他都发现她不爱说话，态度也不和气。

他问她一路上好不好，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回答得支支吾吾，心慌意乱，而且依他看来，似乎还流露出她以前就已经表现过的那种敌视的责备神情。

自从她随着队伍跋涉了两个月以后，她内心所起的变化也在她的外貌上表现出来。不管她的装束也罢，她的发型也罢，她对人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先前卖弄风情的迹象了。

她这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进行的内心变化，不断地在聂赫留朵夫心里引起一种特别欢乐的心情。

这种心情似乎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里开辟了一道爱的激流，原先这种爱找不到出路，现在却向他遇见的一切人涌去。

聂赫留朵夫感到他自己在这次旅行的整个时期保持着一种情绪昂扬的精神状态，因而对所有的人，从押解兵和马车夫起，到跟他打过交道的监狱长官和省长止，不由自主地变得关心和体贴了。

在这段时期，由于卡秋莎已经调到政治犯当中，聂赫留朵夫就得到机会认识了许多政治犯，最初是在叶卡捷琳堡认识的，因为政治犯们在那里很自由地同住在一个大牢房，后来他在路上又认识了同卡秋莎一起的5个男犯人和4个女犯人。

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以后，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特别是在3月1日以后，聂赫留朵夫一直对革命者抱着恶感，鄙视他们。首先，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残酷而隐蔽的方法，尤其是他们残酷杀人的行为，使得他感到厌恶。其次，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特点，这

也惹得他讨厌。

既然别人像在战争中那样对付他们，自然，他们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犹如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作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一样。

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风险而做出的残忍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才非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

这也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非但不忍心使得活着的生物受苦，而且不忍心看到他们受苦，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作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

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那却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得重要，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接近和了解他们以后，深信他们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常的人。像各处的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好人、坏人和中间的人。

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的动机。

然而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生命为乐，像这一类的感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平常人的区别以及胜过平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要求高于在平常人中间所公认的道德要求。

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才总是远远地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才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不老实的、装腔作势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

因此聂赫留朵夫对待他的某些新朋友不但怀着敬意，并且充满热爱，而对待另外一些新朋友，就不止是冷淡了。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的是一个年轻的、害着肺癆病的男子克雷利佐夫，跟卡秋莎在一个队里，被流放去做苦工。

早在叶卡捷琳堡，聂赫留朵夫就已经同他相识，后来在旅途中又跟他见过几次面，谈过话。

夏天有一回，在旅站上，正赶上休息的日子，聂赫留朵夫几乎跟他消磨了一整天，克雷利佐夫畅谈起来，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到他怎样成为革命者。

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短。他父亲是南方一个省里富有的地主，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死了。他是独生子，由母亲养大成人。他不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学习都不费力，大学毕业获得了数学系第一名硕士学位。

有人要他留校，日后送他出国。可是他犹疑不定。他已经爱上一个姑娘，在考虑结婚，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他样样事都想做，反而无法决定该做哪一样好。这时候有几个大学同学来要求他为公共事业捐一点钱。

他知道这个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它完全不感兴趣，可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又爱面子，生怕人家以为他怕事，就捐了钱。

收钱的人被捕了。从那里搜到一张字条，根据那张字条查明钱是克雷利佐夫捐的。他就被捕，先是押在警察分局，后来送进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聂赫留朵夫讲起来，“在那个监狱里，管理还不算特别严，我们不但敲墙互通消息，甚至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随便交谈，把自己的食物和烟草分给旁人，每到傍晚甚至齐声唱歌。”

“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啊！要不是我母亲很伤心，那么在监狱

里待着，我倒觉得也挺不错，甚至心情愉快，觉得很有趣。我在那儿认识了不少人，其中有著名的彼得罗夫。此外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开始他因为政治牵连入狱，但在革命队伍里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中间者。”

“然而我当时并不是革命者。我旁边牢房里有两个人，我也认识了。他们全是因为携带波兰宣言一案被捕的，后来他们被押到火车站去，路上打算甩掉押解兵逃跑，于是受到了审判。一个是波兰人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佐夫斯基。”

“是啊。那个罗佐夫斯基简直是个小男孩。他说他17岁，可是从外表看上去，他只有15岁的样子。又瘦又小，一对黑眼睛亮闪闪的，性子活泼，跟所有的犹太人那样很喜爱音乐。他的嗓音正在变粗，不过唱起歌来好听。是啊。他俩提去受审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他们是在一天早晨给押走的。”

“傍晚他们才回来，说是他们被判处死刑了。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他们的案子那么轻，只不过是打算从押解兵的手里逃跑罢了，甚至没有打伤什么人。”

“再者，居然把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小孩子处以极刑，也未免不近情理。我们这些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断定这只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这个判决是不会得到上边批准的。”

“起初大家很激动，后来就放了心，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是啊。可是有一天傍晚，看守来到我的牢门跟前，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些木匠，正在搭绞架。”

“我先是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可是老看守那么激动，我看他一眼，心里明白过来，原来就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下的。我想敲墙，跟伙伴们讲这件事，可又生怕那两个人听见。伙伴们也都沉默着。分明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天整个傍晚，过道里和各个牢房里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我们没有敲墙通话，也没有唱歌。到22时光景，看守又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一个执行绞刑的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招呼他，要他回来。”

“忽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对面他自己的牢房里对我喊道：‘您怎么了？您为什么叫他？’”

“我就搪塞说他是给我送烟草来的，可是罗佐夫斯基仿佛猜出来了，开始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我们不敲墙通话。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不过我赶紧走开了，免得再跟他说话。”

“是啊。那天夜里真是可怕。我通宵听着各种声音。快到早晨，忽然，我听见过道的门开了，有人，有很多的人，走进来。我就走到牢门的小窗口站住。过道上点着一盏灯。”

“头一个走过来的是狱长。他体格壮实，似乎是个有主心骨的、处事果断的人。可是他神色大变，面容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副狱长跟着他走过来，皱起眉头，现出横下一条心的样子。殿后的是一个卫兵。他们走过我的牢房门口，在旁边的牢房门前站住。”

“我听见副狱长用那么一种奇怪的嗓音叫道：‘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

“随后我就听见那边的牢门‘吱扭’一响，他们走过去，后来我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正朝过道的那一头走去。我只看得见狱长一个人。”

“他站在那儿，面色惨白，一会儿解开胸前的衣扣，一会儿又扣上，不住地耸肩膀。忽然，他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闪到一边去。原来洛津斯基走过他面前，朝我的门口这边走过来。”

“您要知道，他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生着波兰人那种好看的脸型：额头又宽又平，头顶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鬃曲细密的金黄色头发，生着一对很美的天蓝色眼睛。”

“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精力那么旺盛，身子那么强壮。他走到我的小窗口跟前站住，因此我看得见他整个脸。那是一张可怕的、消瘦的、灰白的脸。”

“‘克雷利佐夫，有烟吗？’”

“我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似的，取出他的烟盒来，递给他。他拿了一根，副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开始吸烟，仿佛在沉思。”

“后来，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开口说：‘这种事既残忍，又不公平。我什么罪也没犯过。我……’”

“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年轻的、白皙的脖子，后来他喉头

发颤，住了嘴。这时候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上用他那尖细的犹太人嗓音嚷了一句什么话。洛津斯基丢掉他的烟蒂，离开我的牢门口。”

“紧跟着，罗佐夫斯基在我的小窗口出现。他那张孩子气的脸上闪着一对水汪汪的黑眼睛，脸色发红，正在冒汗。他身上也穿着干净的衬衣，长裤却太肥，他老是伸出两只手把裤子往上拉，周身不住地发抖。”

“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到我的小窗口上来，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叫我吃润肺汤药，不是吗？我不舒服，我还要再吃点润肺汤药。’”

“谁也没有答话，他就用疑问的眼光先是瞧一瞧我，然后瞧一瞧狱长。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忽然，副狱长露出严厉的脸色，又那么尖声尖气地嚷起来：‘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吧！’”

“罗佐夫斯基显然不理解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仿佛着了急似的往前走去抢在大家的前头，顺着那条过道，几乎是在跑步。可是后来，他又停住脚不肯走了，我听见他尖着嗓子哭叫。那边开始传来乱哄哄的喧哗声和顿脚声。他在尖声喊叫，痛哭。”

“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一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他们就这样受了绞刑。两个人都用绳子勒死了。另外一个看守当场看见了，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可是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很久，他们就硬把他拖上绞架，使劲把他的头塞进绳套里。”

“那个看守是一个有点愚蠢的家伙。‘老爷，人家都对我说，行刑是可怕的。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受绞刑的时候，只有肩膀动了这么两下，’”

“他说着，做出肩膀猛一下耸上去，随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一拉绳子，喏，为的是把绳套拉得紧一点，于是就完事，他们再也不动了。’”

“一点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把看守的话重说一遍，他本来想笑，可是没有笑成，却放声大哭。

这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呼呼地喘气，把涌上他喉头的哽咽压下去。

“从那时候起，我才成了革命者。”他说，平静下来，简短地结束了他的经历。

他加入民意党，甚至做一个破坏小组的领导人，这个小组的目的就在于对政府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它自己放弃政权，号召人民起来。

他抱着这个目的有时候到彼得堡去，有时候到国外去，有时候到基辅去，有时候到敖德萨去，到处都获得了成功。后来，有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把他出卖了。

他被捕，受到审判，在监狱里囚禁了两年，结果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病。目前，在他所处的条件下，他显然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不过他并不后悔他做过的事，而且说，如果他可以再活一辈子，他也仍然会利用它来做同样的事，那就是破坏这种社会制度，免得他所见到的那些事再有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使聂赫留朵夫懂得了他以前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

押解官和犯人们在旅站因为孩子发生冲突的那天，在村里旅馆过夜的聂赫留朵夫醒得很晚，还花时间写了几封信，准备在下一站省城寄出，因此他离开旅馆的时间比往常晚了点，也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在路上赶上队伍，到达下一个旅站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

旅馆老板是一个长着白胖脖子的老女人。他在旅馆烘干衣服，在装饰着大量圣像和图画的干净房间里喝了茶，然后急忙跑去请求军官准许他和玛丝洛娃见面。

在前6个旅站上，没有一个军官允许他这么做。尽管他们更换过几次，却没有一个人同意让聂赫留朵夫进到旅站里，他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玛丝洛娃。

那位所谓重要的监狱官员理都没有理这支队伍，而队伍里的官兵却早已紧张得要命了。这种严格是因为有一位重要的监狱官员要从这里经过。

现在那个官员已经过去了，根本连一眼都没看过队伍，聂赫留朵夫希望那天早上负责犯人的军官能允许他见一见犯人，就像之前的军官那样。

在走过教堂前的空地和两边窗子在黑暗中发出明亮光芒的长街后，聂赫留朵夫跟着他的向导来到了漆黑一片的村子边上。不过他们很快就在黑暗中辨别出旅站前路灯穿过薄雾发射出的光线。略带红色的灯的亮点越来越大，最后木栅树桩、哨兵走动的身影、漆成黑白条纹的柱子还有哨兵的岗亭都看得见了。

发现有人走近，哨兵照例喊了声：“什么人？”

看清来的是陌生人后，他变得十分严厉，甚至不允许他们在木栅旁等候。不过聂赫留朵夫的向导并没有因为这种严厉而显得不安。

“你好，伙计！这么凶干吗？你去把你的头儿叫起来，我们在这儿等他。”

哨兵没有回答，冲着门里喊了一声，然后站在那儿，看着这个宽肩膀的年轻劳工借着路灯光用碎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子上的泥。木栅后面传来男人女人的嘈杂声。大约过了3分钟，那边发出“哗啦哗啦”地声音，大门打开，一个肩上搭着斗篷的军官从黑暗中走到路灯的灯光下。

军官并不像小兵那样严格，好奇心却很重。他坚持要知道聂赫留朵夫为什么要见押解官，他又是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说他来是为了特别的事情，也会向他表示谢意，问他是否可以帮忙递张条子给押解官。军官接过条子，点点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大门又发出“哗啦哗啦”地声音，一群拿着篮子、盒子、水壶和布袋的女人走了出来，她们大声说着特别的西伯利亚方言，迈过门槛。

没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衣服，都穿着城里的式样：短上衣和毛边大衣。她们的裙子高高掖起，头上包着围巾。她们借着路灯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他的向导。其中一个一看到宽肩膀的小伙儿就表现出明显的高兴劲儿，亲昵地用西伯利亚话骂他。

“你这个坏家伙，上这儿来干吗？当心被魔鬼带走！”她对他说道。

“我是带这位旅客来的。”年轻小伙儿回答，“你又带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早上还要再送些过来。”

“他们没留下你过夜吗？”年轻小伙儿问道。

“你这个该死的，你这个骗子！”她笑着喊道，“嗯，和我们一起回村子里去吧！”

向导说了些什么作为回答，不仅令女人们笑起来，连哨兵也跟着笑了，接着他转向聂赫留朵夫说道：“您自己认得路吗？不会迷路吧，会吗？”

“我会找到的。”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数过去第二个就是。哦，还有，拿着我的棍子。”他说着，把他带着的比他还高的棍子递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用大靴子踩着泥地和那些女人一起消失在黑暗中。

门“哗啦”一响，军官走出来请聂赫留朵夫跟着他去见押解官。此时小伙子的声音夹杂在女人的声音中间，穿过迷雾仍然听得见。

他登上三级台阶，便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烟气的前室。一名士兵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着领带，弯着腰站在火炉边，一只脚穿着长筒黄皮靴，拿着另一只靴子用靴筒给茶炉扇风。那士兵看见聂赫留朵夫，便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大衣，就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嗯，叫他进来，”一个气嘟嘟的声音说。

“您进来吧，”那士兵说过，就又去扇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里屋里，坐着一个军官，通红的脸，长长的淡黄色上嘴胡，身上穿的奥地利式上装把胸膛和肩膀裹得紧紧的，面前铺着桌布的桌子上还摆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

在这暖和和的屋里，除了烟草气味，还弥漫着很浓烈的劣质香水气味。押解官看到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子，带着又像讥笑又像怀疑的神气盯着这个进来的人。

“有何见教？”他问过，却不等回答，就朝门外嚷道：“别尔诺夫！茶炊究竟什么时候生好呀？”

“这就好。”

“我这就给你两下子，叫你记住！”押解官翻了翻眼睛，

喝道。

“来啦！”那士兵嚷着，端着茶炊走了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着士兵把茶炊放好。等茶炊放好了，押解官就煮起茶来。然后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瓶方形玻璃瓶装的白兰地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到桌上以后，这才又和聂赫留朵夫说话：“那么，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呀？”

“我要求见见一名女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坐下来，就说。

“是政治犯吗？这是法律不许可的，”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哦，请您坐下，”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不过，根据我的请求，上面的长官批准她跟政治犯一起走……”

“哦，我知道，”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小小的、头发黑黑的娘儿们吧？好的，这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包香烟朝聂赫留朵夫推了推，郑重其事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很想见见……”

“夜长着呢。您来得及。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把她叫出来，让我到她住的地方去？”聂赫留朵夫说。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让我去过好几次了。说实在的，如果怕我传递什么东西，那我通过她也可以传递呀。”

“那不行，她要被搜身的，”押解官说过，不愉快地笑起来。

“哦，那就把我搜一搜吧！”

“哦，咱们不来这一套也行，”押解官说着，拿起开了瓶塞的酒瓶，凑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

“来一点好不好？哦，那就听便。长年待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说真的，干我们这一行，您也知道，真是再伤心不过了。一个人要是过惯了另外一种日

子，如今这样真是够受。可是人家对我们这些人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押解官都是粗人，没有教养，就是不想想，也许有人天生不是干这个的呢。”

这个押解官那通红的脸、他那香水气味、他的戒指，尤其是他那不愉快的笑，都使聂赫留朵夫十分反感。可是聂赫留朵夫今天也和整个旅行期间一样，怀着一种郑重待人和关怀人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他不论对待任何人都不敢冒失和轻视，认为同任何人说话都必须“把心掏出来”，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态度。

聂赫留朵夫听了押解官的话，以为他的心情是因为参与摧残他手下的犯人感到心里难受，就郑重地对他说：“我想，凭您的职位，是可以减轻这些人的痛苦，从中得到安慰的。”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就是这号儿人嘛！”

“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沦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里被诬告毒死人命，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我想，这些人只要在您的手下，您是可以使他们的状况好一些的。我相信，您这样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的。”聂赫留朵夫尽可能把话说得清楚易懂，就像跟外国人或孩子们说话那样。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就说让这位先生到隔离房间里去看政治犯，可以在那儿待到点名的时候。”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走出去，又来到黑暗的院子里，路灯射出来的红光朦胧地照着这个院子。

聂赫留朵夫走进小旅站的前堂，那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也就是所谓的“马桶”。聂赫留朵夫头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坐在木桶边上。

她面前站着一个人，剃掉头发的脑袋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的帽子。他们正在谈话。男犯人一见聂赫留朵夫，就挤一下眼睛，说了一句：“就连沙皇也憋不住尿啊。”

可是那个女人把长囚衣的底襟放下来，低下头。

从前堂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旁有些牢房，开着房门。头一个是家庭牢房，其次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那一头有两间小牢房，是专供政治犯住的。

旅站里的这所住房本来指定供150个人居住，现在却容纳了450个人，十分拥挤，犯人们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也挤满了。有的在地板上坐着，躺着，有的拿着空茶壶走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走回来。

塔拉斯也在这些人当中。他追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善的脸变得很难看，因为他的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几处青紫的肿块。

“你这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事，”塔拉斯含笑说道。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地说。

“都是为了娘儿们，”一个跟着他们走过来的男犯人补充一句。

“他跟瞎了一只眼的费特卡干了一架。”

“费多西娅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她身体很好。喏，我现在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

塔拉斯说着，走进家庭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这个牢房的门里看一眼。整个牢房里，不管是在板床上边还是下边，都挤满女人和男人。牢房里弥漫着水蒸气，是从晾在那儿的湿衣服上冒出来的。

女人的喊叫声一刻也不停。这间牢房里挤得更厉害，就连房门口和门外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一群闹闹哄哄的犯人，穿着湿衣服，在分什么东西，或是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押解兵就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这是犯人们的班长在算账和扣钱，原来监狱里有一个开赌场的犯人，借钱给犯人们，还有些犯人欠下了他的赌债，都用纸牌剪成的纸片作为凭据，目前班长凭纸片从犯人们的伙食费里扣下钱来还给赌场主。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到军士和老爷走过来，就住了嘴，带着恶意见着两个过路的人。

在分钱的人当中，聂赫留朵夫发现一个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老是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在身边，小伙子肤色白净，模样可怜，所以才会有这种内疚，其中还夹杂着厌恶恐惧。拧起眉毛，面容仿佛浮肿似的。

此外，他还看见一个惹人讨厌的、麻脸的、烂掉鼻子的流浪汉，这个人颇有名气，据说有一次他越狱以后，逃进原始森林里，把一个同伙打死，吃了他的肉。

流浪汉在过道上站住，把湿大衣披在一个肩膀上，讥诮而蛮横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在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尽管这一连三个月当中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场合下常常看到这400名刑事犯，例如在热天，在他们脚镣的铁链拖在地上而扬起滚滚烟尘的大道上，或者在大道旁边他们休息的地方，或者在旅站的院子里遇到天气暖和他们之间发生公开通奸的可怕场面的时候，可是话虽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当中，像现在这样感到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仍旧会在他们面前生出痛苦的羞愧心情和负疚的感觉。

使他最痛心的是，他心里除了羞愧和负疚的感情以外，还夹杂着难于克制的厌恶和恐惧的心情。他明知道他们处在目前所处的地位就不可能不变成他们目前这个样子，可是话虽如此，他仍旧无法消除他对他们的厌恶。

“他们倒逍遥自在，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往政治犯的牢房门口走去，却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魔鬼，他们有什么不顺心的？反正他们的肚子不会痛，”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他们是犯人当中的统治者。这也是让聂赫留朵夫内疚和恐惧的，他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像政治犯那样有追求有新生。紧跟着又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

这时候人群当中响起了恶意的、讥诮的哄笑声。

带路的军士经过单身犯拘押室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说完转身走了。

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人提着脚镣上的铁链，光着脚大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刺鼻的汗酸臭，悄悄地对他说：“老爷，您出面来管管吧！那小伙子上了别人的圈套，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自己说是卡尔马诺夫。您出面管管吧，我们不能管，会被打死的。”

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连忙从聂赫留朵夫跟前走开了。

经过思想的变动，他知道自己会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他的正义感让这个曾经是统治者的公爵“复活”起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一个叫卡尔马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跟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跟他互换姓名：苦役犯去流放，而那个判处流放的小伙子代他去服苦役。

聂赫留朵夫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个犯人一星期前就把这个蒙骗手法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他会尽力而为，然后，头也不回，向前走去。

在叶卡捷琳堡，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了这个人。当时他托聂赫留朵夫说情，准许他的妻子跟他一起走。他的举动使聂赫留朵夫感到惊讶。

这个人中等身材，普通农民模样，30来岁，因谋财害命未遂罪被判服苦役。他叫马卡尔·杰夫金，犯罪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马卡尔犯下的，而是附在他身上的魔鬼干出来的。

他说，一天有个过路人来找他父亲，愿出两卢布要他父亲用马拉雪橇把他送到40俄里外的一个村庄去。父亲就叫马卡尔送他去。马卡尔套上马，穿好衣服，就同那个过路人喝起茶来。

过路人一边喝茶，一边告诉马卡尔，说他是回去成亲的，随身还带着在莫斯科挣来的500卢布。马卡尔一听此话，就跑进院子，找了把斧头塞到雪橇的草垫子下面。

“我自己也不知道干吗要带把斧头，”他说，“只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头。’”

“我这就把斧头带上了。我们坐上雪橇上路了。一路上平安无事。我也忘了那把斧头。眼看离村庄只剩6俄里路了，我们的雪橇从土道拐上大路，往山坡上爬。我从雪橇上跳下来，跟在后面走。”

“这时那个声音又轻轻地对我说：‘你还犹豫什么？你一上了山，大路上就有人，前面就是村庄。他就会带着钱走掉了。要动手，现在就动手，还等什么。’”

“我弯下腰，假装把铺在雪橇上的干草整理一下，这时那把斧头好像自己跳到了我的手上。”

“他回过头来一看，就说：‘你想干什么？’”

“我抡起斧子向他砍去。他很机灵，马上从雪橇上跳下抓住我的两手。”

“他说，‘你这个坏蛋，想干什么？’”

“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任凭他摆布。他用一根宽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到雪橇上，一直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这样坐了牢，受到了审判。”

“村社替我说情，说我是个好人的，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东家也为我说好话，可是我没有钱请律师，”马卡尔说，“所以就被判4年刑。”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自己的同乡。他知道，他说出这些话是有生命危险的，万一别人知道这件事是他干的，一定会把他掐死。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个监狱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

政治犯被安排在两个小房间里，门外的过道与其余部分隔开。走过这部分过道时，聂赫留朵夫看到西蒙松穿着他的橡胶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蜷缩在火炉前，门被里面的热气吸引，不停地颤动着。

他没有站起来，只是从突出的眉毛下抬眼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并把手伸向他。

“我很高兴您来。我正有话要对您说。”他直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说道，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好的，什么事？”聂赫留朵夫问。

“等会儿跟您说。我现在正忙着。”西蒙松再次转向火炉，遵循他那套尽可能减少热量损失的原理给炉子生火。

聂赫留朵夫正打算走进第一扇门，卡秋莎却从另一扇门出来，弯着腰，用一条没有把的桦木笤帚把一大堆垃圾和尘土往火炉那边扫。

她穿着一件白色短上衣，裙摆掖在腰间，为了给头发挡灰，头上包着一条齐眉的方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直起身，脸色通红，神情活泼。她放开笤帚，在裙摆上擦了擦手，停在他面前。

“看来你是在打扫房间。”聂赫留朵夫边说边同她握手。

“是的，我的老本行。”她微笑着说道，“您没法儿想象这

儿有多脏。我们一直在打扫！那条方格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道。

“差不多了。”西蒙松回答道，投向她的眼神很特别，连聂赫留朵夫都注意到了。

“好吧，我会来拿的，再把斗篷拿过来烤烤……我们的人都在里面。”她指着第一扇门对聂赫留朵夫说道，自己却走进第二扇门。

聂赫留朵夫打开门，走进一个小房间，倚墙而钉的书架被当做床板，上面低低地放着一盏小铁皮灯，光线微弱。房间里很冷，弥漫着一股还没来得及落地的尘土的气味，以及潮气和烟草的味道。小小的铁皮灯只能照亮近前的地方，床铺都在阴影里，投射在墙上的黑影一直摇曳着。

除了两个被指派负责伙食的男犯离开去取开水和食物以外，绝大多数的政治犯都聚在这个小房间里。聂赫留朵夫的旧相识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在这里，比以前更瘦更黄了。

她睁着那双大而惊恐的眼睛，留着短短的头发，前额上暴出青筋。她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灰色的短上衣，面前摊着一张报纸，双手急急地卷着香烟。

艾米丽·兰采娃也在里面，她被聂赫留朵夫认为是政治犯里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她负责家务，即使在这种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打理出舒适的家庭氛围和魅力。她坐在灯旁，袖子高高卷起，用那双灵巧的、被晒黑却依然红润的手擦拭着大大小小的杯子，再把它们放在床架上摊开的布上。

兰采娃长得并不好看，脸上的表情却聪明而温和，一笑起来立刻显得愉快、活泼而迷人。现在她正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回俄罗斯了呢。”她说道。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在黑暗的角落里忙着照顾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小女孩，听她用甜甜的童音不停地说着孩子气的话。

“您来了可真好。”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对聂赫留朵夫说道，“看见卡秋莎了吗？我们这儿来了个新客人。”她指指小女孩。

克雷利佐夫也在这儿，在远远的角落里和别人挤在一起，穿着

毡靴，盘腿坐着，手臂插在外衣的袖子里，浑身发抖，用发着烧的眼神看着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正要向他走去，但是门的右边坐着一个戴着眼镜、长着微红卷发、穿着橡胶上衣的男子，正跟面带微笑的、漂亮的格拉别茨说着话。这是著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

聂赫留朵夫匆忙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之所以特别匆忙，是因为在所有政治犯中，他唯独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的蓝色眼睛透过眼镜闪着光，皱起眉看着聂赫留朵夫，并向他伸出一只细长的手。

“如何，旅途还愉快吗？”他带着明显的讽刺口气问道。

“是啊，有很多有趣的事。”聂赫留朵夫回答道，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讽刺，只是把它当做礼貌的问题，越过他向克雷利佐夫走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表面上显得毫不在意，但心里却远非如此，诺伏德伏罗夫的这些话显示出想要说或做一些惹人不开心的事的欲望，弄乱了聂赫留朵夫平和的心境，令他感到沮丧和难过。

“你还好吗？”他握住克雷利佐夫冰冷颤抖的手说道。

“挺好，只是暖和不起来，我都湿透了。”克雷利佐夫回答道，很快又把手缩回到大衣袖子里。“而且这里冷得要命。瞧那儿，窗户玻璃都破了。”他指着铁栅后面的破玻璃窗说道。

“您怎么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来？”

“他们一直不许我进来，那些当官的严得很。只有今天这个军官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和气的军官！”克雷利佐夫说。“您问一问玛莎，他今天早晨干过什么事。”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没有从她坐的地方站起来，讲了讲今天早晨从旅站动身的时候为那个小女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依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才成，”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用果断的声调说，同时迟疑而惊慌地看看这个人的脸，又看看那个人的脸。“弗拉基米尔提过抗议，可是那还不够。”

“还要提什么抗议？”克雷利佐夫说，烦恼地皱起眉头。显然，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的华而不实、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已惹

得他不痛快。

“您是来找卡秋莎吗？”他扭过脸对聂赫留朵夫说。“她老在干活，打扫。这个房间、我们男犯人的房间，她都打扫干净了，现在去打扫女犯人的房间了。可就是跳蚤没法打扫干净，死命地叮人。玛莎在那儿干什么？”他说着，用头指一下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所在的那个墙角。

“她在给她的养女梳头。”兰采娃回答道。

“她不会把那些虫子弄到我们身上吧？”克雷利佐夫问道。

“噢，不会的！我很小心。她现在是个干净的小姑娘了。你来带她吧！”玛丽娅对兰采娃说道，“我去帮玛丝洛娃，还要把他的方格毯给他拿来。”

兰采娃接过小女孩，把她放在自己的腿上，带着母亲的温柔把小女孩光着的胖手臂贴在自己胸口，还给了她一小块糖。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离开房间时，两个男犯人拎着开水和食物走了进来。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个头儿不高的瘦瘦的年轻人，穿一件吊面小皮袄，脚登高筒皮靴。他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腋下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很轻快地走了进来。

“哎呀，我们的公爵驾到啦，”他说过，把茶壶放到茶碗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

“我们买到些再好也没有的东西，”他说，脱掉皮袄，把它从人们的头顶上扔过去，丢在板床的角落里。

“马克尔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跳舞会了。啊，基里洛夫娜老是收拾得处处都干净漂亮，”他瞧着兰采娃含笑说道。“好，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整个外表、他的一行一动、他的声调和眼神都透露着蓬勃的朝气和愉快的气氛。

他身材不高，生得精瘦，灰白的瘦脸上隆起两块很高的颧骨，一对美丽的淡绿色眼睛相离很远，嘴唇薄薄的。他身上穿着旧棉大衣，皮靴外面套着雨靴。

他提着两只瓦罐和两个树皮篮。他把提来的东西都放在兰采娃面前。他见到聂赫留朵夫，就弯一下脖子对聂赫留朵夫点一下头，

所以尽管他在点头，他的眼睛却仍旧瞧着聂赫留朵夫。然后，他不乐意地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来同他握手，慢腾腾地从篮子里拿出食品来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出身平民。头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厂工人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马克尔是在已经到了中年，35岁的时候才参加革命活动的，纳巴托夫却从18岁起就参加了。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学校毕业，由于才能出众而进了中学，后来一直靠教家馆糊口，

读到毕业，获得了金质奖章，可是没有进大学，因为他还在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作出决定：既然他是从人民中间来的，就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去教育他那些被遗忘的弟兄。

他果然照这样做了：起初他在一个大村子里做文书员，然而不久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们朗读小册子，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

头一次，他在监狱里囚禁8个月，后来释放出来，暗中受到监视。他出狱以后，立刻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去，在那里当教员，依旧做他原来做过的那些事。他又被捕，这一次在监狱里囚禁14个月，在监狱里越发加强了他的信念。

第二次出狱以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儿逃走了。他又被捕，监禁了7个月，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拒绝向新沙皇宣誓，因而被判流放到雅库茨克区。

所以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的生活倒有一半是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遭遇丝毫也没有使他变得性情暴躁，甚至也没有减弱他的精力，反而使他的精力更加旺盛。

他是个好活动的人，胃口很好，总是做这做那，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他从来也不懊悔他做过的任何事情，也不去猜测遥远的未来，而是把全部智慧、才干、实际知识倾注在当前的生活当中。他出了监狱，总是按照他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努力工作，那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工人们。

一旦坐了牢，他也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工作，以便同外界保持联系，在当前条件下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团体把生活安排得最好。

他首先是以集体为重的人。他自己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一无所有也能够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为同志们的集体他却有很多要求，因而不论什么工作，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他都肯干，一干起来就不撒手，觉也顾不得睡，饭也顾不上吃。

他本来是农民，爱劳动，手脚灵便，会干活，他生来处处克制自己，不费什么力就能对人谦虚，不但能体贴别人的感情，也能照顾别人的意见。

他的老母亲至今还活着，是个不识字的、守寡的农妇，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总是帮助她，只要没被捕就常去探望她。他回到家里，极力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着她干活，仍旧同他往日的伙伴，农村的青年不断来往，跟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受了欺骗，应当从他们身受的骗局里解放出来。

他所以对世界怎样产生的问题不感兴趣，恰恰是因为他面前永远摆着人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也根本不去考虑。他在灵魂深处保持着一种坚定稳固的、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而且为一切种田人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任何东西也不会消灭，而是经常从一种形式变换为另一种形式。

粪肥变成麦粒，麦粒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一样，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

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永远精神饱满，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忍受种种导致死亡的痛苦，然而他不喜欢谈，也不善于谈这种事。他喜欢工作，老是忙于实际，而且推动他的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事务。

这批犯人当中，另一个来自人民的政治犯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从15岁起就做工，为了扑灭在他心里隐约出现的屈辱感觉而开始吸烟喝酒。

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屈辱的感觉，是在过基督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一棵由厂主太太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他的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每人一个苹果、一支只值一个戈比的小笛、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一个干无花果，可是厂主的儿女们得

到的却是玩具，依他看来像是仙女的赏赐，事后他听说那要值50卢布以上。

他20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到他的工厂里来做女工，发现孔德拉季耶夫有杰出的才能，就开始送给他书和小册子，同他谈话，对他说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和如何改进这种地位的方法。

等到他清楚地领会到有可能把他自己和别人从目前所处的被压迫地位当中解放出来，这种地位的不公平在他心目中就显得比以前越发残酷，越发可怕，他不但迫切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那些安排和维护这种残酷的不公平现象的人。

据别人对他解释说，知识能够实现这种可能，孔德拉季耶夫就热切地致力于求得知识。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怎样才能通过知识来实现，他不清楚，不过他相信知识既然能够向他指明他所处的地位不公平，那么知识也就能够纠正这种不公平。

此外，知识已经使他在自己心目中高于其他人了。因此他戒绝烟酒，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自从他担任仓库管理员以后，他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者教他读书，对他永不知足地吸收各种知识的惊人能力暗暗纳罕。两年之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而且涉猎了全部文学著作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者被捕，孔德拉季耶夫也同她一起被捕，因为在他的住处搜出了禁书。他先是囚禁在监牢里，后来被流放到在那里他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阅读更多的革命书籍，全都记在心里，越发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

流放期满以后，他领导一次工人大罢工，最后砸毁工厂，打死了经理。他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把女人看做一切必要的工作的障碍。不过他怜惜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压榨的实例。

根据同一种理由，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谈话，不握他的手，每逢聂赫留朵夫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伸过一只手去，让聂赫留朵夫握一下而已。

火炉已经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泡好，分别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而颜色发白。那些小面包圈、新鲜的细面粉面包、白面包、煮硬的鸡蛋、牛油、牛头、牛蹄都摆出来。大家就都凑到板床上当饭桌用的这块地方来，纷纷喝茶，吃东西，谈天。

兰采娃在箱子上坐着，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在她的四周围上来，只有克雷利佐夫不在，他已经脱掉淋湿的皮袄，裹上那条已经烤干的方格毛毯，躺在他的床位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大家今天一路上受了冻，淋了雨，到了这儿却发现又脏又乱，于是辛辛苦苦把这里收拾整齐以后，如今吃到可口的食物，喝下热茶，他们的心情就变得极其愉快欢畅了。

隔着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吵嚷、叫骂的声音，仿佛在提醒他们四周是什么环境似的，然而这倒反而加强了舒适的感觉。这些人好比生活在海洋当中的小岛上，感到暂时不再受到他们周围种种屈辱和苦难的困扰，因此处在情绪昂扬、精神振奋的状态里。

他们什么都谈，单单不谈他们的处境和等待着他们的前途。除此以外，如同青年男女之间，特别是像这批人似的被迫朝夕相处的时候所常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们相互之间正在发生协调的和不调的、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结合起来的爱情。

他们几乎都在恋爱。诺沃德沃罗夫钟情于容貌俊俏、面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这个格拉别茨是高等女校的年轻学生，很不善于思考，对革命问题十分冷淡。然而她受到时代的影响，牵连到某一事件当中，被判处流刑。

目前在旅途当中，由于诺沃德沃罗夫迷恋着她，这就使她得到了安慰，而且她自己也爱上他了。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是很容易动情的女人，却没有引起别人对她的爱情，可是她时而爱上纳巴托夫，时而爱上诺沃德沃罗夫，总指望对方也会回报她。克雷利佐夫对待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的态度有点近似恋爱。

他像男人爱女人那样地爱着她，不过他知道她对恋爱的态度，就巧妙地把他的感情掩藏在友情和感激的外衣底下，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怀着特别温柔的感情照料他。

纳巴托夫和兰采娃之间发生了颇为复杂的爱情关系。如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是十足贞洁的处女一样，兰采娃也是她丈夫的十足贞洁的妻子。

当初她刚16岁，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大学生兰采夫。她19岁那年，同他结了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

她的丈夫在大学读到四年级，卷进这个大学的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她正在学习的医学课程，同他一起出走，也做了革命者。

如果她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就不会爱他，而且既然不爱他，也就不会嫁给他。不过一旦她爱上她相信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而且同他结了婚，那她就自然而然，完全依照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目的了。

起初他把生活理解为学习，她就也这样理解生活。他做了革命者，她就也做了革命者，她能够很好地证明现行的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每个人的责任就在于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力求建立另外一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活结构，在那种生活结构当中个性可以自由地发展等。

她觉得她确实是在这样想，这样感觉，然而实际上她只是认为凡是她丈夫所想的都是真正的真理而已。她所追求的只有一点，就是她同她丈夫的灵魂完全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她同她丈夫告别，同她母亲领去的她的孩子告别，在她是难过的。不过她坚定而冷静地忍受了这种离别，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她的丈夫，为那个事业，而那个事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就在为那个事业服务。

她在思想上永远同她丈夫在一起，而且如同以前她没有爱过任何人一样，现在她除了爱她丈夫以外也不能够爱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忠诚以及他那纯洁的爱情，打动了她的心，使得她心情激动。

他是有道德的、坚强的男子，又是她丈夫的朋友，极力像对

待姐妹那样对待她，然而他对她的态度却流露出更多的东西，这使得他们两人暗暗惊慌，不过同时倒也给他们当前的艰苦生活增添了光彩。

因此，在这个小团体里，只有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和孔德拉季耶夫同恋爱完全不相干。

变 故

聂赫留朵夫照例总是等大家喝过茶、吃完晚饭，才跟玛丝洛娃单独说说话。现在他坐在克雷利佐夫的床边，跟他聊天，心里也抱着这样的打算。

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马卡尔求过他帮忙以及马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利佐夫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聂赫留朵夫的脸，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

“是啊，”他突然开口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跟他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人才跋山涉水，但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也不想了解他们。而他们呢，更糟糕，恨我们，把我们视为敌人。这太可怕了。”

“这没什么可怕的，”诺沃德沃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说话，这时也插话说。“群众向来是崇拜权力的，”他用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权时，他们就崇拜政府，痛恨我们，如果将来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

这时从隔壁传来一阵谩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叫喊声。不知是谁挨了打，有人在叫：“救命啊！”

“瞧瞧他们这群野兽！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们交朋友？”诺沃德沃罗夫悠悠然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刚才聂赫留朵夫还讲起这么一种行为，”克雷利佐夫生气地说，然后讲起马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一个同乡的事。“这可不是什么野兽干得出来的，而是英雄

行为。”

“你也太多愁善感了！”诺沃德沃罗夫讥诮地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情绪以及他们行为的动机。你从中看出了心肠厚道，然而说不定这正是因为他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呢？”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突然怒不可遏地对他说。

“人家冒着惨死的危险，那怎么能说根本没有呢？”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我认为，”诺沃德沃罗夫说，“如果我们想做我们的事业，那么首要的条件，”孔德拉季耶夫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仔细听他老师讲话。

“就是不能凭空幻想，而要正视现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而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只要他们像现在这样因循苟且，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像发表演讲似地说，“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还没有为他们创造好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的帮助，那完全是一种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利佐夫涨红脸，开口说。“我们说我们反对跋扈和专制，可是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专制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专制，”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回答说。“我无非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的道路，并且能够指出那条道路而已。”

“可是你为什么相信你所指出的道路就正确呢？难道这不就是以前产生过宗教裁判和大革命的残杀的那种专制吗？他们也是根据科学知道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们犯了错误并不能证明我也犯了错误。再者，在思想家的空想和从实际出发的经济学的论据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诺沃德沃罗夫的声音响彻整个拘押室，只有他一个人在说，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老是争论，”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在他沉静了一会儿以后说道。

“那么您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说。

“我认为阿纳托利说的对，不应当把我们的见解强加给人民。”

“哦，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含笑问道，等着她回答，却暗自担心，生怕她会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她说，涨得满脸通红，“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的对，卡秋莎，说的对，”纳巴托夫叫道，“人民受尽了欺负。应当不叫他们受欺负才对。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关于革命任务的奇怪概念，”诺沃德沃罗夫说，沉默下来，气愤地开始吸纸烟。

“我没法跟他谈话，”克雷利佐夫压低喉咙说，沉默下来。

“最好还是不谈，”聂赫留朵夫说。

尽管诺沃德沃罗夫受到所有革命者很大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被人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把他归在这样一类革命者里面：他们的道德品质低于一般水平，而且低得多。这个人的智力大，不过他对自己的看法更大得没法比，早已超过了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同西蒙松相比，具有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西蒙松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主要具有男性的气质，他们的行动是由思想活动所产生，为思想活动所决定的。

可是诺沃德沃罗夫属于另外一类人，那类人主要具有女性的气质，他们的思想活动一部分趋向于达到由感情所确定的目标，一部分致力于证明由感情所促成的行动是对的。

诺沃德沃罗夫的全部革命活动，尽管他善于用各种极其动听的理由解释得头头是道，不过依聂赫留朵夫看来，却仅仅是以虚荣心为基础，无非是想出人头地，高居于人们之上罢了。

起初，由于他有吸收别人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别人的思想的能力，他在求学期间，在学生和教员当中，在他那种能力深受重视的地方，果然做到了出人头地，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可是等他领到毕业文凭，不再求学，他的出人头地的地位就此结束以后，据不喜欢诺沃德沃罗夫的克雷利佐夫告诉聂赫留朵夫说，他为了在新的领域取得出人头地的地位而突然完全改变了他的

观点，从渐进主义的自由派分子一变而为红色的民意党人。

由于他的性格缺乏那种足以使人产生怀疑和踌躇的道德品质和审美品质，他很快就在革命者圈子里占据了党的领导人地位，这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一旦选定一个方向，就绝不怀疑，绝不踌躇，所以他相信绝不会犯错误。

依他看来，一切都似乎异常简单清楚，毫无疑义。正是由于他的见解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一切事情也果然很简单，很清楚，据他说来，人只要有合乎逻辑的头脑就行。

他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非常强烈，只能使人避之犹恐不及，或者对他唯命是从。他是在很年轻的人们当中进行活动的，他们往往把他那种无限的自以为是的态度看做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结果大多数人都服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圈子里获得很大的成功。

他的事业就是准备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政权，召开大会。大会上要提出一个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完全相信这个纲领会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这个纲领非执行不可。

他的同志们因为他勇敢果断而尊重他，可是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他对待一切杰出的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如果可能的话，很想按照老公猴对小猴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他恨不得剥夺别人的一切智慧，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自己的才能。他只对那些崇拜他的人才好意相待。

目前，在旅途上，他对待接受他的宣传的工人孔德拉季耶夫，对待那两个都钟情于他的女人，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和容貌俊俏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

他在原则上虽然也赞成应该解决妇女问题，然而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愚蠢，微不足道，只有他常常自作多情地爱上的那些女人才是例外，例如现在他就在这样爱着格拉别茨。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认为她们是与众不同的女人，只有他才能够发现她们的优点。

两性关系的问题，依他看来，也像一切问题那样很简单，很清楚，只要承认自由恋爱，就算彻底解决了。

他有一个假妻子，还有一个真妻子，不过他已经同真妻子脱离关系，相信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正打算跟格拉别茨缔

结新的自由婚姻。

他鄙视聂赫留朵夫，因为按他的说法，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聂赫留朵夫竟然敢于考虑现行制度的缺陷，考虑纠正这种制度的方法，而且他的想法非但不是跟他诺沃德沃罗夫的想法一字不差，甚至他聂赫留朵夫居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的想法，也就是蠢人的想法。

聂赫留朵夫知道诺沃德沃罗夫对他抱着这样的态度，使他感到痛心的是尽管他在这次旅行期间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心情，可是对待诺沃德沃罗夫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如何也没法克制他对这个人的极其强烈的反感。

隔壁牢房里响起押解人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一会儿，班长就带着两名士兵走了进来。这是点名了。班长用手指头点着每一个人，把人数数了数。

他点到聂赫留朵夫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公爵，现在点名以后就不能留在这儿了。应该走了。”

聂赫留朵夫明白这话的意思，便走到他跟前，把准备好的3卢布钞票塞到他手里。

“哦，拿您有什么办法呀！那就再坐一会儿吧！”

班长正要往外走，另外一位军士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留着稀稀的下巴胡、打伤了一只眼睛的男犯。

“我是来看小孩子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啦，”忽然响起清脆的童音，于是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兰采娃身后露了出来。兰采娃和谢基尼娜、玛丝洛娃一起，正在用兰采娃拿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衣服。

“是我，好孩子，是我，”布佐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帕夫洛夫娜很难受地看着布佐夫金那被打伤的脸说，“就让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小姐给我做新褂褂儿呢，”小女孩指着兰采娃手里的针线活儿，对父亲说。“多好呀，多漂漂……亮呀，”她咿咿呀呀地说。

“愿意在我们这儿睡觉吗？”兰采娃抚摩着小女孩说。

“愿意。还有爸爸。”

兰采娃笑了起来。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就让她留下吧，”她对女孩的爸爸说。

“好吧，就把她留下，”站在门口的班长说过这话，就跟另一个军士走了出去。

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佐夫金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怎么样，大哥，你们那儿的卡尔玛诺夫想跟人掉包，是真的吗？”

布佐夫金那和颜悦色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他的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膜。

“没有听说。恐怕不会吧，”他说过这话，似乎还没有收起眼睛上的薄膜，又说：“好吧，阿克秀莎，你就跟小姐们享享福吧，”说完就急忙走出去了。

“他全知道，确实是掉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怎么办呢？”

“到了城里，我就告诉当官的。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识，”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没有做声，显然是怕再引起争论。

西蒙松本来用手抱着后脑勺，躺在角落里的床铺上，一直没有说话，这时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一些人，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您现在可以听我说说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就要跟着他往外走。

玛丝洛娃朝着站起来的聂赫留朵夫看了一眼，一遇到他的目光，她就红了脸，并且好像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气摇了摇头。

“我要跟您谈谈这样一件事，”等他们一起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嗡嗡的说话声和一阵阵的吵嚷声特别响。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显然丝毫不在意。“我知道您和卡秋莎的关系，”他继续说下去，一面用他那和善的眼睛留神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所以我认为必须……”

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门口有两个声音一齐叫起来，在为什么事争吵。

“对你说嘛，你这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掐死你，你这浑蛋！”另一个沙哑的声音嚷道。

这时候帕夫洛夫娜来到过道里。

“这儿怎么能谈话呀，”她说，“你们上这儿来吧，这儿就薇拉一个人。”于是她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旁边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显然这原来是单人牢房，现在是划给女政治犯住的。薇拉连头蒙着躺在床铺上。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这就走！”帕夫洛夫娜说。

“别走，你留下好啦，”西蒙松说，“我没有秘密要瞒着什么人，尤其不想瞒着你。”

“哦，那好吧，”帕夫洛夫娜说过，整个身子就像小孩子一样扭来扭去，扭呀扭地往床铺里边坐了坐，就准备好听他们讲话，一面用她那美丽的鼓鼓的眼睛朝远处望着。

“我要谈的是，”西蒙松又重复一遍，“我知道您和卡秋莎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必须和您说说我和她的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聂赫留朵夫问道，同时心中不觉赞赏起西蒙松跟他说话的这种坦率和真诚态度。

“就是我想跟卡秋莎结婚……”

“真稀奇呀！”帕夫洛夫娜凝神看着西蒙松说。

“我决定向她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又能怎样呢？这事得由她自己作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事不经过您同意，她也不能决定。”

“为什么？”

“因为您跟她的关系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她不能作任何选择。”

“从我这方面来说，问题已经明确解决了。我想做的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此外，就是想减轻她的痛苦，但我怎么也不想约束她。”

“是的，可是她不愿意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不是什么牺牲。”

“而且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不会改变的。”

“哦，那么跟我还有什么好谈的呀？”聂赫留朵夫说。

“在她来说，这事也需要得到您的认可。”

“我怎么能认可我不必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有一点我是可以说的，那就是：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她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西蒙松沉思起来，有一会儿没有说话。

“好吧，我就这样对她说。您不要以为我是迷上她了，”他继续说。“我爱她，是因为她是一个难得见的极好的人，受尽了苦难。我对她毫无所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

聂赫留朵夫听到西蒙松的声音都打起哆嗦，非常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她既然不愿意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如果她同意了，那我就要求把我流放到她的监禁地点去。4年不算太长。我愿意待在她身边，也许可以减轻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我又能说什么呢？”聂赫留朵夫说。“她有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这正是我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是想知道：既然您爱她，希望她幸福，那么，您认为她跟我结婚是幸福吗？”

“肯定是的，”聂赫留朵夫断然说。

“这事全看她怎样了，我只是要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松一口气，”西蒙松一面说，一面带着一种孩子般的亲热神情望着聂赫留朵夫，这个一向脸色阴沉的人会有这样的表情，那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西蒙松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把脸凑到他脸前，羞涩地笑了笑，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告诉她，”他说过，便走了出去。

“哎，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说。“他在谈恋爱，十足的恋爱嘛！这可是再也料想不到，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居然用这种最愚蠢、最孩子气的方式谈恋爱。这真奇怪，而且我要说句实话，这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了她的话。

“不过，卡秋莎呢？您认为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停住嘴，显然想尽量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的过去是那个样子，可是按天性来说，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再者她的感情也那么细腻，她爱您，而且爱得很正，只要能为您做一件哪怕是消极的好事，使得您不致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幸福。对她来说，跟您结婚是可怕的堕落，比以往的一切堕落都要坏，因此她绝不会同意这件事。不过另一方面，您老是在她身边出现，这又惹得她心神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该走掉吗？”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脸上现出她那可爱而天真的笑容。

“对了，一部分。”

“可是，人怎么能走掉一部分呢？”

“这是我在胡说了。不过关于她，我想告诉您，大概她已经看出他那种荒唐而热烈的爱情来了，她又是感到得意，又是害怕这种爱情。”

“您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是不在行的，不过我觉得，从他那方面来说，他那种感情虽然加上了伪装，可是仍旧不外乎最普通的男性感情。他说这种爱情增强他的精力，又说这种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不过我知道，即使这种爱情与众不同，但它的基础必然还是肮脏的，就像诺沃德沃罗夫和柳博奇卡之间的爱情一样。”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离开本题，谈起她心爱的题目来了。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道。

“我想您应该对她说明一下。把一切事情讲清楚总归是好的。您跟她谈谈吧，我去叫她来。好吗？”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玛丽娅·帕夫洛夫娜走出去了。

这时候小小的牢房里只剩下聂赫留朵夫一个人，他听着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偶尔夹杂着呻吟声，又听着隔两个门口从刑事犯们那边不住传来嘈杂的说话声，于是一种古怪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

西蒙松对他所说的那番话，使他解脱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而这

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总是使他感到沉重而古怪的。可是现在，他的心情非但有点不愉快，甚至痛苦。

这种心情还含有这样的一种内容，那就是西蒙松的求婚破坏了他的行为的超群出众的性质，使得他所承担的牺牲的价值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眼睛里降低了。

如果这个人，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本来又跟她毫无瓜葛，尚且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她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牺牲也就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

或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嫉妒心。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她对她的爱，因此不能够承认她能爱上另外一个人了。再者，这样一来就推翻了他原先所定的计划，他本来是决定在她服刑期间一直生活在她身边，假如嫁给西蒙松，他留在此地就变得不必要，那他就得重新生活计划。

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心情分析清楚，忽然房门开了，刑事那边强烈的嘈杂声就猛然涌进来，紧跟着卡秋莎走进房来。

她迈着很快的步子走到他面前。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打发我到这儿来，”她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站住，说。

“对了，我有话要跟您说。不过您先坐下。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刚才跟我谈过话。”

她坐下来，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显得很镇静。可是聂赫留朵夫刚一说出西蒙松的名字，她就涨得满脸通红。

“他对您都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说，他想跟您结婚。”

她的脸忽然皱起来，显出痛苦的样子。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光是低下眼睛。

“他要求我同意他的想法，或者提出我的意见。我说这全得由您做主，应当由您做出决定。”

“哎，这都是怎么回事啊？这都是为了什么呀？”她用一种奇怪的斜睨的眼光瞧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那种眼光素来特别强烈地打动他的心。他们默默地瞧着彼此的眼睛，过了几秒钟。这种四目相视的目光向双方说出了许多的话。

“您必须做出决定，”聂赫留朵夫再说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她说。“一切事情早就决定了。”

“不是的，您应当决定要不要接受弗拉基米尔·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妻子？我何苦再把弗拉基米尔·西蒙松也毁掉呢？”她皱起眉头说。

“哦，不过要是您得到了赦免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的事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站起来，走出房外去了。

聂赫留朵夫跟着卡秋莎回到男犯人的牢房，这时候那边所有的人人都心情激动。纳巴托夫原是一个各处都去、同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对一切事都注意观察的人，他刚刚带回一个震动大家的消息。

那个消息是这样：他在一堵墙上发现贴着一张字条，是由一个被判决做苦工的革命者彼特林写的。大家本来认为彼特林早已到达卡拉河流域，现在才突然发现他不久以前刚刚单独同刑事犯们一起路过此地。

字条上写道：

我独自一人同刑事犯们一起赶路。本来涅维罗夫跟我在一起，可是他在喀山的疯人院悬梁自尽了。我身体健康，精神旺盛，希望一切顺利。

8月17日

大家正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可是克雷利佐夫却带着聚精会神的样子沉默不语，他那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呆望着前面出神。

“我的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先前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时候就神智失常，常常见到幽灵，”兰采娃说。

“对了，他是诗人，是空想家。这样的人总是经不住单身监禁的，”诺沃德沃罗夫说。“至于我，在遭到单身监禁的时候，就不容许我的想象力活动，而是极有条理地支配我的时间。因为这个缘故，我总能很好地熬过去。”

“这有什么难熬的？每逢我关进监狱，我倒往往挺高兴呢，”纳巴托夫用活泼的声调说，有意驱散大家的阴郁心情。

“平时，人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被捕，又怕牵连别人，还怕毁掉这个事业，可是一旦关进监狱，那就什么责任都了结，倒可以休息一下了。你就乖乖地坐着，抽几口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玛丽娅·帕夫洛夫娜不安地看着克雷利佐夫那张忽然神色大变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空想家？”克雷利佐夫忽然说，上气不接下气，倒好像他刚才嚷叫或者歌唱了很久似的。

“涅维罗夫是这样一个人，按我们的看门人的说法，这样的人是天下少有的，是啊，他是个通体像水晶一样的人，一眼就能把他看到底。”

“是啊，他不要说是撒谎，就连作假也不会。他不但皮肤薄，简直就像是周身的皮肤都剥掉了，所有的神经都露在外面。是啊，他的性格复杂而丰富，并不是那种浅薄的人，哎，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争论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他气愤地皱起眉头说，“究竟应该先教育人民，然后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应该先改变生活方式？其次，我们又争论究竟应该怎样斗争才对：应该依靠和平的宣传呢，还是依靠恐怖手段？”

“是啊，我们争论不休。可是他们倒不争论，他们是懂得他们该办的事的。几十人以至几百人，而且都是那么好的人，死掉了或者没有死掉，他们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刚好相反，他们恰恰需要优秀的人死掉。”

“是啊，赫尔岑说过，十二月党人遭到取缔的时候，社会的一般水平就下降了。怎么能不下降！后来，连赫尔岑本人和他那一辈人也遭到了取缔。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一类人了……”

“这一类人是消灭不完的，”纳巴托夫精神饱满地说。“总会留下人来传种的。”

“不然。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一个也留不下来，”克雷利佐夫说，不容许人家打断他的话。“给我一支烟。”

“不过要知道，安纳托利，抽烟对你是不好的，”玛丽娅·帕

夫洛夫娜说，“请你别抽烟了。”

“哎，别管我，”他生气地说，点上一支烟，吸起来，可是立刻开始咳嗽，难受得仿佛要吐出来。他唾了一口吐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应该光发议论，而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消灭他们。对了。”

“然而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凡是能够干出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来的人，就算不得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是啊，就应当坐着飞艇上天，往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似的统统消灭光，是啊。因为……”

他正要讲下去，可是忽然涨得满脸通红，咳得越发厉害，嘴里吐出了鲜血。

纳巴托夫跑出房外去取雪。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喝，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惨白而精瘦的手推开她，呼吸困难而急促。等到湿雪和凉水使得他稍稍镇定下来，人们服侍他睡下，聂赫留朵夫就向大家告辞，同一个早已来找他、等了很久的军士一起走出去。

看到这种场景，聂赫留朵夫会思考些什么呢？这时候刑事犯已经安静下来，大多睡熟了。

尽管那些人在牢房里有的躺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底下，有的躺在走路的通道上，然而牢房里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人，有一部分人索性睡在房外过道的地板上，把背包垫在头底下，身上盖着潮湿的大衣。

从牢房的门里，从房外的过道上，传来鼾声、呻吟声、梦呓声。到处都可以看见一堆堆人的身体，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上面盖着大衣。只有刑事犯的单人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觉，在墙角上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不过他们看见有士兵走过，就把蜡烛头吹熄了。

另外，在牢房外的过道上，灯底下，有一个老人也没有睡，光着身子坐在那儿，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们的住处那种含有病菌的空气，同此地弥漫着的臭烘烘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空气相比，反而好像干净得多。

那盏冒着烟的灯看起来像是从迷雾里射出亮光来，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同时也必须思考他的未来。

为了穿过这条过道而又不致让脚踩着或者绊着睡熟的人，他就得预先看清前面可以下脚的空地方，把一只脚放下去，然后再给另一只脚找地方。

有3个人显然就连在过道上也找不到空地方，索性在前堂里一个臭烘烘的、从裂缝里渗出粪浆来的便桶旁边睡下了。其中，有一个是痴呆的老人，聂赫留朵夫常常在旅途上见到他。另一个是10来岁的男孩，躺在两个男犯人中间，把头枕在一个男犯人的腿上，一只手托着脸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外，停住脚，挺起胸脯，张开整个肺部，久久地用力呼吸着凛冽的空气。

醒 悟

天空晴朗，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结了冰、只有少数几处还有烂泥的道路回到客店，聂赫留朵夫脱掉衣服，在漆布面子的长沙发上铺开一条方格毛毯，放好他的皮枕头，躺下来，在脑子里把他一天的见闻重温了一遍。

尽管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意义重大，但他没有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况且前途很难预料，因此他索性不去想它。

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喘气，在从便桶里渗出的臭烘烘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把头枕在犯人腿上的那幅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始终不曾离开。

等聂赫留朵夫醒来，所有的马车早就上路了。老板娘喝足了茶，一面用手绢擦着汗津津的粗脖子，走进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写道，克雷利佐夫这次发病比

大家原来想的更要严重。

“我们曾经想让他留下并且我们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准许，所以我们只好带他走，可是又非常害怕。请您到城里设法疏通一下，如果能让他留下来，最好也能让我们留下人陪他。如果因为这事需要我嫁给他，那我自然也愿意。”

聂赫留朵夫打发茶房到驿站去叫马车；就吩咐车夫尽可能赶得快些，希望能赶上那批犯人。过了一处牧场的大门没有多远，他的马车就真的赶上了拉着行李和病号在上了冻、开始打滑的路上“隆隆”行进的大车。

帕夫洛夫娜挨着他坐在赶车的座位上。聂赫留朵夫让马车在克雷利佐夫的大车旁边停下之后，就朝他走去。

一个醉醺醺的押解兵朝聂赫留朵夫摇了摇手，可是聂赫留朵夫没有理他，一直走到大车跟前，抓住大车栏杆，跟大车一起往前走。克雷利佐夫穿着皮袄，戴着羊羔皮帽，嘴上裹着手绢，模样显得更加消瘦和苍白了。

他的一双清秀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亮。他的身子随着大车的颠簸轻轻晃动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聂赫留朵夫，问他身体感觉怎样，他只是把眼睛闭上，生气地摇摇头。显然，大车颠得他一点精神也没有了。

谢基尼娜坐在大车的那一边。她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和聂赫留朵夫对看了一眼，表示她对克雷利佐夫的状况的担心，接着就用快活的语调说起话来。

“看样子，押解官觉得不好意思了，”她大声嚷起来，好让聂赫留朵夫在“隆隆”地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把布佐夫金的手铐卸掉了。他现在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走，还有薇拉接替了我。”

克雷利佐夫指着帕夫洛夫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接着他皱起眉头，显然是憋着咳嗽，摇了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

于是克雷利佐夫动了动手绢，露出嘴来，小声说：“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并且和帕夫洛夫娜对看了

一眼。

“哦，3个天体的问题怎样啦？”克雷利佐夫又小声说，并且很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帕夫洛夫娜就给他解释说，这是指一道有名的数学问题，是确定日、月、地球3个天体关系的，克雷利佐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利佐夫点点头，表示帕夫洛夫娜把他开的玩笑解释得很对。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解决，”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吗？您肯办吗？”帕夫洛夫娜问道。

“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过，发现克雷利佐夫脸上有不以为然的神气，就朝自己的马车走去，爬上车，坐到凹下去的座垫上，因为马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得厉害，他又用双手抓住两边的栏杆，就让马车往前赶，要超越拉成一俄里长、身穿灰色囚服或小皮袄、戴脚镣和双手手铐的囚犯队伍。

聂赫留朵夫在道路的那一边认出了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跟凉鞋一样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他和她们并排走着，很起劲地在说着什么事。

一看到聂赫留朵夫，两个女的都朝他点了点头，西蒙松却很隆重地举起帽子。聂赫留朵夫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进入一个城郊的大村子。村里的街道上有很多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的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异族人。男男女女，有喝了酒的，有没喝酒的，在饭铺、酒馆、小店、货车跟前挤来挤去，熙熙攘攘。可以感觉到城市不远了。

马车夫朝右边拉套的马打了一鞭，勒了勒缰绳，而且为了让缰绳往右边收，在座位上把身子偏了偏，显然是想显显本事，赶着马车在大街上飞跑起来，一直跑到河边，都没有放慢速度。过这条河是要搭渡船的。渡船正在这条湍急的河的中心，是从那边过来的。

这边有20来辆大车等着渡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多久。渡船逆流而上，朝上游的远处划去，受到急流的冲击力，很快就靠在码头的木板上。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望着广阔而湍急的河水。有两个

画面在他头脑里不断地交替出现：一个是满腔激愤的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他的头被大车颠得颤摇不定；一个是卡秋莎的身影，她步伐矫健地同西蒙松一起沿着路边不停地走。

前一个印象，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而又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是沉重而凄凉的。

后一个印象，生气蓬勃的卡秋莎得到西蒙松这样的人的爱情，现在已经走上一条稳固可靠的正路，应当是一件喜事，可是聂赫留朵夫也觉得沉重，而且没法克服这种沉重的感觉。

渡船在对岸停下，用缆索系住。聂赫留朵夫取出钱夹来，拿出一元钱给老人。老人不肯收。

“这种东西我不要。我要面包，”老人说着，动手把原先卸下来的背包放到肩上。这时候，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经套上马，上了岸。这座城市也和别的城市一样，一样的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屋顶，一样的一座大教堂，一样的小铺，大街上一家家商店，连警察也一模一样。

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第一次重又置身于他生活惯的较清洁舒适的环境里。虽然聂赫留朵夫下榻的房间算不上十分讲究，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羁押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惬意。

住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身上的虱子，自从他光顾羁押站以后，他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放好行李，立刻坐上马车到澡堂去。洗过澡，换上城里人的装束：浆过的衬衫、压出褶子的长裤、礼服和大衣，然后就去找当地长官。

将军身体不适，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

过了一会儿，听差出来，带来满意的答复：“将军请您进去。”

将军面孔浮肿，生着一只蒜头鼻子，额头上有几个鼓包，秃顶，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容易上火的人。他身穿一件鞞鞞式绸缎睡袍，一只手拿着一支香烟，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坐着喝茶。

“您好，先生！恕我穿着睡袍见客，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睡袍裹住有厚厚肉褶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好，不常出

门。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跟随一批犯人到这儿的，其中有一个人和我关系很密切。我这次登门拜访，一是为了我这个朋友，二是为了另一件事想求阁下。”

将军深深地吸了口烟，喝了口茶，然后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缸上摁灭，用一双浮肿的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仔细听着。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刑，为了她的事，已经告了御状。

“那么，现在您想怎么样呢？”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已经答应我，有关这个女人的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并且直接寄到这儿……”

将军仍然盯着聂赫留朵夫看，伸出指头又粗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吐着烟，声音特别响亮地咳了几声，继续听聂赫留朵夫说下去。

“所以，我想求您，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对那张状子的批复之前，暂时把这个女人留在这里。”

这时，一个身穿军服的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床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再送一点茶来。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回过头来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请求，”聂赫留朵夫继续说，“这件事涉及到一个政治犯，他也在这一批犯人中间。”

“原来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头说。

“他身染重病，危在旦夕，必须把他留在这里的医院里，有一个女政治犯自愿留下来照顾他。”

“她是不是他的亲属？”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打算嫁给他。”

将军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聂赫留朵夫，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他想用这种目光使对方感到窘迫。他一个劲儿地抽着烟。

他等聂赫留朵夫把话说完，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很快地用手指蘸蘸唾沫，一页页翻起来，找到有关婚姻的条款，读了一遍。

“她判了什么刑？”

“服苦役。”

“结婚并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不过……”

“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婚，她也必须服满刑期。我想提一个问题：谁判的刑重，是他，还是她？”

“他们俩判的都是苦役。”

“那倒是对上号了，”将军笑着说。“他受什么罪，她也跟着受什么罪。他因病可以留下，”他继续说，“我们当然会设法减轻他的病痛。不过她，即使同他结婚，也不能留在这里……”

“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进来报告说。

将军点了点头，继续说：“不过，让我再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里。”

聂赫留朵夫写下了他们的姓名。

“这件事我办不到，”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一个病人见面，就说。

“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而且您有钱。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通。有人对我说，必须根除贿赂。可是，大家都在贪污受贿，怎么能根除得了？官越小，钱就拿得越多。是啊，他在5000俄里以外受贿，叫人怎么查呢？他们在那里是土皇帝，就像我在这儿一样，”他笑了起来。

“您一定和政治犯见过面了，是不是您给了钱，他们才放您进去的？”他笑着说，“是不是这样？”

“对，确实如此。”

于是，将军开始问这问那，说东道西，显然想借此机会听听新闻，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不凡和人道主义精神。

“顺便问一句，您在哪里下榻？”将军一面送走聂赫留朵夫，一面问道，“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可糟得很。您17时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您会说英语吧？”

“是的，我会。”

“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狱情况。喏，今天他要到我们这

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17时开饭，我妻子要求严守时间。关于怎样处理那个女人的问题，还有那个病人，我到时候给您个答复。或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也说不定。”

聂赫留朵夫辞别了将军，感到心情特别振奋，浑身都特有劲，便坐上马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是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那儿有一张斜面办公桌，几名办事员坐在后面，把邮件分发给拥挤的人群。有一个办事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他面前，不停地上面打邮戳。

办事员们没有让聂赫留朵夫等多久，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其中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欧洲信使》。

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到一条长木凳那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取一件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挨着他坐下，翻阅收到的信。

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套着讲究的信封，上面还用鲜红的火漆盖了一个字迹清楚的印。他拆开信封，看到是谢列宁写的信，另外还附着一份公文，顿时感到血涌上脸孔，心脏也收紧了。

这就是关于卡秋莎的案件的批复。这会是个怎样的批复呢？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遍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迹有力而潦草的信，不由得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原来这批复是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所以他见到这场面特别愉快。

谢列宁写道：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上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关于玛丝洛娃的案子，你所说的都是对的。我仔细审查了这个案子看出她遭到了令人愤慨的冤屈。

这件事只能由你递过诉状的上告委员会来补救。我就设法在那边协助他们对这个案子作出裁判，现在随信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根据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告诉我的通信地址寄上。

这份公文的原本已经送往她当初在受审期间的监禁地

点，大概会立刻转到西伯利亚总署去。我赶紧把这个愉快的消息通知你。友好地握你的手！

你的谢列宁

公文的内容如下：

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命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卡捷琳娜·玛丝洛娃：

皇帝陛下业已披阅玛丝洛娃御状，特体恤下情，恩准所请，将该人苦役刑改为流刑，在西伯利亚较近之处执行。

这个消息令人高兴，而且意义重大：凡是聂赫留朵夫为卡秋莎以至为他自己所能希望做到的事情，如今果然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这种变化，就给他和她的关系造成了新的复杂情况。

这以前她是苦役犯，他要求同她结婚，就无异于一句空话，仅仅在改变她的处境方面有意义而已。

现在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妨碍他们共同生活了。可是聂赫留朵夫没有为这件事做好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呢？她昨天所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假定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他怎么也理不清这些思想，现在就索性不去想它。

“这一切以后都会弄清楚，”他暗想，“现在要办的是赶快见到她，把这个喜讯告诉她，让她释放出来。”

他认为，只要有了他手里拿着的这份公文的副本，就足以做到这件事。于是他从邮局的办公室走出来，吩咐马车夫把他送到监狱去。

此地的狱长是一个身量很高而又很胖的人，气度威严，留着唇髭和一直弯到嘴角上的络腮胡子。他很严厉地接待聂赫留朵夫，直率地声明说：“不经长官批准，他不能放外人进去探监。”

聂赫留朵夫讲起就连在京城他也常常得到许可进入监狱，狱长

就回答说：“这很可能，然而我不容许这种事。”

他讲这话的口气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京城的老爷们，自以为能够唬住我们，弄得我们惊慌失措，然而我们虽然是在西伯利亚东部，也还是懂得奉公守法，而且还能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呢！

连皇帝陛下的办公厅发下的公文的副本也没有对监狱长起什么作用。他断然拒绝把聂赫留朵夫放进监狱去。聂赫留朵夫本来天真地以为他一拿出那份公文的副本，玛丝洛娃就能当场释放，不料狱长只是鄙夷地微微一笑，声明说，要释放任何人都得有他的直接上司的命令才行。

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会通知玛丝洛娃说她的减刑公文已经发下来，而且他一旦接到上司的指令，就会立刻释放她，不会多留难她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利佐夫的健康状况，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他甚至不能讲出这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于是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坐上马车，回旅馆去了。

尽管在监狱那边受到挫折，聂赫留朵夫却仍然怀着原先那种生气蓬勃、兴奋昂扬的心情，坐着马车来到省长办公厅，查问一下他们那边是否已经收到玛丝洛娃的减刑公文。

那份公文还没有寄到。因此聂赫留朵夫就回到旅馆，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刻匆匆地写信，把这件事通知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一下怀表，已经是赴将军宴会的时候了。

将军家里的宴会铺排得极尽奢华，合乎阔人和大官们的生活格局。这种奢华的排场原是聂赫留朵夫习以为常的，不过长期以来他不但被剥夺了这种奢华的享受，甚至被剥夺了最起码的舒适条件以后，他就觉得这样的宴会特别称心了。

女主人是彼得堡老派的贵夫人，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说得很流利，俄语倒说得很别扭。她的身子总是保持笔挺的姿势，而且不论用手做什么动作，胳膊肘都不离开腰部。

她对待丈夫表现出一种文静而带点忧郁的恭顺态度，对待客人异常亲切，尽管亲切的程度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做自己人，对他表现出一种特别微妙的、使人不易觉察的奉承态度，这就使聂赫留朵夫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之处，因而感到沾沾自喜。

在筵席上就座的，除了将军的女儿、她的丈夫和副官等家里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远城市来的省长。这些人都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可亲可爱。

所有的人不仅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和热诚，而且显然因为见到他这个新相识和风雅的人感到很高兴。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来到筵席上，见到聂赫留朵夫，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打了个招呼，马上就请客人们吃小菜和喝酒。

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有何贵干，聂赫留朵夫就说到邮局去过，已经知道上午谈过的那个女人得到减刑，现在就再一次要求将军准许探监。

将军显然不满意在吃饭时谈公事，皱起眉头，什么也没有说。

“您来点白酒吧？”他用法语对那个走过来的英国人说。英国人把一杯酒喝下，就说了说他今天参观过一个大教堂和一家工厂，可是还希望参观一所大的监狱。

“那就太好了，”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给他们开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想在什么时候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看最好在晚上去，”英国人说，“晚上所有的人都在狱里，事先没有准备，一切是怎样就怎样。”

“啊，他是想好好地看看所有美妙之处吧？那就让他看吧！我写过呈文，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那就让他们从外国报纸上了解吧，”将军说过，便走到餐桌前，女主人正在餐桌旁指点客人就座。

筵席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一会儿谈印度，是英国人谈起的，一会儿谈远征东京，将军对此事严加抨击，一会儿谈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风气。

聂赫留朵夫吃了好饭，喝了美酒，这会儿坐在柔软的安乐椅上喝着咖啡，置身在热诚的、有教养的人们当中，心里感到越来越高兴了。

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要求，跟前任司长一起弹起他们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心中出现了一种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自我陶醉感，就好像他现在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

么好的人。

聂赫留朵夫向女主人道谢，说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快乐，道过谢就要告辞了，这时将军的女儿带着毫不犹豫的神气走到他面前，红着脸说：“您刚才问到我的两个孩子；您想看看他们吗？”

“她以为人人都有兴趣看她的孩子呢，”女主人见女儿冒失得可爱，就笑着说，“公爵才不感兴趣哩！”

“恰恰相反，我非常、非常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溢于言表的幸福的母爱所感动，就说，“请您带我去看看。”

来到第三个房间，这房间高高的，糊着雪白的墙纸，点着一盏不大的灯，灯上罩着深颜色的灯罩，房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一个奶妈，披着白色披肩，一张西伯利亚型的高颧骨的脸，模样很和善。

奶妈站起来，鞠了个躬。年轻母亲朝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床上静静地睡着一个2岁的小女孩，张着小嘴，长长的鬃发披散在枕头上。

“这就是卡佳，”年轻母亲说着，拉了拉带条纹的天蓝色线毯，把露出来的一只白白的小脚盖好。“好看吧？她才2岁呢。”

“这个孩子太可爱了，”聂赫留朵夫打量着趴着睡的胖男孩说。

“是吗？”年轻母亲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他对两个孩子夸奖了好几遍，虽然也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如饥似渴地听赞美词的母亲的心意，之后就跟着她回到客厅里，英国人已经在客厅里等他，好按照他们所约定的，一同乘车去监狱。跟主人家老老少少告过别之后，聂赫留朵夫便和英国人一起来到将军家大门口的台阶上。

阴森的监狱房屋，以及门前的岗哨和路灯，尽管蒙着一层洁净的白色外衣，尽管现在一切东西，门口的台阶也好，房顶也好，墙壁也好，都蒙着洁净的白色外衣，可是所有这些，再加上房屋的整个正面那一排灯光明亮的窗子，反而给聂赫留朵夫留下了比今天上午更加阴森的印象。

庄严的狱长从里边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把发给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许可证看一遍，大惑不解地耸起他那有力的肩膀。不过

他仍旧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个参观者跟着他走进去。

他先领着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口，登上楼梯，走进一间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聂赫留朵夫打算现在跟玛丝洛娃见面，就派一个看守去把她带来，同时准备好回答英国人当场通过聂赫留朵夫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个监狱按照建筑计划原定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监禁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放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聂赫留朵夫随口翻译英国人和狱长所说的话，没有深究那些话的含义。他想到马上就要跟卡秋莎见面，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心慌起来。

他正在给英国人翻译几句话，忽然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办公室的门开了，而且如同以往发生过许多次的情形那样，一个看守走进来，身后跟着卡秋莎，头上扎着头巾，身上穿着犯人的衣服。他一看见她，就生出了沉重的心情。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和儿女，我要过人的生活，”正当她迈着快步，没有抬起眼睛，走进房来的时候，这样的思想掠过他的脑海。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出几步，依他看来她的脸容显得严峻而不愉快。她又像从前她责备他的那次一样。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的手指头拘挛着揉搓她衣服的边缘，时而看他一下，时而低下眼睛。

“您知道减刑的事成功了吧？”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看守已经告诉我了。”

“那么，只要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去，在您愿意住的地方住下来了。我们要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说：“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到哪儿去，我就跟着他到哪儿去。”

尽管她非常激动，她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把这几句话讲得又快又清楚，倒好像事先已经把她要说的话统统准备好了似的。

“原来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这是说如果他要我跟他一块儿生活的话，”她惊慌地停住嘴，然后又纠正自己的话说，“这是说如果他要我留在他身边的话。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我得把这看做幸福才是。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如果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这种事我已经丢开不干了。不过，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是个十分特殊的人。”

“是的？当然，”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认为……”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会说出什么多余的话，或者生怕她没机会说完她要说的话似的。

“不，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要是我没有照您所希望的去，您要原谅我才好，”她说，用神秘的、斜睨的目光瞅着他的眼睛。“是的，看起来，事情就该这么办。您也得生活啊。”

她对他所说的，恰好就是刚才他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然而现在他已经不这样想，他的想法和他的感情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不但感到羞愧，而且舍不得失去由于她的决定而要失去的一切。

“我没有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在这儿生活和受苦呢。您已经受够苦了，”她说，古怪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苦，我一直觉得挺好。而且，要是可能的话，我以后还想为您出力。”

“我们，”她说到“我们”的时候，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已经为我出过那么多的力。要不是您的话……”她本来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嗓音发抖了。

“您总不能对我道谢，”聂赫留朵夫说。

她按捺住激动，定下心来，从容不迫地讲起她所知道的情形，克雷利佐夫一路上很衰弱，一到此地就立刻送到医院去了。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里去看护他，可是没有得到批准。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他，就说道。

“我不想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那我们就分手了，”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聂赫留朵夫听着她说，“那我们就分手了”而没有说一般的告别话，看着她那古怪的、斜睨的目光和凄凉的笑容，心里明白过来，在他刚才对她的决定的原因所做的两种推测当中，第二种才是正确的：她爱他，认为同他结合在一起，就会破坏他的生活，而她跟西蒙松一块儿走掉，就会使得他自由。

现在她想到她办成了她所要办的事，不由得暗暗高兴，不过转念想到她就要跟他分手，又不免心里难过。

她握一下他的手，很快地回转身，走出去了。

聂赫留朵夫回过头去看英国人一眼，准备跟他一块儿走出去，可是英国人正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什么事。聂赫留朵夫不愿意打断他的工作，就在靠墙的一张小木榻上坐下，忽然感到非常疲倦。

他所以疲倦，倒不是因为昨天夜里失眠，也不是由于旅途劳顿，更不是由于激动，而是他感到他对全部生活已经厌倦极了。他坐在那张小木榻上，倚着它的靠背，闭上眼睛，就顿时睡着了，而且睡得又熟又酣畅。

“怎么样，您现在愿意到各处牢房去走一趟吗？”狱长问道。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他自己待在这个地方，心里暗暗惊讶。英国人已经写完他的笔记，想去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就疲倦而冷漠地跟着他走去。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名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走到臭得令人恶心的走廊上。迎面碰到两个犯人对着地板撒尿，不由得吃了一惊。

然后，他们走进第一间关押苦役犯的牢房。牢房中间放着一排排板床，犯人们都已躺下了，一共有70人。一个个头靠头身贴身地躺在床上。

参观人一进来，所有的人都拖着锁链，“哐啷哐啷”地爬起来，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仍旧躺在床上。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一看就知道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在不停地唉声叹气。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否已经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上才生病的，而那个老头儿是个老胃病，可是没法让他住院，因

为医院里早已住满了病人。

英国人不满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犯人讲几句话，请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的目的，除了要写一篇介绍西伯利亚流放和牢狱生活的文章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传通过信教和赎罪来拯救自己。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他说，“而且为他们而死。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就会得救。”他说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站在床边默默地垂手恭听。

“请您告诉他们，”他最后说，“我说的道理这本书里都有。这儿有识字的吗？”

这里识字的大约有20多个人。英国人从手提包里拿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有几只肌肉发达、长着坚硬黑指甲的手从粗麻布衬衫的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向他要书。他在这间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走到第二间牢房。

他们从苦役犯牢房来到流放犯牢房，从流放犯牢房到被村社判刑的农民牢房和随行家属的房间。到处都一样，犯人们饥寒交迫，百无聊赖，身染疾病，受尽欺凌，身陷囹圄，就像一头头困兽。

英国人和典狱长已经在一个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着了。英国人问这间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后说道，并希望进去看一看。

这间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微弱的光线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

其中有一具男尸，身上穿着紫色的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他走近前去，仔细看那具尸体。

这个人生着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额头和稀疏的鬃发他认出了这些他所熟悉的特征，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上激愤和痛苦的神色，现在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极其美丽。是的，他就是克雷利佐夫，或者至少是他的物质实体所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是为了什么？现在他明白这些问题了吗？”聂赫留朵夫暗想，觉得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于是他感到眩晕了。聂赫留朵夫没有向英国人告辞，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外面院子里。他觉得他必须独自一人好好思考一下今天傍晚所经历的这一切，于是便坐上马车回旅馆去了。

聂赫留朵夫没有上床就寝，而是在旅馆房间里前前后后来回踱了很久。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了。

她不需要他了，这使他又伤心又羞愧。不过现在使他痛心的不是这件事。他的另外一件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他痛心，并且要求他有所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看到的和了解到的种种可怕的恶势力，把可亲可爱的克雷利佐夫也迫害致死的恶势力，作威作福、十分嚣张，他不仅看不到战胜恶势力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知道怎样才能战胜恶势力。

他的头脑里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人，一个个被那些麻木不仁的将军、检察官、典狱长关在到处是病菌的空气里，受尽凌辱；想起那个独立不羁、痛骂当官的、被看做疯子的古怪老头子；想起停尸间里在愤恨中死去的克雷利佐夫那十分清秀的、蜡黄的、僵了的脸。

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头脑清醒而天天在干这些事的人疯了？这个老问题现在更顽强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解答。

等他来回走累了，也想累了，就在灯前的沙发上坐下来，随手翻开英国人送给他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在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

“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答案，”他想到。于是他吧福音书翻了翻，就瞧起他翻到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希望就在这本福音书里找到可以证实这种想法的段落，就从头读起来。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亮光，一动也不动。

他想起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就清清楚楚地想象到，假如人人信守这些戒条，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于是他的心中充

满了很久不曾有过的喜悦。就好像他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之后忽然得到了安宁和自由。

他一夜没有睡觉。他就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明白了以前读过多次而没有留意的一些话的全部意义。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他在这本书里发现的有用的、重要的和可喜的道理。

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他熟悉的，似乎在证实和引导他认识以前他早就知道、却没有充分认清、没有相信的道理。现在他就认清了，相信了。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正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道，“就是因为我们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在生活，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可是，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上来，那就是奉有某某的旨意，有所为而来的。

从这天夜里起，聂赫留朵夫开始过起一种全新的生活，倒不是因为他进入了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有了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中这个新阶段的结局如何，将来自见分晓。

名家推荐

阅读好的翻译作品，使我又一次相信，和作品的交流早在它被翻译过来之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作品的灵魂，骤然照耀过对方。

——冯秋子

经典有足够的理由得到敬重，而非敬而远之。以平常心进入大师们构造的世界，调动我们的人生经验建立隐秘的交流，日常生活会在某些瞬间被反复照亮。

——陈东捷

在生命中，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衰老、疾病和死亡的困扰，只有通过阅读经典，与伟大的心灵对话，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抵御虚无和孤独。

——宗仁发

眼前的世界是摇晃的，一去不返的，只有书里的世界是稳定的，可以看得清楚的，并且是可以一次次地重返的。文字或者图书，是我们栖息的家园。读书，读好书，就是进入好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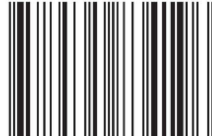
——格致

经典 名著

* 让阅读更有意义 *

上架建议：文学名著

ISBN 978-7-5658-3419-6



9 787565 834196 >

定价：59.80 元